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1年
4-6月

- ▶ 省委常委叶贞琴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
- ▶ 我院多篇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等接受发表
- ▶ 我院顺利举办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线上讲座顺利举办
- ▶ 我院共 5 件作品获得暨南大学“挑战杯”一等奖等奖项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省委常委叶贞琴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	02
卢品亮、葛梦君撰写的智库专报获得广东省委领导批示	05
我院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05
我院党支部开展“学党史 明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	06
我院共 5 件作品获得暨南大学“挑战杯”一等奖等奖项	07
我院举办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经理级干部素质与技能培训班	08
02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10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2
大师暨南行	16
04 思想聚焦	
乡村振兴专题	19
家庭经济专题	40
好文回顾	52
媒体聚焦	64
暨济一堂	67
“乡村振兴大讲堂”的内容精华	75
05 数据调查	
SEMINAR 回顾	82
广东千村调查	84
中心动态	88
06 对外交流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一行前往从化开展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调研	94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赴宁波诺丁汉大学访问	95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赴中国人民大学访问	96
07 人物专访	
汇磅礴力量, 展振兴旗帜——专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98
国华杰出学者冯帅章: 探求经世济民学问的劳动经济学家	101
冯帅章: 到暨大经济学创新班, 与诺奖大师面对面	104
08 学生天地	
学子风采	108

学院要闻

省委常委叶贞琴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



近年来，中国将发展的眼光落于乡村，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国的发展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近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整合优势力量，正式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院聘请了一批在乡村振兴领域享有盛誉的研究人员，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专职研究与调查队伍，打造起乡村振兴学术平台，致力于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高水平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2021年5月19日，省委常委叶贞琴莅校调研，并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叶贞琴希望暨大乡村

振兴研究院扎根南粤大地，传承暨南百年底蕴，加快打造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智库平台，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暨南力量。

校党委书记林如鹏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发挥人才优势，强化理论支撑，争取早日建成立足广东、辐射全国的一流乡村振兴智库。校领导林如鹏、宋献中、夏泉陪同调研。

研究院对标中央及广东省乡村振兴任务，主要研究方向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与美丽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城乡融合与要素流动研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乡村振兴金融支撑研究、乡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发展研究、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等。通过调查研究，系统总结提炼广东省乡村振兴的宝贵经验，为广东乡村振兴品牌建设添砖加瓦。研究院院长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首届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冯帅章教授担任。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其具体实施既要把握大局，又要注重细节，而调查数据就是战略实施看清方向、找准发力点必不可少的工具。广东千村调查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户调研，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行效率、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战略、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 with 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这一调查项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集结了300多位心系乡土的高校学子作为访问员投身乡村开展调查。访问员在督导的带领下分队前往3000余户农村家庭进行入户调查，通过问卷并辅以深入访谈，收集大量详实的一手数据，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走，从数据、地图、录音三个维度触摸农村的真实脉动。



广东千村调查访问员午间入村开展访问



广东千村调查绘图员描绘农村地图

调查中，为保障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专项技术团队基于社会调查实际开展场景，自主研发了四项软件——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电访系统（CATI）、混合调查系统和IQL问卷平台，并根据实际需求组合投入应用，为调查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此外，调查项目组还专门成立了核查队伍，通过GPS定位、照片核查、实地核查、电话核查、录音核查等多种严密的质量控制手段实时对收集所得的数据进行把关。



广东千村调查核查员正在进行电话核查

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并完成基线调查；2019年，进行第一轮追踪访问和样本扩充，并开展农村绘图工作；2020年，项目进行第二轮追踪访问，并在原有问卷结构上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农村干群关系、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等专题模块。项目组在执行过程中，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项目进行多方面调整，通过就近招募学生访问员、培训转为线上直播、配备防疫物资等方式，控制实地调查时长，保障调查质量。项目共采集有效样本量119个行政村和3646户农村家庭数据，样本追访率达91%。

从2018年至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已经走过三年，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看到成果的三年。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是广东省乡村振兴“3年取得重大进展”“5年见到显著成效”的承前启后之年，也是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结硕果的一年。

从连续发布的《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广东千村调查2019年研究报告》《广东千村调查2020

年研究报告》到围绕乡村振兴话题的15期政策简报，内容覆盖精准扶贫、农村教育、农村生态环境、乡村基层治理、农村金融等，从多个角度深挖广东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的痛点问题，并给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社会对乡村振兴这一话题的关注也被投射到项目中来，广东千村调查及其相关成果受到了权威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澎湃新闻对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研究报告进行了专题连载报道。此外，《经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广东电视台等媒体都对广东千村调查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报道。项目还将2018年调查中访问员、质控员和研究人员等参与者提供的多角度手稿和真实记录汇集成书出版，名为《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实录调查报告》，书写“千村人”的汗水和青春，记录历史，折射现实，用文字的力量为乡村提供更加真实的侧面写照。



广东卫视对广东千村调查作专题报道

除了完成调查工作，项目访问队员还自发采取行动助弱助困、回馈乡村，用行动诠释了青年担当。亲身参与、实地考察给访问员们带来了别样的震撼。河源龙川队访问员曾晨好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未竟事业。广东千村调查作为建构中国发展的万千砖瓦之一，它启发着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自觉地发现乡村，重拾对于乡村发展的信心，昂首阔步地在这片城乡大地上‘撸起袖子加油干’。”

正是因着双向的信任与支持，三年来，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得以在南粤大地上留下坚实足迹。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项目中更新对乡村的认知，收获美好与成长；一年又一年的数据让社会看见乡村现状，听见乡村声音；一

处又一处的乡村正因为这明黄色的炬火而活力渐增。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数据和建设落地成策，乡村振兴研究院将在更多的项目和研究中为强国建设提供可依之据，尚处于边缘的乡村也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实现“自我升级”，融入这发展洪流。



广东千村调查访问员结束调查后返程

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谈及研究院的未来，说“乡村振兴研究院的成立，是暨南大学立足坚实微观数据基础，发挥高层次人才聚集优势，凭借丰富政策研究经验的优势，深度参与和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坚定一步。”他表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将围绕“三农”工作的一线需求，组建高水平研究与调查队伍，努力建成有国际影响、全国领先、广东一流的专业智库，担负乡村振兴的时代重任。

卢晶亮、葛梦君撰写的智库专报获得 广东省委领导批示

近日,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卢晶亮、研究助理葛梦君撰写的专报《广东与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与对策》,获得广东省委领导批示。



我院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2021年4月15日,值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根据国家保密局、中央国安办、中央网信办、中央统战部保密委、广东省国家保密局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部署和要求,我院扎实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教职工进行了保密知识竞赛、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等一系列活动。

我院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纳入到党政联席会议、行政部门会议及各职能中心周例会中,分别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的实际情况开展学习与讨论。

在党政联席会议中,在党支部书记薄诗雨的主持下,我院院长冯帅章及其他主要领导干部集体认真学习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讨论如何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纳入学院各项日常工作中,不断增强全体

教职工国家安全保密意识和防范技能,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我院领导干部集体学习

根据活动安排,教职工需要在微信关注“保密观”公众号进行保密知识竞赛,并在学习强国平台“密码视界”强国号参加答题活动。在答题前,我院教职工认真

学习相关保密知识,积极参与保密知识竞赛及学习强国平台专项答题,独立完成测试,测试成绩均合格。通过答题,教职工们增强了保密意识,筑牢保密安全防线,充分认识到保密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央视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制作了以国防军事历史为主题的节目——《讲武堂·红色血脉》。教育片讲述了苏区时期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在被称为“虎口交通线”的青溪红色交通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惊险较量的故事。通过教育片,教职工深刻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秘密交通站肩负的重任,为何它被形象地喻为“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我院教职工集体观看教育片

通过本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我院教职工深刻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必须坚决履行法定责任,共同构筑维护国家安全钢铁长城。

我院党支部开展“学党史 明初心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安排部署,我院党支部于4月16日上午开展了“学党史 明初心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会上,支部书记薄诗雨首先带领支部全体党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上级党委的有关工作部署,详细阐述了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他强调,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应当通过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任务,厚植爱党、爱国、爱校情怀,切实增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贯穿始终,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支部书记薄诗雨

随后，支部全体党员一起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述职报告》党史学习专题片。影片浓缩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大家从中充分感受到了党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和力量写就的光辉历史。

最后，为缅怀革命先烈，加强党史校史学习和革命传统教育，支部党员一起前往暨大生科院参观了“暨南红色基因”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以红色人物展览长墙的形式展出暨南大学建校 115 周年以来，特别是 1921 至 1949 年 28 年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 28 位校友、暨南红色人物的事迹。在蒙蒙细雨中，支部党员认真聆听了讲解员回顾各位革命先烈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将生命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事迹。



参观展览

通过此次“学党史 明初心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大家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浩然正气，进一步增强了责任心和使命感。接下来，我院党支部将继续按照上级党委部署，层层推进、步步落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际成效，真正实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我院共 5 件作品获得暨南大学“挑战杯”一等奖等奖项

近日，在校团委组织的暨南大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的 5 件作品在全校 747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3 名。

其中，一等奖作品《新冠疫情之下的线上教育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业表现——基于陕西七市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获得推荐，将代表学校参加省赛进行角逐。该作品在研究院助理教授马森老师的指导下，对陕西省七个地级市七十所初中的部分师生进行了一次电话问卷访谈，并获取到了一些学情数据，利

用双重差分法和统计学知识对不同地区学生的学情状况进行了分析。

获奖名单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暨南大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名单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序号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负责人	指导老师
1	新冠疫情之下的线上教育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业表现——基于陕西七市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一等奖 (推荐省赛)	廖洁业	马森
2	地域产业政策与城市创新	二等奖	李力添	蔡澍
3	新冠疫情对土地交易的影响——基于对土地交易微观数据的研究	三等奖	王欣盼	朱宏佳
4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工业用地价格与污染源变迁的实证分析	三等奖	范李天琦	朱宏佳
5	寒门再难出贵子？——探究学生群体教育机会差异的现状与影响	三等奖	陈洁婷	陈祎

我院举办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经理级干部素质与技能培训班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24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功举办了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经理级干部素质与技能培训班。本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高中信银行零售银行部经理的素质和管理技能，拓宽视野，以经济学思维把握金融发展形势，提高沟通管理效能，并做好压力管理与情绪疏导，学习新媒体营销管理方法，从而轻松做好营销管理工作。

本次培训邀请了高校相关研究领域学者进行理论知识讲授和典型案例分析。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金山教授、管理学院王玮教授、知名心理学家马绍斌教授、市场营销管理知名学者梁新弘副教授等四位专家分别从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分析、高效管理沟通、管理者的压

力管理与情绪疏导以及公域平台 TO 私域流量——市场营销前沿玩法等不同角度开展了精彩纷呈的讲授。

课后，参加本次培训的 80 余名学员对课程进行评估反馈，大家对本次课程满意度评价很高，纷纷表示培训内容深入浅出、主题突出、观点鲜明，令人受益匪浅。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合作论文“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Urban China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Sector”（合作者: Naijia Guo）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接受发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我院副教授薄诗雨的合作论文“Political Hierarchy and Urban Primacy: Evidence from China”（合作者: Chao Cheng）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接受发表。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我院副教授崔潇濛的合作论文“Adapting Agriculture to Climate Change through Growing Season Adjustments: Evidence from Corn in China”（合作者: Wei Xie）被农业经济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接受发表。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 暨政策论坛顺利举办



2021年5月8日-9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顺利举办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来自芝加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绵竹市教育局、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中国人口学会迁移流动专业委员会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了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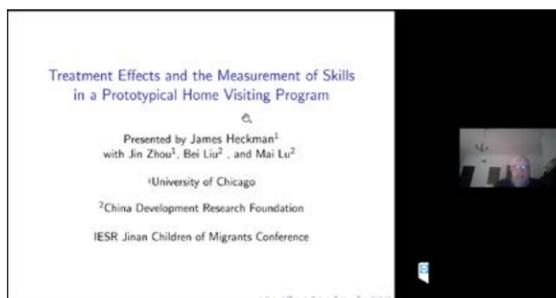
5月8日上午，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开幕词，拉开了此次大会的序幕。冯帅章院长提出，希望通过学术交流

与政策研讨，推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均衡、优质发展。



冯帅章教授致辞

随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J. Heckman 就“Treatment Effect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kills in a Prototypical Home Visiting Program”这一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Heckman 教授在发言中分享了在中国开展的儿童早期发展随机干预试验项目成果，并鼓励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关于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测量和干预等方面的研究。



Heckman教授线上发表主旨演讲

接下来，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及一线教育工作者围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发表主题演讲。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围绕“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的问题”提出见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围绕“投资婴幼儿早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最具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政策”展开讨论；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开俊围绕“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基于全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实证分析”进行分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探讨了“回流儿童学生规模及对留级的影响”这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



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开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



政策论坛

5月8日下午，大会进入政策论坛环节，此次政策论坛由暨南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主持。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项目负责人冯思澈，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城市支教项目经理梁海荣，广州大道南小学校长刘基国，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新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王学男，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魏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向芯，中国人口学会迁移流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谦，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元腾，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前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共11位嘉宾，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分别发言，探讨了“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的指标构建及影响评估”“公平视野下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合力献策。



政策论坛现场，与会人员热烈讨论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2020年度总结会随后举行。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是由我院下设的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长期追踪调查，项目自2016年开始已连续开展四年，为有关儿童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更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参考和研究依据。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卢世军针对项目进行发言，并介绍了绵竹市对当地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的帮扶政策。随后，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督导袁静仪对2020年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汇报。



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卢世军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督导袁静仪

5月9日下午，本次大会学术论文报告环节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来自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向参会人员展示各自在随迁儿童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分享了题为“Gender Difference in Non-cognitive Skills during Pandemic -- Evidence from Elementary Students”的论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分享了题为“On the Origin of Cognition: How Childhood Conditions Shape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 Age”的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罗钦月分享了题为“Test Scores, Noncognitive Outcomes, and Stereotyping of Non-local Students”的论文；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肖书康分享了题为“Land Reform and Child Adoption”的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人口流动
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



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肖书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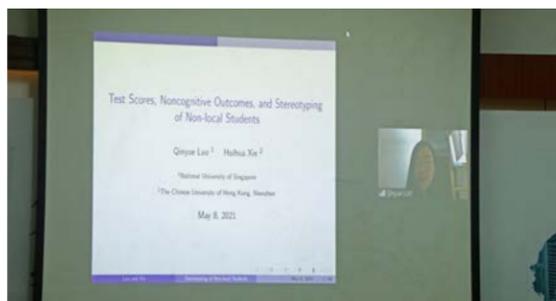
此次会议不仅于校内举办，与会人员还前往参观广州市农民工博物馆，了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农民工的印记。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



与会人员参观广州市农民工博物馆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罗钦月

自 2016 年，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已连续举办 5 届，成为展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未来，我院将结合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新形式、新特征，继续积极打造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交流平台，更好地为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量。

大师暨南行

诺奖大师 James Heckman 教授 谈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随机干预试验



2021 年 5 月 8 日，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 James J. Heckman 教授受我院“诺奖大师暨南行”活动邀请，于线上进行了题为“Treatment Effect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kills in a Prototypical Home Visiting Program”的主题讲座。

中国城乡的人力资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就已显现。为了提高代际流动，促进社会平等，Heckman 教授团队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简称 CDRF）于 2015 年在中国合作开展了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的 Rural Education and Child Health（以下简称 REACH）干预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为 6-24 月龄的婴幼儿提供发展刺激和营养补充来提高儿童的健康、语言、认知和非认知（包括社交情绪）能力的发展水平。中国 REACH 项目的设计参考由 Sally McGregor 和她的团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牙买加 REACH 项目”，这是全世界仿效的家访项目的成功原型。中国的 REACH 项目在甘肃省华池县进行，该项目样本包括 2015 年 1 月 111 个村庄中所有 6 - 24 个月大的约 1500 名婴幼儿。中国 REACH 项目的工作人员按照项目要求对被随

机抽中的干预组家庭定期开展家庭访问，指导婴幼儿的照料人开展高质量的教养活动，如和孩子讲话、讲故事、陪孩子玩游戏、玩玩具、阅读等能促进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发展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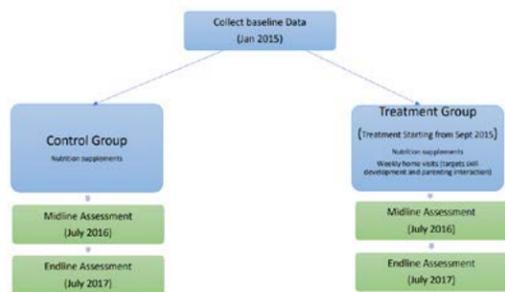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针对处于不利成长环境的儿童在其发展早期进行家庭访问干预是有效的（see, e.g., Grantham McGregor and Smith, 2016），与其他幼儿发展计划相比，家庭访问干预还具有对项目人员的培训和对支持设施要求较少、开展成本较低的优点。此次讲座，Heckman 教授分享了中国 REACH 的项目经验，他认为 REACH 项目的成功经验可以大规模推广。他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的 REACH 项目对儿童语言和认知能力、精细运动以及社会情感技能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影响对处于最弱势的社区尤其显著。Heckman 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分享了 REACH 项目经验：

1. 评估随机干预实验 REACH 项目的干预效果；
2. 使用非线性模型估计个体不可观测的真实技能（潜变量）的水平，并评估 REACH 项目对其的干预效果；
3. 对 REACH 项目的干预效果进行分解：干预效果有多少来源于提高了儿童的真实技能，有多少来源于改善儿童对已有技能的应用。

甘肃省华池县是中国最贫困的县之一，约 40% 的儿童父亲外出务工，很多儿童的母亲白天在外工作。因此约 30% 的家庭中儿童的主要照料人是奶奶，奶奶们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 3 年。中国 REACH 项目于 2015 年初开

展基线调查，在之后 2 年的干预期中，对实验组提供营养包和每周的家庭访问，对控制组仅提供营养包，并分别在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7 月对婴幼儿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中期和末期评估。

Figure 1: The Timeline of China REACH (Huachi) Program



2015 年的基线调查中，对华池县全部 111 个村 1567 个婴幼儿家庭根据基线调查中社会经济变量分别在村级和个体层面通过马氏距离 (Mahalanobis) 进行随机匹配，以确保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基线特征一致，在每个匹配组随机选取一个干预村，得到 56 个干预村样本和 715 个干预组家庭个体样本。在之后 2 年的干预期中，接受过培训的家访员（家访员由与婴幼儿妈妈受教育水平相当的当地女性担任）每周访问干预组家庭，向儿童的主要照料者提供 1 小时的育儿和照顾指导，鼓励照料者通过游戏、玩具、唱歌、阅读和讲故事的方式与孩子互动，以刺激儿童的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技能的发展。同时项目组和研发团队还配备了一定比例的督导员，监督、指导和记录家访员的工作，以保证实施质量。

项目组分别在项目开展 1 年后和 2 年后跟踪了婴幼儿的发展状况。中国 REACH 项目使用丹佛测试 (Denver Test) 对儿童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所有的测试环节均由专门的施测者实际考察，而非家长的报告。丹佛测试包含 125 个项目，分别测试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社会情感）、精细运动（如眼手协调能力）、语言和认知、粗大运动（坐、走、跳和整体活动）四个维度的发展状况。

Heckman 教授通过以下步骤来研究 REACH 项目对儿童发展的干预效果：首先，使用 OLS 回归模型评估 REACH 的平均干预效应，结果显示中国 REACH 项目在两次追踪调查中均显著提高了儿童语言和认知能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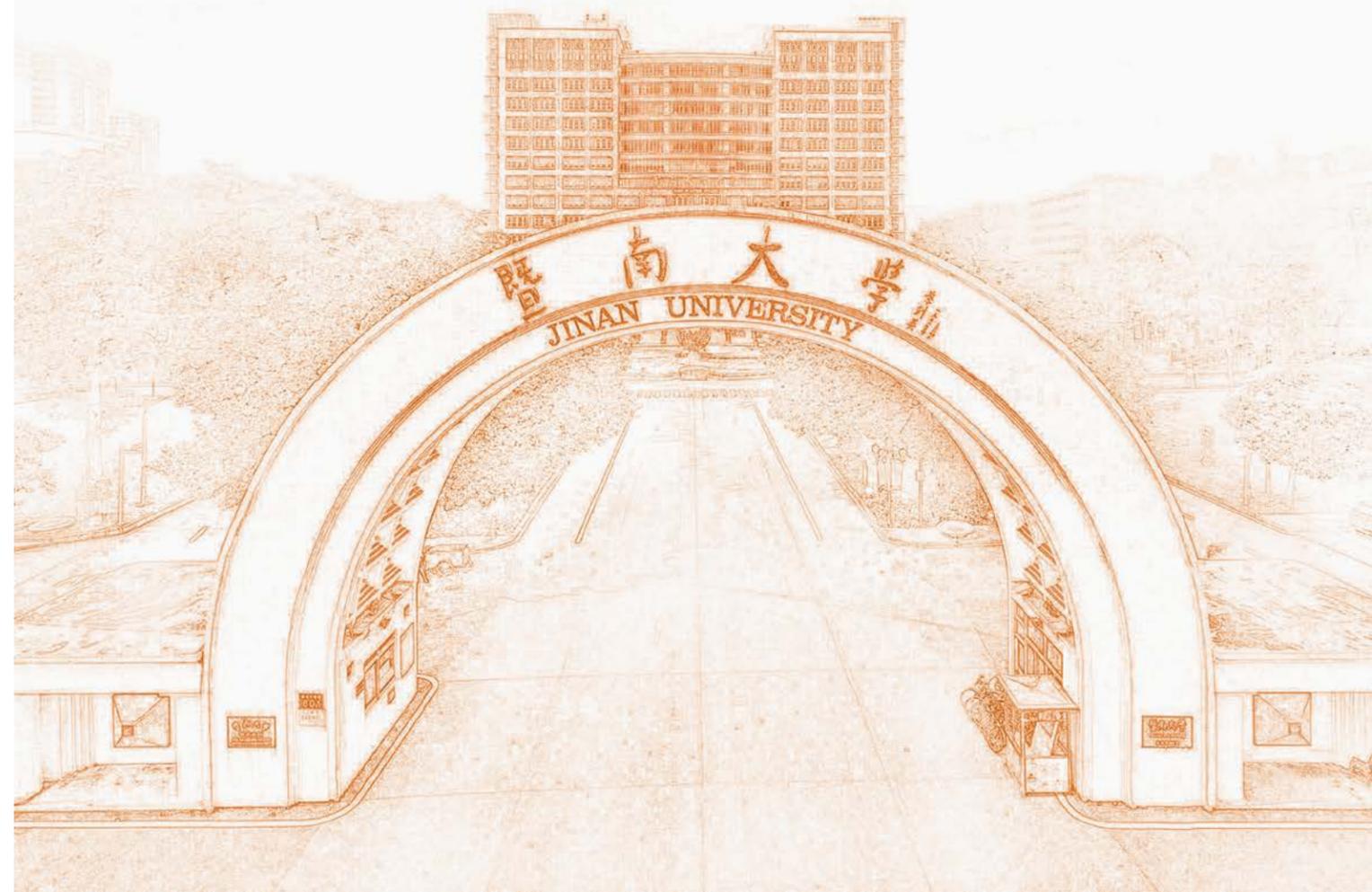
年后项目结束时儿童语言和认知能力得分提高了约 1 个标准差 [95%CI: 0.64-1.46]。男性儿童较女性儿童从干预措施中获得更大的能力提高。

其次，为了进一步理解干预效果的来源，即干预效果有多少来源于提高了儿童的真实技能，有多少来源于改善儿童对已有技能的应用。Heckman 教授提出并估计了一个非线性模型，其中每项测试分数受该项难度、孩子潜在能力与对该能力的应用的乘积影响，根据大量的丹佛测试项目（每个孩子的数据集中包括 72 项丹佛测试的结果）估计该模型。在模型中，由于婴幼儿基本特征协变量与是否分配到干预组不相关，排除了基本特征差异导致的能力差异。对收集到的丹佛测试题项的难度系数进行估计，发现在样本儿童中丹佛测试的语言和认知模块难度系数相对平滑，而其他模块则存在难度跳跃断层，社会性发展（社会情感）模块的跳跃断层最为明显。因此，Heckman 教授认为丹佛测试对样本儿童的语言和认知测试设计合理，社交情感测试则需要改进。对模型中最后一部分——能力真实值 \ 潜变量 (Latent Skill) 及其对测试得分载荷的估计结果进行分解，将干预组和控制组的能力真实值差异对得分差异的贡献部分作为 REACH 项目对能力提高引起的项目平均干预效果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将能力对测试得分的影响系数值的组间差异作为能力载荷变化引起的平均干预效果。结果显示，中国 REACH 项目的效果主要来自于对干预组儿童真实能力的提高。分析能力真实值分布的结果表明，REACH 项目显著提高了儿童的语言和认知、精细运动和社会性发展（社会情感）能力，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儿童粗大运动技能。

讲座最后，Heckman 教授比较了中国 REACH 和牙买加 REACH 项目，认为以 REACH 范式为基础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同样适用于中国农村。Heckman 教授鼓励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关于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测量和干预等方面的研究。

“在生命的早期，人力资本的积累发生在家庭中，而不是学校，忽视儿童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会侵蚀公共教育投资的成果。”让我们与 Heckman 教授一起努力，关注儿童早期发展，提高未来共同福祉！

思想 聚焦



乡村振兴专题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谈如何更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背景材料：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收入结构更加优化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为此，我们特采访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专职研究员卢晶亮，谈谈在未来如何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首届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经济学。

1、农村人均收入在2020年的疫情影响下，依然提前1年实现翻番，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较快。请问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哪些政策的福音？

冯帅章：我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三年前提出的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政策战略。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我国进行脱贫攻坚工作的这八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2016至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新增200亿元；今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达到1561亿元。党和国家巨大的财力投入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农民农村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这对于如今农民农村收入取得巨大成绩起到关键作用。

2、受疫情影响，我们的脱贫攻坚依然打响了收官之战，这是否与我们的长期政策规划密不可分？具体哪些政策对此影响很大？

卢晶亮：脱贫当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党中央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提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收官。

8年来，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靶向施策，有序退出，防止返贫，各类政策相互配合，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才能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3、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外出打工对增收贡献最大，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脚步在加快？

冯帅章：首先，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从收入的具体来源来看，农民转移性收入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是两个重要变化。转移性收入提高，得益于精准扶贫、农村医保、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提升等国家政策。农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持续提高将是长期趋势。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2018年和201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转移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11.3%和9.4%。经营性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7.6%和0.3%；财产性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8.2%和20.5%。其次，外出务工一直都是农民收入来源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城镇化对农民农村带动作用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城镇化速度在加快，目前我国城镇化还是在稳步推进。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iv]，未来人口城镇化率还会继续提高，将持续带动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长。

卢晶亮：工资性收入确实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里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农村常住居民的工资收入，因此主要来自就近的非农务工收入。要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收入，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还要进一步提高。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全国最高的浙江为例，2020年浙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工资性收入的贡献高达61.1%，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浙江县域经济的发达，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

4、农民的经营性收入较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产业振兴已经初见成效？在未来乡村旅游新业态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

冯帅章：农民收入来源如果纯粹依靠务工工资或农业经营收入，收入增长就会比较有限。经营性收入较大幅度增长体现了农民收入渠道拓宽，是乡村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是否意味着乡村振兴已经初现成效目前还不能下定论。我们也应该看到经营性收入具有一定限制，只有在适合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城郊地区、有特色旅游资源的地区等，经营性收入才可能占比较大。所以为了进一步提高经营性收入，未来一定要重点发展农村地区的乡村旅游等产业。

5、农村医保以及养老保障等方面进步较为明显，未来还需进行哪些政策来提高保障覆盖面？

冯帅章：社会保障的进步除了要从提高覆盖面着力之外，还要同步提高保障水平。一是要促进医保、养老保障等制度的城乡均衡发展。目前农村的医保、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差距依然较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均衡发展是未来城乡一体化要继续着力的方面，当农村和城市社会保障水平达到基本同步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二是要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不仅要注重农村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设施的数量提升，还应该注重农民的使用便利性，使农民真正享受到这些设施和福利。

6、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努力？

冯帅章：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让要素更多地流动起来。目前农村能够取得较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获取报酬，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促进农村收入提高。相反地，目前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耕地、宅基地等土地要素没有很好地流动起来，土地要素的流动不充分则阻碍农村发展。当然现在国家正在推动的农业用地确权等一系列改革，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能够在城乡间进一步流动，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可以更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要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城乡的人力资本的差距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均等就没有办法实现。因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包括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真正做到无论儿童户口在哪里、居住在哪里，义务教育阶段都能够得到免费教育，且都能得到有质量的教育。

卢晶亮：缩小城乡差距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以广东为例，首先是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与合理配置。2019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却达到18%，表明农业劳动力冗余，农业生产率不高，还需要将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多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哪里转移呢？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高

达80%，但常住人口比重只有56%，就业人员比重只有68%，因此可以继续将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城市地区转移就业，从人均角度来说会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还要大力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广东的县主要位于粤东西北地区，尤其是粤北山区占到一半以上，县域经济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近务工机会，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粤东西北地区的城镇化率，目前粤东西北的城镇化率还只有60%、46%和51%。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农民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是经营性收入，这就涉及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振兴，通过产业发展，尤其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

7、接下来农民的收入结构还能存在哪些优化的空间，如何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

冯帅章 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条件的农民，其收入结构存在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进行优化。对于

贫困及需要保障的群体，需要进一步提高其转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对于一般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增加务工收入；对于其他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财产收入；对于靠近城镇或者拥有特色旅游资源、自然资源地区的农民，则可以提高经营收入。总而言之，农民的收入结构很难找到一个普适的最优解，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要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方面要通过财产确权。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加快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才能保障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是增加要素的流动性。比如农民的房屋、土地等要素可以通过转移、出租的方式，投入到一个更加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提高要素的边际产出，也能够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最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是非常好现象。因为乡村真正要振兴，城乡之间的差距一定要缩小。在一些发达国家，乡村的收入甚至高于城市的收入，所以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乡村振兴究竟进入了什么阶段。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谈如何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背景材料：

近日，广东省出台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作为服务广东就业大局的重要政策之一，对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具有关键引领作用。



有鉴于此，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进行政策解读，为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贡献学者力量。

专家介绍

杨森平，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十二届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特聘研究员，广东省税务研究会副会长，第一届广东省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会员，民建广东省委委员、省委监察委员会委员，民建广东省委理论研究会主任，民建广东省委参政议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暨南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民建暨南大学主委。研究领域：财经理论与政策、社会保障制度。

卢晶亮，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经济学。

葛梦君，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助理。暨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1. 请问《意见》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目前这一意见的出台是否具有紧迫性？

杨森平：广东要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和广州、深圳“双城”联动重大历史机遇，聚焦加快形成“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努力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背景来看，出台《意见》有其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广东的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现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杨森平：粤港澳大湾区在自身发展基础和战略红利的刺激下，人才吸引力强，当前处于人才净流入的状态。

总体来看普通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加上去年受疫情影响就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城市中，就业压力最大的是深圳、广州和珠海。而就业景气度最好的是中山和惠州，在湾区内部人力资源错配的现象较为突出。根据智联招聘相关数据显示，湾区的招聘需求中，专业服务、贸易、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用人需求较多，但流入的人才中制造业、服务业的人才却占比较高。另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缺口还比较大。此种人才错配和不足的情况未来将会影响湾区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卢晶亮：在大湾区之外，从整个广东的情况来看，劳动力以及高技能人才还是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的高技能人才相对缺乏。过去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粤东西北地区人才引进和培养。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乡村人才振兴是重要任务之一，预计还会有更多针对性政策出台。

葛梦君：当前广东粤东西北的农村劳动力更多选择到珠三角务工，集中流向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中分别有38%、40%和55%选择外出务工。外出劳动力中分别有58%、63%和72%流向珠三角地区。从具体城市来看，2020年广东跨县流动的农村劳动力24.34%前往广州市，22.29%前往深圳市，11.47%前往佛山市，15.19%前往东莞市。由此可见当前广东的劳动力就近务工比例比较低，劳动力流动仍然向大城市集聚效应明显。

3. 《意见》要求我们要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和广州、深圳“双城”联动重大历史机遇，随着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加速，广州和深圳是否会对周边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进一步产生“虹吸效应”？该意见能否有效缓解这一现象？

杨森平：这一现象短期内很难缓解，我国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这也意味着人口将继续集中，向超大特大城市集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但是国家提出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今后超大特大城市的任务是优化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因而广州和深圳也是如此，“双城”向外辐射、带动、延伸，以此逻辑，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系统。“双城”的开发建设方式要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产业、公共服务资源要向外疏解，从交通、社区、生态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以及以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实现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故长期来看“双城”优化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又会反哺周边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有效地减少“虹吸效应”。

4.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等措施，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农村“本地化”人才的流出以及降低大学生返乡的吸引力，导致农村人才“空心化”？

杨森平：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我国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等措施，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能较好地解决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工作。这一政策不会加剧农村“本地化”“人才流出和农村人才”空心化，因为以市场化为主导，农村“本地化”“人才流出本身就是市场化行为，这些政策不出台这些人同样会流出，只不过这一政策让其能够更好地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

大学生返乡我想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主要厘清大学生返回农村做什么？农村能给他们发展空间吗？有空间这些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子有能力发展吗？我想鼓励有见识有专长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可能更现实。媒体宣传的极少数返乡创业成功的大学生不具有普

遍性，没有全面推广的价值。倒不如让农村大学生毕业先在城市就业工作，增长了经验和见识，将来有情怀有能力再回到农村去开创一片天地或许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卢晶亮：目前来看并没有这种担忧，粤西北地区城市即使是中心城市，落户政策基本都已经放开，但城镇化率相较于珠三角地区还有不小差距，仍需进一步提高。这就意味着除了落户政策，真正要吸引人才留下来，还是主要在于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振兴，但不一定意味着都需要大学生。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和创新创业带头人。随着乡村产业的振兴，我相信自然有大学生向乡村地区流动。当然对于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如教师和卫生健康人才，确实需要政策吸引大学生加入。

5.目前阶段，农村地区应该着力加大教育资源总量投入，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覆盖面，还是应该优先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提升教学水平？

葛梦君：教育资源总量投入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当前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当前广东农村教育资源总量投入不足。首先，广东城乡适龄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差距明显。根据2020年广东省千村调查数据，18-29岁和30-59岁农村居民中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群占比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低14%和22%。其次，从全国来看，广东农村30岁以下青年居民教育水平落后江浙地区。2015年江苏和浙江18-29岁农村居民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群的占比分别比广东农村高约8%和2%。这些事实说明当前广东省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总量投入仍需加强，尤其是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因此一方面，应当适当加大对广东农村教育的资源总量投入，如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生均投入，加快农村教育设施硬件建设，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另一方面，应当持续优化广东农村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果，合理配置高中与职业教育的资源，着力加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6.除了强化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作用，如何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防止“养懒汉”行为？

葛梦君：我国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主要依靠以“低保”为主、以医疗教育就业等补充性救助项目为辅的综合化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其中，“低保”是对困难家庭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是一种典型的非劳动收入。根据经典的劳动供给模型，非劳动收入的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将减少个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因此“低保”可能会对劳动者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学者考察了“低保”对受助对象的就业行为发现“低保”受助者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工作积极性不足，而是存在年龄、健康、技能等方面的障碍。为了进一步激发困难群众

的工作积极性，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扩大补充性救助项目的救助覆盖面，构筑综合化的救助服务体系。我国医疗、教育、就业等补充性救助项目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些项目对提升困难家庭的人力资本，帮助其克服就业障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为“低保”对象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提高困难群体的劳动力质量。通过联合企业、专业培训机构等方式，为“低保”对象开展契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困难群体的劳动力质量。此外，还可以借助政府力量创造更多的公益岗位，提高劳动力需求水平，通过公共就业为“低保”对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谢宝剑解 读“毛地”入市



背景材料：

“毛地”是指未达到手续齐全（有集体所有权证，没集体使用权证）的土地或土地上盖建构筑物租约未

到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途为工业仓储、商服用地等，不能为住宅用地）。所谓“毛地”入市，是指未达到手续齐全（有集体所有权证，没集体使用权证）或土地上盖建构筑物租约未到期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允许上平台招商。“毛地”入市的用途只能为工业仓储、商服用地等，不能为住宅用地和公寓用地。

根据相关的政策，“毛地”入市项目应属于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范围或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图建库范围，已办理土地所有权证。而且面积须达到20亩以上，项目规划容积率也有一定的要求。另外，“毛地”入市竞投人须为南海区大沥镇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机构，未被记录入“毛地入市”改造主体“黑名单库”；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

于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拍等等。“毛地”入市要集体经济组织表决通过，申请立项的程序，而且入市方案要通过镇联席会议审核，才能上平台挂网成交，签订协议。

2019年，佛山市南海区出台文件规定，符合条件时可采用“毛地”入市方式进行改造。今年2月，大沥镇率先印发“毛地”入市项目选取市场改造主体工作指引，这意味着大沥镇“毛地”正式允许入市。《广州日报》邀请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对“毛地”入市进行了解读。

专家介绍

谢宝剑，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统评议专家、广东省综合改革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社会政策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港澳青年工作智库成员，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监事、广州市统战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及广州市、佛山市、梅州市、顺德区、南海区等地方政府及部门决策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从事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港澳经济与粤港澳合作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各1项，教育部、科技部项目各1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各1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项，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特区政府等委托的科研项目等40多项，多项成果得到国家和省主要领导和相关批示。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港澳研究》以及SSCI、SCI等重要刊物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并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8篇。

据了解，大沥镇先行先试的“毛地”入市，重在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具体包括：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推进出现瓶颈；无集体使用权证的土地不能上平台交易；部分土地因租约未到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低

产值土地资源盘活途径单一（低价出租或引入低产值行业）；改造周期、改造成本的双重制约，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宝剑告诉记者，首先，对村集体来说，“毛地”入市放宽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标准，利用市场力量，盘活土地资源，增加集体收益。不仅可提高村集体租金收益水平还能够提前对旧物业进行改造，升级了产业业态，降低了安全生产、消防、环保等隐患。

其次，谢宝剑认为，对市场改造主体而言，“毛地”入市政策可以制度性保障土地租约解除或者拆除工作完成后直接获得使用土地的权利，无需重新再上平台进行竞价交易，提前锁定适合企业发展的土地，降低企业用地获得成本和竞争压力，保障改造主体的市场利益。同时，在符合政策条件下，可获得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政府专项补贴，提高项目可行性。另外，他还认为，站在政府角度，“毛地”入市能进一步加快村级工业园改造，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提质，既释放了土地资源，增大产业发展空间，又创新了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加快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步伐，推进大沥镇乃至南海区新一轮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内容来源于《广州日报》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谈教育扶贫



背景材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大量的研究证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既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也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保障。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2012年以来，我国累计有514.05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高等教育向贫困生倾斜促进了社会的向上流动。对此，我们邀请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以及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几位专家，对教育扶贫谈谈自己的看法。

专家介绍

吴贾，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潘苏通沪港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2012年于西南财经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2014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关注儿童发展、同群效应和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教育部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资助。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Emerging Markets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IZA World of Labor: Article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韩昱洁，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乡村教育发展。曾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连续3年参与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撰写，为农村教育部分的主要撰稿人。曾在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政策简报《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获得广东省委办公厅采纳。

钱文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暨南大学经济学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广东省民政厅等部门多项课题，参与广东千村调查项目。

1.您认为我国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昱洁：教育扶贫的一个问题是，主要关注的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及其后的教育的扶贫。这个问题不仅是教育扶贫领域的问题，也是整个教育领域政策的问题。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提出，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其余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公共政策应该在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中投入更多的资金。

具体来说，一方面农村学前教育建设落后，幼儿在园率低。根据2020年千村调查的结果，第一，广东将近九成（86.55%）的行政村有小学，但只有一半的行政村（51.26%）有幼儿园；第二，公办农村幼儿园的比例不足50%，幼儿园的平均学费达到了每学期近3000元；第三，学前教育的布局也不尽合理，幼儿园平均离家距离3.5公里，相比下小学只有2.6公里的距离。数据显示，广东农村适龄儿童在园率仅85%左右，远不及小学和初中年龄段儿童近100%的在校率。

另一方面，我国关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财政支出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

吴贾：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从现在入手，解决教育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学者们达成的一项共识是，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了经济的不平等。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教育回报是比较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减小收入差距。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的情况是当地教育资源贫乏，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都与城市学校相差很大。因此，出生在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很难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人力资本积累薄弱。他们长大成人后也难以跟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竞争，低收入的困境也难以改变。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通过教育这一相对公平的渠道来提高收入，产生了代际贫困的传递。我国连续8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接下来，我们需要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农村、边远和贫困地区倾斜，比如，在农村地区通过提高教师补贴的方式，吸引优质的师资，以及给贫困地区学校改善硬件设施。

2. 您认为制约教育扶贫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吴贾：需要重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教育。农村地区的儿童家长由于观念上较为落后，对儿童早期教育没有足够重视。我们知道，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是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三个最主要因素。在上述三个因素中，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最早，作用效果也最久。农村家庭没有足够重视早期教育，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为“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也就是说早期教育投入会影响后期教育投入的效率。因此，早期教育投入的缺失会影响这些儿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习效率，进一步影响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其次，有一些技能的培养是取决于年龄的，这些技能需要在某个年龄阶段就进行培养，过了这些阶段无论怎样投入都已经晚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母语技能，只能在3岁前培养）。换句话说，儿童早期遭受一些技能的缺失后，后期是难以弥补的。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儿童早期教育投入，对家长进行早期教育理念的宣传，让他们重视对儿童的陪伴，是有助于提高这些儿童在未来教育投入效率的。

3. 教育在城乡平衡发展、缩小地域差距的过程中发挥着平衡器的作用，在新时期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过程中，教育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韩昱洁：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已经摆脱了以生存为核心的绝对贫困。但是，收入不平等及相对贫困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前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输血”只能解决一时，要防止脱贫返贫，长期来看还是需要培养农村居民自我“造血”的能力。我们也发现，农村居民当前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基于广东千村调查数据，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劳动力2019年每月平均工资为3409元，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每月平均工资高出前者近30%（4374元）。所以，从长期来看，提升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是持续实现农村增收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钱文文：新时期我国进入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要保证所有符合相对贫困标准的适学年龄儿童全部有书可读，还可以建立动态的贫困学生群体监测机制，跟踪确保教育扶贫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学生的学习生态，实现贫困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效阻止返贫和新贫困的发生。其次是加强农村学校的教学配置，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平衡城乡教育基础设施服务的差异，减小农村地区儿童和城市儿童教育资源的差异，降低升学差距。最后教育扶贫是多方面的，对于不同的学生，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就业能力培训，给予他们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还要注重对贫困学生的心理疏导，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态度，增强自信心，积极提升自身反贫困参与能力。

4.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育扶贫的核心工作，您认为怎样做到应助尽助、防止辍学？

韩昱洁：根据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我们发现2020年初中年龄阶段（7-12岁）的儿童在校率仅为96%，还有4%的儿童不在校。这些不在校的儿童大多来自家庭情况较差的家庭，父母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收入较低，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这说明农村在控辍保学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通过进校入户、明察暗访等形式，对不在校儿童进行劝返，让他们能重新学习。

钱文文：对于教育扶贫，首先要保证所有适龄的贫困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健全应助尽助救助机制。对于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要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全面落实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政策。同时对于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学生，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实际生活条件，可以相应补贴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提供助学金。有些地区还会针对就餐情况，为学生提供营养改善计划，双向保障贫困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其次要健全依法控辍治理机制。对于目前就读的贫困儿童，可以建立专门的档案信息库，定时摸查更新学生情况，及时发现有学习困难、家庭困难，疫情影响等而有辍学倾向的学生家庭，针对各项情况提供不同的帮助遏止辍学的念头；对于已辍学的适龄儿童和少年，要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一人一案的工作方案，在宣传方面切实做好劝返复学工作，在实际处理方面保障他们必要的生活和教育需要，综合运用感情、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方式促进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5. 您认为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发挥增收效果？达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效果？

吴贾：对于当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职业教育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第三方购买的方式，支持职业培训机构，降低它们的学费；另一方面，让这些职业的需求信息公开，以及要降低职业培训的门槛。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国政府也在逐渐重视职业教育，建立了一些职

业教育的学校。社会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也应该同步发展起来。

钱文文：为了让职业教育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发挥更好的效果，首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在普通高中教育之外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条路，解决他们升学困难的问题。地方政府要大力宣传，鼓励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国家和学校双方对于贫困学生的就学也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例如减免学费，提供生活和学习费用的补贴，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愿意更小压力的接受职业教育。

其次要更大力度的保障职校毕业的学生顺利就业。要加强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团队的质量，构建与职业培训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体系，在理论知识方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职业学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强化实践的方式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并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只有素质和技能相匹配，职校毕业生才能在就业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高技能人才的薪资也会更高，才能真正达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效果。

6. 您认为乡村教师面临什么压力？应该如何提高乡村教师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钱文文：在农村地区教学的各项条件，不论是经济、环境还是社会地位，都不如城镇地区，乡村教师面临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首先农村学校设施差，教师工作条件艰苦，很多乡村教师难以坚持，无法安心工作；其次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最后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福利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相差较大，发展前景不乐观。以上种种，都会打击乡村教师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整体的教学质量。

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现状，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是必须的。那么首先就要提高师范毕业生去乡村教书的积极性。从经济水平上来看，可以加大力度实施乡村教师补助计划，将乡村振兴的资金倾斜一部分注入教师工资和福利，尽可能减小乡村教师和城镇教师的待遇差距；从环境上来看，跟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在发展

农村环境,改善农村生活交通条件的同时,也要加强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师生活待遇;从发展前景来看,要加强学校治理,净化教师职称竞聘环境,回应乡村教师的职称诉求,实施城乡全面双向轮岗让所有教师评职称机会相近、增大高级职称教师下乡任教的概率。

其次,要提高乡村教师的教学质量。在校培养方面,师范院校应开展乡村教师专业化课程研究,让师范生学

习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具备一定的乡村教学技能,拥有科学合理的农村观和积极的乡土情怀。就职方面,学校要给老师配备相应的培训计划,内容不限于教育教学,培养教师设计课程的能力,以更贴近农村地区学生的学习习惯;要改善学校的网络条件,减免教师网费,让老师能从网络平台上获取更多有用的知识来辅教学。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谈城乡居民养老



背景材料:

日前,广东省民政厅牵头拟制了《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计划到2025年,广东省基本建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构建城乡覆盖、功能完善、服务多元、监管到位的全方位“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当前,广东的人口老龄化及养老服务现状如何,十四五期间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对此征求意见稿做出了政策解读。

专家介绍

李书娟,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乡村治理。曾在《世界经济》《经济研究》等知名期刊发表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及广东省自科项目。参与国家民政部、广东省委改革办等多项政府横向课题。连续3年参与广东千村调查研究报告的撰写,为农村养老、乡村治理内容的主要撰稿人。曾在新华社、《南风窗》《羊城晚报》等权威媒体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

杨哲,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家庭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曾在Population Ageing等期刊发表文章。曾在澎湃新闻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1.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有哪几种?此次广东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建设全方位“大养老”服务格局,如何看待这几种养老方式的关系?

李书娟:我国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及社会服务养老三种模式,另外还有一些结合养

老方以及新型养老方式,比如居家养老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医养结合机构养老,以及旅居养老和抱团养老等。具体养老方式上,我国已从单一家庭养老为主转变为多种社会养老形式。居家养老即老年人居住在家中,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提供赡养服务;机构养老是指在专门的养老机构养老,这些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的机构。社会养老是针对我国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的现状,从社会角度提供给老年人的帮助服务。是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生活所需的服务。近年来出现医养结合、康养结合、农村互助式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同养老方式从原本的边界清晰变得有所融合。《征求意见稿》要求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就是要发挥家庭、社区和机构各自优势,促进各种养老服务方式融合、一体化发展。家庭养老的优势是让老年人身处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机构养老的优势是专业化、标准化的养老服务;社会服务养老的优势在平台和连接,即一边连接着对其有充分信任感的老年人,一边连接着各种养老服务供应机构。在我国的儒家文化环境下,家庭养老是各类养老方式的基础,不仅不能削弱,还要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社区养老服务是关键,要调整思路,共建共享,精准聚焦;机构养老是补充,要重点发展社区化、小型化、连锁化,“三化”养老机构。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互助式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仍然以家庭、社区、机构等传统养老方式为基础,进一步结合了老年人医疗、健康、养生、旅游等个性化需求,以及农村常住年轻人口减少的现实情况。

杨哲:家庭养老是传统养老模式。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故土、家庭观念非常强烈。因而,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一般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几千年来中国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主要靠的就是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经济上的供给和生活上的照料。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养老需求也日趋多层次多样化以及个性化发展,因而要发展现代化的居家养老。现代意义的居家养老,同传统的家庭养老不同。虽然老年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庭中,不

仅家庭成员提供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而且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志愿者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政府则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居家养老把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是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和超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养老服务。

根据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为了满足新时代养老需求,我们应该把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归根结底是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和超越,是一种社会化养老服务。

2.如何解决农村地区推行社区养老所需的土地问题,如何进一步统筹推进城乡养老设施建设?

李书娟:一是利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契机,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借助当前政策加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盘活农民未承包的集体所有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及三产留地,用于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二是充分利用村庄的旧学校、旧厂房等闲置集体资产进行养老机构、设施的改建。三是民政、财政等政府部门要对社会力量兴建的养老设施、机构积极划拨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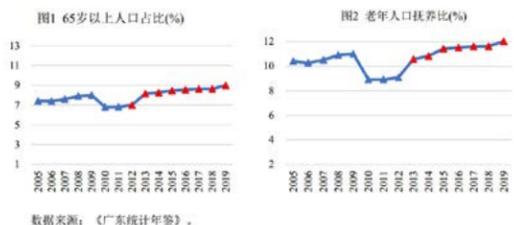
除用地问题外,缩小城乡养老差距,很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农村养老社会化程度。一是要放宽农村养老领域对社会资本的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养老院、医养结合等养老设施及项目建设,或通过政府购买方式为农村孤寡老人提供专业化照料服务。二是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养老模式。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老人,可以依法获得集体资产收益;村集体应该用集体经济收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险购买、养老机构开支补贴、养老服务购买等养老福利。三是发挥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天然优势,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

杨哲:在农村推行社区养老,首要任务是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供地政策。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养老产业发展的引导和扶持,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供应纳入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相关项目建设，让正规养老机构能够顺利落地。其次要鼓励各地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充分整合农村的社区资源农村社区具有丰富的资源，既包括农村社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也包括农村社区的人力、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整合农村社区存量资源，挖掘农村社区潜在资源。一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自然资源，支持各地利用校舍调整、医院改造、废弃厂房等，增加农村养老服务用地，同时将养老服务的合理用地列入土地划拨的基本目录，保障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基本建设用地，确保政策用地用于养老服务领域。

3. 广东目前现有的社会条件能否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如何让居家老年人安享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李书娟：广东早在2012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比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12年当年常住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到2019年年末，这一比例上升至9%，并且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意味更多养老需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大幅度上升，但鉴于老年病的特征，常规的医疗服务通常又不太适应养老需求。社会“老年病”常发、易发和突发性，加上车祸、失能、半失能的康复治疗 and 看护问题也困扰着千家万户。而现状却是——医疗团队和康复互相独立，疗养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养病人，一旦患病就不得不经常往返家庭、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既延误治疗，也增加了家属经济负担。医疗和康复的分离，也致使许多重病的人把医院当成养老院，成了“常住户”。“病人‘押床’，使其它

需要住院的人住不进来。医养结合一方面可以免除老人频繁往返于医院和养老机构的麻烦，另一方面又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紧张，提高医疗机构床位周转率。

相比较而言，广东省的医疗资源供给不充分，医养结合更能适应养老服务发展需求。一方面，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省基础医疗资源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广东为47张/万人，位于全国倒数第二；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9人/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不仅基础医疗资源缺乏，且正式医疗机构负荷重。2019年，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8.92亿次，为全国提供诊疗次数最多的省份；入院人数1816万人，达到全国第四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在广东省内，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珠三角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常住人口集中在该地区。2019年珠三角地区集聚了全省56%的常住人口，东翼、西翼及山区常住人口比重分别是15%、14%及15%。医疗机构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不够匹配，从每万人医疗机构数来看，珠三角地区这一指标垫底，每万人3.88家，低于东翼、西翼及山区的4.88、5.74及6.49。从每万人床位数看，珠三角地区也低于西翼地区和山区，每万人床位数为48张。

现有的医疗机构及其分布无法满足广东常住人口的养老需求，应当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解决养老问题中的看病问题。广东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推进医养结合提供制度保障，2016年省政府出台的《关于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今年省卫健委印发的《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等政策陆续对促进医养结合工作做出制度安排。

目前省内各地区医养结合发展现状和起步条件不平衡。拥有先进医疗资源的广州深圳，已有较丰富的医养结合经验，如深圳市创新建立的医养融入社区的“罗湖模式”。而二三线城市及欠发达的粤北、粤东、粤西乡镇地区资金、医疗、社会福利等资源供给不足，限制了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因此这些地区发展医养结合应以增加医疗和养老资源供给为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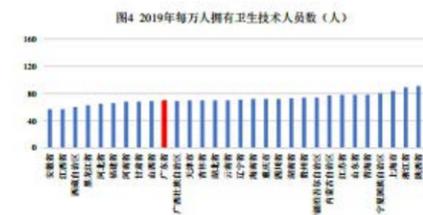


图4 2019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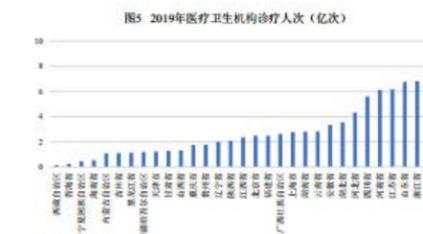


图5 2019年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亿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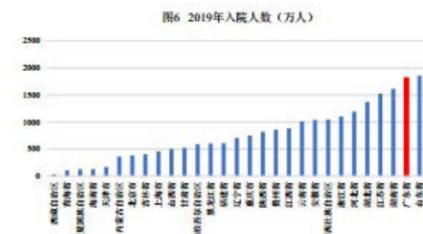


图6 2019年入院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5 2019年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亿次）

要推行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一方面可以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医养资源整合。鼓励社区（乡镇）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乡村卫生院）进行合作，通过定期组织医疗巡诊以及康复护理等服务，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面需要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智慧化、数字化。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构建老年人需求评估系统、健康监测系统、居家养老服务系统，对居家养老家庭适老化改造，为居家老年人提供远程健康监测、紧急求助、远程医疗、上门照护等服务。

杨哲：医养结合，即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是指面向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提供所需的医疗卫生相关服务，现有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合作，发挥互补优势，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广东省要推进医养结合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人才体系、信息体系的建立，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在政策层面，简化创办手续，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流程和政策环境。医养结合机构兼具医疗卫生服务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新办医养结合机构涉及卫生健康、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推行实行一站式办理。

发展多形式的医养机构，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床位设置以老年、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强化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建立医师执业区域注册制度，鼓励医师在医养结合机构执业，促进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养老机构依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等相对成熟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具体比如可以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中心，打造快速医疗服务圈；在乡镇和街道以管理区域为中心，设定医疗服务半径不超过十公里。选派有经验的人员担任居家医养专职医生，成立医养结合服务团队，提供巡诊服务。

最后建设现代化医养结合电子化平台，创新医养服务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老人和医养机构的远程协同服务平台。一方面老年患者可以得到专家远程会诊，另一方面医养机构提供智能监控管理，监测老人的生理指标。医养服务电子平台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康复指导、远程教育等服务，实现医养结合机构与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数据互认共享。医养电子化平台节约了医养结合机构中老人看病的时间成本，提升了诊疗效果。

4. 此次文件中提到要加强对有特殊困难（空巢、留守、失能等）的老年人家庭加强巡访，除了定期巡访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关爱特殊困难老年人？

李书娟 借鉴其他地区做法，加强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关爱。比如，落实对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增加以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照护为主的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供给，优先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无偿或低偿托养服务；通过政府补贴、公益慈善组织捐赠、爱心社会力量捐赠等方式资助特殊困难老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人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发展家庭照护床位和上门照料服务。

落实广东关于保障特殊老年人的福利措施。《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与特殊困难老人相关的措施：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农村低收入人口范围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和老年人家庭情况，合理确定每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资助标准；全面落实高龄补（津）贴和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补助、购买服务等方式，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实行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需求。

杨哲：农村有特殊困难的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所占比重比城镇更高。他们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甚至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日常生活

需要别人照料。在家庭成员越来越难以承担空巢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重担的背景下，健全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除了定期巡访之外，社会化养老服务应该探索农村综合性养老模式，依托行政村和较大自然村，发展兼具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互助式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年轻人白天要劳作，家里老人无人照料，日间照料可以为他们的老人提供必要服务，也可以解决目前许多老人的做饭送餐问题。短期托养则可以有效缓解照顾老年人的家庭成员的压力。互助式养老，就是年龄小的老人照顾年龄大的老人，身体好的老人照顾身体较差的老人，老人之间互相帮助，共度晚年。

5. 前段时间，一些预付型养老机构相继暴雷，让许多老年人蒙受大量损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

李书娟 近几年兴起的预付型养老机构，在资金管理上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一些养老机构打着“预付卡”、“贵宾卡”、“以房养老”的幌子，而实际上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全国老龄办、公安部、民政部、银保监会四大部门也对此进行了风险提示。对此，需要合理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养老机构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对养老机构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具体来看，一方面，我国的养老服务供给确实存在明显短缺，亟需社会资金参与进来。在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取消了对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降低了养老机构准入门槛，促进社会资金进入市场。但另一方面，门槛的降低也为其监管带来了更高要求，建议严格限制养老机构的预付金额和预付期限范围，并且要求募集资金采取商业银行等第三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大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查处、打击力度，将问题企业及时清出市场。老龄办、民政部以及银保监会也可以联合定期发布民办养老机构“黑名单”，及时对进行风险提示。

杨哲：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市场也发现了养老市场的巨大商业价值，在养老市场规范化之前，各路人马迅速进场圈地，导致诸多乱象。这些预付型养老机构的相继暴雷就是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有的企业初衷不是做养老，而是想从市场圈钱。裁判文书网显示，养老机构大多以高额分红利息利诱老人，签订所谓的服务合同，但资金实际用途并没有用于相关服务上，这成为养老机构暴雷的最大原因。暴雷公司大都承诺老人高利息回报率，以此为诱饵诱导老人交钱。这种预付型养老机构是依靠拿着老年人交的钱，盖房子买设备，加上支付前期老人的高利息以及高营销成本，这样钱越来越入不敷出。综上这样的预付型养老机构玩儿的是庞氏骗局，最终暴雷是必然的。

预付型养老机构的频繁暴雷表明目前新型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亟待完善。自2019年，根据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改为登记和备案管理，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事中和事后。然而由于事中事后监管落实不力，管理陷入虚化。基层民政部门反映，随着养老机构在民政部门从注册到备案的审批要求变化，养老院先建设再备案、先经营再登记等现象层出不穷。事实上，暴雷机构大多没有在民政部门备案，也未享受相关补贴，而民政部门仅握有对享受床位补贴的机构采取停发补贴的权限，对违规机构约束力度过小。针对监督不到位的情况，政府的监管要进一步明确事前审批、事后经营、日常督察、打击惩处“全流程”各环节的主体责任和追责办法。

其次，目前的监管权力过于分散。通过预付型养老产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养老骗局涉及民政、金融、工商、公安等多个监管部门，但实际上各部门多头监管演变为无头监管，发现苗头甚至都难以执法、不敢叫停。所以必须建立起部门协同、行政管理的细则流程，明确各个部门权责，甚至可以考虑将防范类似案件“暴雷”纳入部门考核，杜绝官员为风险机构背书等行为。

最后，养老行业乱象与其当前的发展困境有关，要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根本在于平衡公益性与盈利性，加大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从拓宽抵押担保范围、创新信贷方式等方面入手，提升正规民营养老机构融资的可获得性。对养老机构为弥补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通过销售预付费性质等形式进行营销的，按照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限制性条件，采取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在做好政策宣传和风险提示的同时，提高消费者明辨真伪的能力最能直接保障老年人的利益。个人在选择养老机构入住时，要注意查看相关证件并按规定签订养老服务协议。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也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项目收费标准，并畅通咨询、举报渠道。

“粤台农林 34 条”为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和融合发展增添新动力



作者：王鹏，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5月28日，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研究论证，广东省政府台办会同省农业农村厅、林业局、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正式发布实施《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粤台农林34条”）。这是继今年3月17日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22条措施”）后，祖国大陆台资农林企业投资聚集地出台的第一份省级层面的贯彻“农林22条措施”实施文件。“粤台农林34条”的出台，是广东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十四五”时期台胞台企参与祖国大陆乡村振兴战略，分享大陆改革开放发展机遇，实现在大陆农林领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东实现从一个农业省向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全球重要制造基地的历史性跨越，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为

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生动缩影。广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并积极支持相关科研院所开展“三农”问题研究。今年5月10日，广东省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这是广东省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的关键节点，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有力推动广东“三农”工作走在全国第一方阵。5月19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成立聚焦乡村振兴研究的智库之一，有助于进一步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加快建设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智库平台，助力打造扎根南粤大地、辐射全国的一流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和实践基地。

目前，台资农林企业在广东省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均有布局，投资遍及农业种植、水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饲料肥料生产、休闲观光农业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此次颁布的“粤台农林34条”涵盖农地林地使用、融资便利和政策支持、投资经营、人才和技术标准、开拓内销市场等五个方面，共34条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鲜明特点：

第一，在全面贯彻“农林22条措施”精神内涵基础上，将其中原则性的规定进行细化、实化和具体化。例如，第1条对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通过流转取得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赋予了国家法律保护，规定“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到期后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继续租赁”；第4条对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生产活动的土地使用做了具体规定，允许“与生产农产品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粪污处置、检验检疫，以及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设施用地纳入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可依法依规使用一般耕地等。

第二，针对台湾同胞和台资农林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加大涉农涉林贷款投放和优惠政策支持。例如，第5条规定对在广东省从事农林领域生产经营的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按广东居民和企业同等条件享受农业、林业保险保费补贴等相关惠农政策；第6条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对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进行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设施、农业投入品采购及农产品收购等给予贷款贴息补助；第7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台资农业企业可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进行直接融资，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用评价模式，提高台湾同胞和台资农业企业信贷比重等。

第三，鼓励和支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来粤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参与广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例如，第13条规定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参与广东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批发市场等项目运营，参与产地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建设且符合条件的，可与广东省居民和企业同等条件申请享受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批发市场等项目运营的相关资金支持；第14条明确支持台资企业来粤投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精致农业、体验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林领域发展并从事相关业务等。

第四，鼓励台湾同胞和台资农林企业聚焦研发创新，推进广东农业高质量发展。例如，第15条、第16条规定支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参与广东优势特色农产品开发、农村人居环境（含农房）整治、美丽乡村、乡村旅游、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利用等方面的乡村生态宜居建设项目，支持参与重型农机、渔业装备、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的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第20条、第23条规定加快台资农林企业在工程建设、林木良种培育、造林种草、防沙治沙、经济林生产经营、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的审核进度，重点鼓励在高品质农产品新品种培育、高效环保农业新技术开发及应用等方面合作，促进粤台两地农业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等。

第五，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有融入“台湾元素”，持久深入精准推动两岸乡村融合发展。例如，第24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

基地，深化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第26条、第29条鼓励和支持国家和广东省政府批准的涉台农业园区发展，支持拥有水利先进实用技术的台资企业积极申报先进实用技术纳入“水利科技推广指南”，并通过“水利科技推广指南”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水平等。

第六，充分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突出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特色。例如，第31条鼓励支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在广东省参与茶叶、水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制定、实施，共同促进两岸标准互联互通；第33条、第34条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和“粤贸全国”活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广东供销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等。

广东是台胞台企最早登陆和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粤台农业林业交流合作起步早、基础好。当前，广东正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粤台农业交流合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前景。此次“粤台农林34条”的颁布，进一步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在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申报农业和林业龙头企业、自创品牌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为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和融合发展增添具有“广东元素”的新动力，探索谋划两岸农业农村多元合作的新模式，奋力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内容来源：华夏经纬网

杨森平：如何加强落实金融服务新型农业主体？



背景材料：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和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召开全国金融服务三农视频会议。会议指出，金融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扶贫）部门与金融机构密切合作，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当前，我国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究竟如何？应该怎样进一步加强落实金融服务新型农业主体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对此采访了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杨森平，对此进行政策解读和答疑解惑。

专家介绍

杨森平，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十二届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特聘研究员，广东省税务研究会副会长，第一届广东省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理论研究会会员，民建

广东省委委员、省委监察委员会委员，民建广东省委理论研究会主任，民建广东省委参政议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暨南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民建暨南大学主委。研究领域：财经理论与政策、社会保障制度。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目前我国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如何？薄弱点有哪些？

杨森平：在近几年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全国各地政策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扶持力度，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对于农业科技应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村乡村振兴有较好示范作用，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以及带动农民增收的惠及“三农”的有效组织形式。

薄弱点：1、银行对接频率不同，受贷款额度影响较大；2、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质要求较高，审批流程漫长；3、续贷问题，政策可持续性不强，部分为地方国企帮扶摊派，主动性不高；4、产品及半成品较为原始，附加值不高，销售渠道较为单一，经营风险较大。

2. 在农村地区或农业领域发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杨森平：1、金融机构管理半径大、范围广，无法兼顾过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预测性及盈利性较低，增信较弱，抵质押、担保类强增信措施难以进行，不良风险概率较高；3、较难进行标准化评估，受地方政府及组织影响较大，存在寻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及经营主体额外负担。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和特点有哪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和非农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有什么不同？

杨森平：融资需求和特点：1、着重前期的项目贷款及后续的日常流动资金季节性贷款；2、项目贷款前期投入较大，现金流测算短期难以回正，自有部分出资较为困难，“四证”即《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开工许可证》不齐全，因合规性问题导致无法贷款；3、日常流动资金贷款，为季节性短期贷款，一般回款较慢，周期性长，现金流易短缺。

不同：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更加强烈，自有20%-40%部分外，其余部分基本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解决，通过自身股权融资及发债等直接融资困难；2、融资成本要求足够低，受自身盈利性及回报率较低特点决定。

4. 如果金融机构要面向新型农业主体开发专属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应当注意哪些方面？根据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应当如何制定差异化的贷款政策？

杨森平：1、积极引导宣传，信息及时传达，加强信息共享，健全名单发布制度，加强银企融资对接；2、引导金融机构进行信用贷款、动产质押贷款、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等；3、引导通过政府专项债、公司债券、股权等公开市场进行融资；4、增加农业保险品种，减少新型农业主体的投资风险。

如何制定差异化的贷款政策：1、金融机构对区域的新型农业主体编制详细在册登记，定期（每月）收集金融需求，定期反馈结果，政府惠农政策积极宣导；2、金融机构根据新型农业主体的特点制定较为标准化产品类别，分别采取抵押、信用、质押等方式，在风险把控

的前提下衍生上下游供应链金融，对账期进行优化缩减，农业主体早拿到钱，资金更大效率利用；3、政府发行政府专项债力度倾斜，对成熟、新兴、发展中等不同状态的新型农业主体给与不同的支持力度，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4、鼓励企业混改并购，提高企业活力和创新，对于并购贷款、员工持股融资等给与大力支持，鼓励做大做强。

5. 如何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和加快建立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杨森平：1、金融机构引导，对于授信客户匹配对应农业保险，保障金融机构及新型农业主体的利益；2、政府引导，对于管辖区域的新型农业主体通过政府集中补贴方式鼓励主体购买；3、税收优惠，对于新型农业主体购买农业保险给与税收优惠减免，惠农助农；4、探索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模式：创新风险分散渠道，拓宽保险资金来源：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权）等金融工具联动，扩大“保险+期货”试点范围。从局部重视省份向全国推广，从部分品种如玉米、豆粕向更多的品类推广（需要期货交易所研究上市相关品种）。5、拓宽农业保险服务领域、提高农险保障水平：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上的一揽子综合险，定制多元化、针对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产品。6、加强技术创新，推动基于新技术应用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创新：利用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实现“按图承保”和“按图理赔”，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经营成本高和服务效率低等难题。

6. 针对广东省新型农业经营现状，广东省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包括金融类）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杨森平：业态：“互联网+农业”，链接上下游资源，促使了传统农业加速与互联网融合，打通了农业生产、流通和服务全链条，重构了互联网农业的商业模式。

模式：带零售功能的大型前置仓+物流点+线上销售平台+物流配送(1-4小时)，进社区进家庭，成本更低、覆盖更广、模式更轻、效率更高、更容易规模化。

特点：遍地化，进入门槛低，成本低、风投机构认同、股权融资较为容易。

7. 政府和市场分别在推动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森平：政府可通过政府专项债、金融机构窗口指导及融资政策支持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入血液，引导保险机构及支持国企、大中型企业混改并购，优化市场主体。

市场可通过行业发展数据及市场风口，引导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投向，促进如互联网+、有机农场等资金涌入，推动行业发展。

8. 大中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分别在推动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森平：大中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1、要缩小大中型银行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存贷比，扩大其在农村地区的贷款规模；2、对政府鼓励的政府专项债鼓励额度倾斜，利用额度优势优先分派资金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3、提供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支

持，根据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及较为完善的行业认知，制定标准化的信用贷款政策；4、创新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质押融资及供应链融资；5、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公司债券、超短融、中期票据和撮合股权融资，积极推介，争取更低的市场利率和更好的优惠条件。6 增加农业保险品种，减少新型农业主体的投资风险。

民营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可发挥以下作用：1、覆盖区域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到客群尽可能全覆盖；2、设置不良贷款较高容忍度，鼓励地方性中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3、鼓励较为创新型业务发展，鼓励差异性的金融创新和服务。

家庭经济专题

【财经】冯帅章：如何通过婚俗改革消解婚恋市场的不平衡



编者按

近年来婚恋市场出现变迁，竞争和焦虑加剧，如何通过婚俗改革消解婚恋市场的不平衡？近日，《财经》杂志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以下为《财经》杂志报道原文：

58岁的徐州红娘鲍淑侠搭建的“鹊桥”平台，每天晚上7时30分至10时在社交平台直播相亲。

6月16日晚，直播间人不多，主动连麦的男女比例是5:1，一名中年女士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简单介绍了女儿学历、身高。男方则踊跃得多，有母亲为24岁的儿子征婚，还有50岁的离异男士，他们都强调家里有房有车，甚至直言“不止一套房子”，只有一名

38岁的男士坦承“没车没房，初中学历，身高也不高”。

“男孩多，女孩少。”从事红娘30余年，鲍淑侠总结当前婚恋市场的供需。据她观察，农村矛盾更突出，这几年，徐州的一些村庄出现不少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礼因此水涨船高，从1.1万元涨到6.6万元、8.8万元，这几年又变成15万元、20多万元。这还只是彩礼，“结婚没有房子，门都没有。农村有房不够，还要在县城或市里买房”。

与鲍淑侠观察到的农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况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红娘范本良则注意到条件优秀的大龄未婚女性的尴尬，即“剩女”现象，而在结婚关头，男女双方常因房子问题“谈崩”。

婚恋市场的变化，或许可以套用当下流行词汇“内卷”来概括。内卷通常指向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不良竞争。

因为结婚条件谈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几代人为此烦恼并四处凑钱，这让鲍淑侠深有感触。最近几个月，她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呼吁遏制高彩礼现象。范本良也常常以身说法，希望婚龄男女摆正婚恋观。

这与当前的风向相合。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今年4月，民政部公开表示，同意将河南、广东、辽宁等15地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这场变革能缓解婚恋市场的竞争与焦虑吗？

经济落后地区彩礼更高

鲍淑侠隔三差五发视频，呼吁“打压高价彩礼”，最近她在视频里讲了一个故事。徐州一名男孩连续三次登未来岳母家门，穿着同一件衣服，引发对方的疑虑，并向“媒婆”鲍淑侠打探男孩的经济状况。男孩后来对鲍淑侠说，“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爸妈给我买车买房，还准备彩礼，我也得节省花钱。”

这个回答让鲍淑侠“揪心”，再加上她这些年了解到一些因结婚条件崩塌，导致当事人自残、跳楼的案例，因此鲍淑侠在说媒前会向女方表明，不能索要高彩礼，否则拒绝说媒。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分化、县乡治理研究。杨华从2007年起常去农村调研，在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彩礼是其关注点之一。

杨华告诉《财经》记者，彩礼通常被视为结婚“六礼”之一，是典型的乡村传统民俗。近些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少则十几万元，多则30万元。“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村家庭‘望婚兴叹’，还让不少人致贫返贫。”

农村“天价彩礼”逐渐引发社会关注。杨华表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通过约束性强的措施治理农村“天价彩礼”，最近中央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通过移风易俗、净化风气，解决‘天价彩礼’等问题，使农村家庭的文化性支出回归合理。”

冯帅章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基于北京大学相关数据追踪调查，冯帅章的团队分析了1980年到2015年间的彩礼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婚嫁支出明显增加，显著高于收入增幅，“彩礼作为婚嫁里重要的一部分费用，从1995年开始，攀升的速度惊人”。2000年，全国平均彩礼支出超过1万元，之后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快，2010年达到2.8万元左右，“到2015年，全国平均彩礼达5万多元，相比五年前增幅超过60%”。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彩礼负担更重。冯帅章的团队分别比较农村和城市彩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后，得出结论——虽然农村地区的彩礼绝对数字不一定更高，但彩礼支出是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倍多，而城市约为两倍。

冯帅章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彩礼水平相对更低。比如，2010年—2015年全国彩礼平均为3.5万元，广东省平均1.6万元。到2020年，广东农村平均彩礼价格为2.66万元，是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倍多一点。整体来看，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彩礼负担更重，基本为当地人均收入的5倍以上。这说明，彩礼金额不仅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有关，且与各地婚俗和文化密切相关。

通过多年调研，杨华总结出彩礼高低的三条规律。他介绍，“一般情况下越往中西部地区走，彩礼越高。女孩子往东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的男性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高额婚姻成本；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当地男子要想娶妻，就得提高自己的性价比，给得起更高的彩礼；另外，在婚姻市场中，家庭条件越差、儿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高。反之，女方就索要较少。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开出比其他家庭更好的条件。”

为何婚恋成本高昂

婚恋市场竞争加剧，焦虑波及父代。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江山市，农民张勇（化名）的儿子交了女友，女方家索要18.8万元彩礼，这是当地农村的一般水平。张勇家按此准备，可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女方又提出要在城里买房，这意味着张勇需要再筹措100万元，甚至200万元。“我们哪能拿出这么多钱买房？”

张勇说，这几年在当地农村约有一半的适婚女孩及家庭要求男方城里有房，有些姑娘把结婚当作改变生活的跳板，张口就是城里有房、家中有车。约一半年轻人结婚要依靠父母打拼，“有的男方家庭，一结婚就负债累累，可怜的是父母”。张勇所在的山村人口不到500，30岁以上未婚男性就有将近20人。

2010年，杨华去豫东农村调研。彼时河南兰考县农村彩礼接近10万元，在当地农村，谁家房子建高院墙、贴瓷砖，就很好找对象。他了解到一个案例——一个27岁左右的男孩，在当地属于大龄青年，因个子不高，家有兄弟，家里很担心他找不到媳妇。但在建楼之后，“说媒的络绎不绝，并很快结了婚”。

2014年后，杨华再去豫东调查，结婚时男方村里有新房已无法满足女方的要求，“慢慢变成到县城买房”。湖北农村的情况也类似。2014年杨华去湖北调研，有一家村民，夫妻和儿子共同打工，凑钱刚在村里购买一处独栋别墅，以为这样可以很快娶到媳妇。“找人说媒，人家说村里的房子没用了。那几年，结婚的要件变得非常快。”

杨华认为，高彩礼和房子要求背后是婚姻成本问题，农村婚姻高昂的成本折射出当前超高适婚性别比问题。2010年是一个明显的节点，在此前后，90后进入婚恋阶段，这个年龄段推高了农村婚姻成本。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自计划生育后快速升高。据杨华介绍，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8.47，稍超出正常值范畴。到了1990年，则升高到111.87，已高出正常值许多，2000年时进一步上升到116.96，已属于超常规性

别比。“也就是说，从80后开始，适婚农民就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到90后、00后时，性别比更悬殊，直接后果是有一批适婚农民难以找到配偶。”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在超常规性别比下，90后的女性更少。进入2010年后，90后男性也进入婚龄，这就导致90后的适婚女性更稀缺。“这便是2010年之后，农村婚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男方家庭压力越来越大、女方要价越来越高的原因。”

冯帅章在研究中关注到因高额彩礼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一些村民因婚致贫返贫，甚至出现“光棍村”，在某些情况下，彩礼演变成一种代际剥削，父子两代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农村老人养老也带来压力。

在大城市，谈婚论嫁也非易事。在上海，68岁的范本良早年从业余红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热心于无偿为婚龄男女牵红线，至今做公益红娘已38个年头，服务单身者1.6万人，帮助4000人成功结婚。“社会需求量（脱单）很大。”范本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最近五六年来，令范本良深有感触的是，婚龄男女常因房子问题“谈崩”。“现在如果男方没房，女方多数不肯结婚。”

范本良称，在上海，男孩家里如果只有一处房，即便是三室一厅也很难找到对象，因为年轻女孩更倾向与公婆分开住。2020年，她的公益红娘工作室介绍了一对未婚青年，两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卖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亲仍嫌房子太小，两人因此“吹了”。

婚姻稳定性下降

婚恋市场竞争“内卷化”，还引发一些反常现象。2020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马军、宋逸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全球健康》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女性青少年在1990年—2015年间的结婚和生育趋势。

根据两人的研究，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00年的1.2%，但在2015年反弹至2.4%，这种已婚率和生育率反弹是一种普遍现象。2015年，农村地区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约比城镇地区高3倍。西部省份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或生育率更高。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比较明显，这是杨华调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这些地区，预期婚姻压力会更大，彩礼也因此看涨，男方家长会倾向于让儿子早婚。从女方家庭来说，女儿越年轻，越要得起高价，一旦过了通常的结婚年龄，会被认为“嫁不出去”，行情下降。

2020年下半年，杨华回湖南老家农村听说了一个故事。他的老家村旁在修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有一位中年工人半夜痛哭。有人问起原因，这位工人称，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给女方30万元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女方不要新房子，自己再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60万元彩礼。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后面两个儿子要打光棍，就觉得愧疚，不由得大哭起来”。婚恋市场变化带来的社会焦虑和精神压力，不仅体现在中年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尚年轻的农村父母也“焦虑万分”。

鲍淑侠在社交平台呼吁善待婆婆。她提到，一些年轻人拿婚恋当儿戏，“说不合适就分手，一吵架就把离婚挂嘴边”。当地农村，女性二婚也能嫁出去，再嫁还要彩礼。“农村的婆婆在家里只能忍着，孩子也是扔给婆婆带。”

早婚带来一系列问题。杨华分析，其中之一是早离现象，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农村，很多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他们心智还未成熟，婚姻由父母安排，又因双方外出打工和生活压力，没有足够时间相处。等进入婚姻生活，矛盾丛生，很容易离婚。早婚男子离婚后，很难再婚，因为难以承担得起第二次婚姻的成本。为了不让儿子离婚，中年父母就得事事迁就年轻媳妇。“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对子代的责任无限延长，‘老人不老’成为农村常态。”

因离婚或中断婚约，又会导致彩礼纠纷。杨华调查发现，在许多地区，彩礼纠纷是乡镇司法所调解工作的一大类，在一些地方占到三分之二甚至一半，有一些还会闹上法庭。有的地方还出现诈骗事件，有团伙组织年轻女子不断与男子相亲、谈婚论嫁，给付彩礼后再悔婚。

冯帅章的团队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这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等。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波动上升，2000年—2014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在8.2‰至8.7‰，低于全国的粗结婚率。最近六七年，全国与广东的结婚率都逐年下降。近20年来，粗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不过广东的离婚率目前仍低于全国水平。

另外，全国的初婚年龄推迟。冯帅章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初婚年龄一度下降，进入上世纪90年代逐步上升，1990年全国初婚年龄是23岁，2010年推迟到约25岁。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将近26岁。

多重因素导致晚婚现象普遍。冯帅章认为，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的比例提高，经济地位相应提升，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下降。此外，现代男性和女性，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和婚姻期待都变高，维持稳定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而传统婚姻定义和性别观念的变化比较缓慢，并没有赶上近年来经济社会变迁中两性之间的变化。“女性总是希望找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比自己更强，至少不弱的男性。如果这个观念不进行一定调整，找另一半难度就比较大。”

农村“光棍”是真问题

范本良发现，近年来一些条件优秀的女性，有房有钱，要求男方条件更高，至少两人差不多，“否则她觉得是吃亏的”。优秀女孩不愿意放低要求，人为给自己设置障碍，一些优秀女孩因此很难找到优秀男孩。“其实优秀不优秀是相对而已，找到真心爱你的人才最重要。”范本良认为。

在婚恋市场，女性还面临年龄偏见。范本良记得，大约2010年左右，有报道称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30岁，超过35岁女性生育能力明显下降。报道一出，她明显观察到一些男性不愿意找大龄姑娘了，30多岁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滑坡。

当时，1980年出生的女孩刚好30岁，范本良组织的一次交友会上，她先分开男女，再在场地中间放上一条线，让1980年之前出生和之后出生的女性分别站在线的两侧，“很多男的都跑到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孩这一块”。

这些年遇到离异男性，范本良有时优先推出大龄女性，“人家就明讲，范阿姨她年龄太大了。其实年龄段不绝对决定是否优生，你看林青霞46岁生儿子不是也很好。”

前不久，范本良碰到一个44岁的男士，税后年薪160万元。范本良给他介绍四名女士，年龄分别是39岁、37岁、两个31岁，这些女孩都愿意跟他交往，但男士最后选中一个31岁的女孩。

近年来，在婚恋市场上，城市里条件好的未婚男性，偏向找年轻女性，范本良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如果男女双方相差两三岁，她还撮合一下，大三岁以上就不再劝，除非两人格外有缘。这几年，范本良只遇到过一个特例，女大男6岁，两人在她的平台做志愿者，结婚后生子。

在杨华看来，城市“剩女”是假问题，农村“光棍”是真问题。城市“剩女”大部分不是找不到婚配对象，只是因主观原因在某个年龄阶段内没有结婚，或因教育、职业发展、新婚观念等推迟了婚姻。

在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杨华称，2000年以后，80后登上婚姻舞台，在高适婚性别比下，农村“光棍”数量显著增加。2010年之后，90后进入婚龄，“光棍”更多。“宏观上，中国将有3000万无法结婚的‘光棍’存在；微观上，偏远山区村落，适婚男子没有结婚现象突出，在云贵一些村寨，达到十之六七之多。”

杨华认为，这些反映中国社会婚姻的两个原则或前提。一是，本地婚偏好原则，使得本地婚竞争激励，婚姻成本或彩礼要高于外地婚；二是，男高女低或者男女同质原则，男方一般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低或者相同条件的女孩，女孩则要找比自己条件好或者相当条件的男孩。这使得城市年轻男子宁可找比自己家庭条件差但是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也不找大龄城市女性。与此同时，城市女孩更不会逆向流到农村。

“即便城市有‘剩女’，农村有‘光棍’，两者在婚姻上一般也不会有交集。”杨华说。

需要摆正的婚恋观

城市男孩在婚恋市场也有苦恼。有的姑娘，一来就问，房子有吗、收入多少、帅不帅、学历高不高？范本良直接讲，“你慢慢挑吧，她这个思路已经歪了。”

范本良为找对象的男女们总结出六字金言——心态、观念、品味。她说，这其实就是以前常提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她经常苦口婆心劝说，女性找对象不要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不要攀比、不要虚荣心太强，应该把人品作为首要考察，再考虑学历、收入等因素，最后是身高外貌，综合考虑一个人。如果顺序倒过来，位置搞错，多半不幸福。

范本良常常现身说法，给未婚男女讲起自己和儿媳的例子。她说，自己为1.6万人操心，没有操心儿子婚事。儿媳嫁进来，没有提无理要求，还和儿子一起买一室一厅的房子，后来她老伴单位又分了一套房，两套房置换成一个三居室。“为什么要没有条件时，提出要求堵自己的路，也堵对方的路，这是何苦？我告诉她们不要老是在房子上面‘卡’住。”

范本良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太听她的“忠告”，“恋爱观不摆正，‘黑马’在她眼前她都不要。”

以前男方女方有点小想法，范本良一般都能劝得住，

“但现在不同了，他们让你三分，但是不行动”。但她坚持，像念经一样，多给年轻人灌输正确的婚恋观。她说，当年轻人处在十字路口，左右摇摆或者偏离的时候，需要正确的舆论或者思想去拨正，“从我心里，我真的老着急”。

成功走进婚姻后，很多人的婚姻并不顺利，正如冯帅章所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离婚率上升。

很多人不知如何处理对婚姻的失望，这是曾从事婚姻家庭咨询热线的何宁（化名）的感触。2020年，何宁在广东一个城市妇联下属的热线做咨询工作。

何宁称，很多咨询集中在如何面对婚姻的失望、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抚养权归谁等。95%的咨询来自女性，多以抱怨为主，反思婚姻的很少，“起码咨询两次以上，才会反思双方的责任”。

何宁发现，“很多人对婚姻法感到陌生，她们会问什么财产、房子可以分，什么不可以分，还有人很惊讶地问，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

何宁认为，婚前辅导很重要，“起码婚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懂。”

当前婚俗改革，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不正之风，试点为期三年。目前，15地试点的侧重不同。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不断挖掘民间传统美德，大力倡导婚俗新风，健全婚姻登记管理；在重庆市大足区，提倡引导和鼓励村（居）委会依据村（居）规民约出台具体约束性措施，治理相互攀比、索要高额彩礼等；在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居）规民约对彩礼金额、婚宴桌数和使用烟酒等，作出限高约束。

移风易俗并非易事。冯帅章表示，婚俗改革的内容较多，在一些地方婚俗改革已取得成效，但还面临一些

问题。比如，高价彩礼背后原因复杂多样。“风俗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各地要综合、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另外，更大层面发挥社会舆论的倡导作用，挖掘和弘扬优秀的婚俗文化，让婚俗文化能够推陈出新，移风易俗。”

在冯帅章看来，长远目标还是要进一步建立男女平等，构建对女性友好、对婚姻和家庭友好的社会。针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出台综合措施，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真正帮助人们更容易进入婚姻和家庭，生儿育女，同时较好兼顾家庭和工作。”

【财新】冯帅章：大学生“最难就业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又是一年毕业时。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909万人，相对于去年所谓“最难就业季”同比增加35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对于毕业生们来说，最佳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学校和社会应该如何帮助毕业生适应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理性应对。

1. 不应夸大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1999年开启的大学扩招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扩招之后，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度上升，引起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大学扩招是否一定会导致出现就业问题？如果静态地看，供给增加当然会导致失业以及工资相对下降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动态地来看，则未必如此。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不断上升。甚至大学生供给增加后，其本身可以促进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一步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从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来看，现有研究并没有证据表明扩招带来了大学毕业生群体失业率增加或收入溢价降低的情况。

其实，总体而言，大学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在各方面都优于学历更低的人群。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更高，失业率更低，就业质量也更高。当然，大学生就业情况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各专业、各地区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刚刚毕业的一段时期，可能出现劳动力市场状态不稳定的情况，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搜寻匹配期，实属正常。大学毕业生相对于其他教育水平更低的群体，其进一步学习、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也更强。如果我们因为担心高校毕业生“过多”就少培养大学生，岂不是因噎废食？因此，虽然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优化专业设置，但实在没有必要过于夸大高校毕业生作为一个整体的就业难的问题。

2. 关注失业和就业质量，而不是就业率

就业首先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除了就业以外，还有两种劳动力市场状态——失业和不在劳动力市场。简单而言，失业就是目前没有工作，但是希望工作并在积极寻找；而不在劳动力市场是指没有工作，却不能工作或不想工作。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群体应该是那些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也就是希望就业但是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者。

然而，目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主要关注的指标是就业率。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就业率概念，不仅包含了常规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还包括了升学、出国、参军等选项。实际中，本科毕业后读研已经成为很多高校毕业生的主要选择。严格说来，毕业后继续深造并不属于就业，而是属于不在劳动力市场。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政府部门其实真正担心的是失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用更为科学的失业率指标呢？目前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并不打算毕业之后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群体是考研失利、准备认真复习准备来年的研究生考试者。对于这些群体，应该允许他们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当然,仅仅关注就业率或者失业率是远远不够的。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不充分就业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现实存在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有43%的大学毕业生在首份工作中存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就业质量则涵盖更为广泛的内容,涉及劳动报酬的高低、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的规范性、工作福利及社会保障、劳动者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职业发展空间及社会评价等方面。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一个总的情况是失业率较低但就业质量不高。因此,对于高校毕业生这个群体也是一样,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就业质量。

3.关注长期就业能力,而不是短期劳动力市场状态变动

高校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长期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表现。某种意义上说,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们需要经历一个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探索期”,有一个不断认识自己、寻找合适工作岗位的过程。研究表明,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变动非常频繁。在美国,18-24岁的年轻人在前六年的工作时间内,平均会有5.7个工作。随着年龄增长,趋于稳定。在25-34岁期间,平均有4.5个工作。而在35-44岁,平均有2.9个工作。在45-52岁期间,有1.9个工作。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明显高于年龄更大的人,这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样的。

关注毕业生的长期就业能力,需要用好他们职业生涯的“探索期”。进一步深造当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但即使是失业,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找到。如果为了就业而就业,匆匆忙忙进入一段完全不合适的雇佣关系,一方面可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会削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纠错的成本可能很大。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通过第三方机构调查监测 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2004年,教育部发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将毕业生就业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件的第六节提到实施“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明确表示“切实将高等学校布局、发展规划、学科专业结构、办学评估、经费投入等方面工作与毕业生就业状况紧密挂钩。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之下,各地方、各高校对于就业率的重视,自不待言。

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对于各高校努力提高培养水平、使得人才培养更加切合社会需求,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实践上,因为层层比拼,也有可能造成基层的压力,甚至出现造假的情况。从公开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高校、部分专业为追求就业率“好看”,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毕业生必须提供就业证明等表格材料,以完成就业率的统计。各种打擦边球甚至造假的方式也不鲜见。社会对于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高就业率也并不认可。

目前,教育部已经委托国家统计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核查。我认为,教育部门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于第三方提供信息的使用力度,降低高校自行上报就业率的工作要求。教育部门可以委托统计局或者其他知名的社会调查机构进行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全面追踪调查,而不仅仅是核查。除了解是否就业或失业的简单劳动力市场状态外,还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比如毕业生就业的行业、职业、工资,以及过去一年的工作变动情况。对于没有就业的毕业生,也可以收集他们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不能或不愿意就业的原因等。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根据考核的需要,采用更为真实可靠的失业率,或者“就业率”;也可以更进一步利用数据来分析专业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准。另一方面,可以破除作假的动机和手段,从而大大减低学校及学生的焦虑感和工作量,使得学校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真正帮助学生提高人力资本和长期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工作中去。

本文首发在财新网

【界面新闻】薛森等：疫情如何放大教育不平等？ 从非典看疫情与教育代际流动性关系



作者：薛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梁文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葛梦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全国各地开展线上教学,正在冲击高考的高三学生们也不例外。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在距离考试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能居家复习、上网课。除了学习场所的改变以外,新冠疫情还可能引起学生的恐慌、焦虑,使学生不能专心学习。由于不同学生的家庭条件、家长教导方式和能力存在差别,因此疫情可能会增强家庭环境差异对学生们高考表现的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高三备考考生小王的成绩一直稳居班里前十,但疫情的反反复复让他非常焦虑。家里网络不好,只能借用邻居的网络听网课,信号不好的时候还要忍受着春寒在阳台蹭网。爸妈在外上班,小王要花时间解决三餐,此外小王还经常睡过头,为此他非常懊恼。和小王一样守在屏幕前的是小李,但面临如何全身心投入复习的问题,小李显得很淡定。小

李除了跟着学校老师的复习节奏,另外还找了一个大学生家教教授备考技巧。小李的妈妈也专门在家陪考,为他安排了详细的日程表。小王和小李虽然是虚构的例子,但他们代表着千万考生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差异是无法靠学生个体努力能解决的结构性因素。疫情放大了这些因素,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在代际上延续,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注。

疫情会扩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吗?面对疫情下的备考,人们会不自觉地提起2003年的高考。中国上一次在疫情中组织高考是2003年的非典时期,那一年的高考形势也很特殊。虽然非典的传播性没有新冠这么强,但是相比新冠而言,非典致死率更高,对年轻人威胁更大。非典在其传播地区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如出现了抢购板蓝根和白醋的风潮,餐饮业和菜市场等公共场所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抑制非典的发展,多地也进行了停课政策,未停课的地区也相应地缩短了教学时间。和新冠一样,非典也无疑分散了普通学生的精力,弱化了学校公共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因而我们可以从“非典”对那年高考生影响的历史中,寻找疫情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答案。

我们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Pandem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03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Epidemic in China”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子女和父母的教育信息和中国卫生部报告的城市SARS病例数数据,给出了流行病降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直接证据。我们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检验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高考生和他们父母之间教育代际传递性和流动性的影响。

关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算，目前文献一般使用教育代际相关系数衡量父代与子代教育水平的相关性。父代与子代这一相关性越强，说明教育代际传递越强，则教育代际流动越弱，教育机会越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非典”疫情显著增加了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是否获得大学学历和他们父母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增强了教育代际传递，降低了代际流动性。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非典”对流动性的降低作用对于女生和大城市的学生来说更强，这可能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以及病毒更容易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传播，因而城市地区管控力度较大造成。

我们还发现4年制的大学本科教育受到非典的影响相对于3年制大专教育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后者需要家长付出的努力更少。与母亲的教育代际传递性相比，我们没有发现非典影响父亲教育代际传递性的证据。这可能是由于母亲通常在家庭照料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而这一角色在非典疫情流行期间尤为重要。

受数据所限，在讨论影响机制时，我们只是利用中国国家家庭调查(CFPS)和城市家庭调查(UHS)数据分别探讨了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教育方式。总体而言，CFPS显示，高教育的父母更加关心子女的学业，与子女的互动也更强。UHS则进一步显示，在非典期间，高教育的父母在非典严重地区会花费更多的钱在子女教育上，比如为孩子找家教。这些证据显示，当孩子的教育受到疫情影响时，高教育父母往往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习，以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效应。

疫情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对社会不平等和代际流动产生长期影响，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文中利用新冠疫情的数据做了粗略估计。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河南、广东和湖北三个省份，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分别会增加66%、69%和103%。为次，我们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来缓解疫情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冲击。

一方面，政府和学校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保障来自弱势家庭或地区的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意识到，在学校教育之外，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们面临着巨大的教育机会差异。这需要政府长期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教育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弥补弱势学生面临的其他教育机会的劣势，增加教育的代际流动。

本文首发在界面新闻

陈思宇：女性职场晋升为何这么难？



作者：陈思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在经济商业领域，管理决策中女性占比始终不高；在政界，女性领导人也是身影寥寥。今年3月刚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虽然在专业技术从业者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上，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但在经济参与领域，却面临不小挑战，我国董事会成员中女性的比例仅为11.4%，女性高管比例约占16.7%。

根据近日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为6847元，是男性平均薪酬的75.9%；而且薪资水平越高的岗位，男女薪酬差异越大。女性职业晋升为何这么难？有人认为这是男性和女性的性格和偏好差异决定的；也有人认为男女性格和偏好差异其实也是后天的社会文化和规范所塑造的，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

关于女性职场晋升这个问题，许多学科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同视角的答案。下面，我们梳理了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最近信息和研究成果。这些结果反映出了女性在职场、家庭、生育中的种种矛盾和纠结，更为我们如何解决女性职场晋升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1. 职场高层“倩影难觅”

迈入2021，“基金”热度达到高峰。在这个比拼智力、意志力乃至体力的行业里，虽然女性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不逊于男性同行，甚至在某些细分行业还因为女性的特质而更胜一筹。然而，据Wind统计，管理着这“钱袋子”的基金经理仅四分之一是女性。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商业、技术、科研等领域的高层仍难觅女性踪影。据彭博2013年统计，在标普500上市企业中女性CFOs仅占10.8%，女性CEOs约为4%。在中国，2020年涉足政坛的女性比例约为15.4%，企业高管比例是20.1%，相对2010年的15%和20%几乎是止步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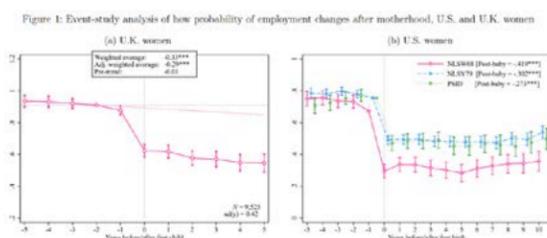
尽管男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显著减少，但“职场中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例如“同工不同酬”和“晋升壁垒高筑”问题。究竟是“女性能力有限”还是“职场存在性别歧视”，这引发了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考与争论。

2. 职场晋升的“拦路虎”

随着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已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今“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因此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更多的潜在原因。

首先，许多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趋向于风险规避，这可能是他们在像基金行业这样的高风险职场获取高收入的“绊脚石”。大量的实验室或者经验证据表明，女性在进行高收益相关的决策时候表现更保守(Barber and Odean, 2001)，更愿意规避竞争(Niederle and Vesterlund, 2007)，高压下更有可能表现不如预期(Cai et al., 2019)。高收益高风险，因此在追求高收益的职场，女性规避风险和竞争的属性难免会成为她们求职/晋升的“绊脚石”。

其次，生育和照顾新生儿带来的职业“中断”，使得女性比同龄男性看上工作去经验更少、并错失晋升机会 (Bertrand, Goldlin, and Katz, 2010)。下面来自 Kuziemko 等学者研究论文的图便展示了生育对年轻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他们发现“生育”显著降低了英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其中面板 (a) 显示，英国年轻女性在生育前两年的就业率为 91%，与同龄男性相近；但在“生产当年”她们的就业率减少了近 30%；重要的是，生育后五年内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并未恢复到期初水平。面板 (b) 关于美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在生育后大幅下降且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数据来源: Kuziemko, Pan, Shen and Washington (NBER working paper, 2018)

那么，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事业的决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相关领域的学者 Bertrand (2013) 首先提出并验证了“主动选择”假说，部分女性更看重家庭，因此她们自主放弃了职业的晋升以换取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不过，后来 Bertrand, Kamenica 和 Pan (2015) 利用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和美国普查数据又验证了“被动选择”假说。他们发现当女性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 50% 的时候（妻子比丈夫赚得多），离婚率呈现一个急剧的上升；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女性会减少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并承担更多家务来提高婚姻率、降低离婚率。因此，“性别刻板印象 (Gender identity)” 是影响女性的职业晋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社会资本偏见 (Social Capital Bias)

其实，在许多高尖行业，从业者大多是被高度筛选过的，男性和女性在人力资本、抗压能力、风险偏好和家庭偏好上并无明显差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观察到男性晋升的概率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Fang 和 Huang 2017 年在国际顶级金融期刊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发表的论文则从社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解释，他们以华尔街分析师作为研究对象。只有非常具备有竞争力的女性才能从事此行业，因此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心理素质方面她们都能与男性分析师匹敌。然而，他们发现男女性分析师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差距为 2-3 倍：面对相同的社会资源，男性更可能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用于提高股票预测的准确性，获得更高的主观评价（能力认可）从而得到晋升。

尽管 Fang 和 Huang 并未揭露社会关系通过什么渠道对男女分析师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即便拥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对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上的影响是不同的。男性更容易获得积极的肯定，而女性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到达相同的效果。

4. “职场平等”任重道远

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如果以目前的速度进行性别平等的斗争，全球要达到性别平等还需 135.6 年。而在经济参与领域，预计还需要 267.6 年才能彻底消除性别差距。就中国来看，尽管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专业技术从业者两项指标上，性别平等指数排名世界第一，但进入立法、高管等岗位的女性仅占 16.8%，全球排名位居 132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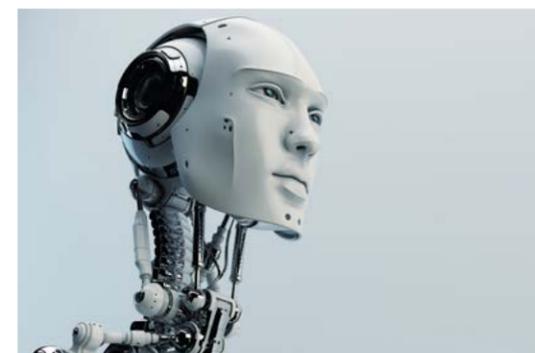
性别平等不止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吸引和释放更多女性劳动力参与经济生产活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

一方面，社会应帮助女性获得更多人力资本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进而帮助她们胜任市场职位需求；另一方面，应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多元化招聘机制（例如：灵活就业时间）以及打造包容性的职场文化（例如：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职业能力形成客观认知与评价）；最后家庭成员应当充分尊重女性在生育以及职业上的选择权利，鼓励她们实现多元人生价值。

本文首发在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好文回顾

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市场：当我们讨论人工智时，究竟指的是什么？



作者：张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开始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应用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

当很多专家学者开始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时，作为读者往往对什么是人工智能有自己的主观理解，在关注人工智能对经济的一系列相关影响结果前，可能所有人需要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大家通常提到的“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

人工智能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教科书中，对于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 有一个广泛的定义。人工智能主要指特定系统具有感知预期或未预期的新条件，并决定在所感知条件下，决定采取行动并据此规划行动的能力。目前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机器学习、语言处理、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虚拟现实等。

例如，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是现代智能技术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即从观测数据（样本）中寻找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对未来数据或无法观测的数据进行预测。语言处理与人机交互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手机中运用的语音助手系统，计算机视觉的主要应用例子为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与人工智能相关且容易混淆概念通常有两个：自动化 (Automation) 与机器人 (Robot)。自动化 (Automation) 通常指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由人类参与开发的机器、工具、设备、装置等独立地操作、行动或者自我调节。当前，自动化技术最典型的应用就是人们常说的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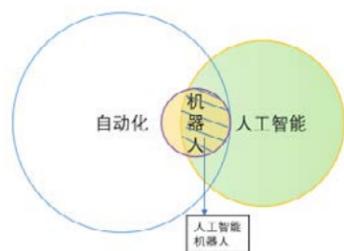
机器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操纵器，也称为机械手。例如，在工厂的装配线上工作的机械手臂。第二类是移动机器人，通常利用轮子等机械装置在环境中来回移动，如餐厅的机器人递送服务，码头搬运集装箱等任务。第三类是前两者的结合，通常被称为移动操纵器，这一类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人形机器人。此外，机器人还应用于修复装置（如假肢），智能环境（如装有传感器与监控的病房）等方面。

从左至右依次为：机械手、移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

鉴于三个概念互相之间容易混淆，我们有必要清楚厘清人工智能、自动化与机器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首先，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主要区别在于自动化可能基于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基于非人工智能系统。自动化执行的是重复性的任务，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人工智能则不仅仅寻求重复性模式，还能不断的从经验中学习，根据情况自我选择最佳策略。其

次，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关系是，仅有一小部分机器人是具有人工智能系统的，大部分的工业机器人通过一套编程系统来重复动作，重复动作并不需要学习新的数据、知识以及场景，因此不需要人工智能。最后，机器人是自动化的重要子集，机器人是关于运作以及移动的自动化。但是除机器人之外，自动化还包括基于软件、规划、协作、办公自动化等其他相关领域。

下图直观解释了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部分基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人属于交集部分，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通常来说，机器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从概念上来说有着明显区别。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及机器人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在讨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经济学家如何测度“人工智能”？

在厘清上述三者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国内外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讨论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现有工作导致失业增加？人工智能是否会加剧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理论研究中通常将人工智能视为是一种技术进步 (technical change)，会提高生产要素生产率 (例如，Acemoglu, 2002a; Autor & Salomons, 2017)。此类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建立理论模型解释了技术进步如何造成了技能有偏 (skill biased)，即技术进步对高技术劳动力是有益的 (例如工资增加、岗位增多) 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是伤害的 (例如工资减少，岗位减少导致失业)。实证研究中通常很难直接度量人工智能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聚焦于工业用机器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例如，Acemoglu & Restrepo, 2020; Acemoglu & Restrepo, 2018)。研究发现，机器人可以替代完成以前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产生强烈的替代效应 (displacement

effect)，减少就业与人工劳动份额 (employment and labor share)。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会创造出新的岗位与工作任务，产生部分恢复效应 (reinstatement effect)。此外，有研究发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会拉大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原因是技术进步会替代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 (Acemoglu, 2002b; Tyers & Zhou, 2017)。上述结论是技术进步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会代替更多低技能劳动力。

有中国学者利用主要 TMT (科技、媒体和电信公司) 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营收和员工数据来估算行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技术采用率，并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者的可替代作用 (Zhou et al, 2020)。研究发现女性、年长者、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低收入劳动者的工作更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

从简要的文献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人工智能很难被准确的度量。在理论上人工智能被视作是技术进步，实证研究中由于无法测度人工智能，退而求其次研究自动化 (工业机器人)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前文已经详细论述，工业机器人与教科书以及工程学中定义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和传统劳动力的相对使用成本和收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较低，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推广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老龄化进程加快造成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不但有岗位替代效应，也具有非常显著的岗位创造效应。随着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创造出的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工作或新职业。

就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人工智能的科学测度依然缺乏统一标准，相关的统计数据十分缺乏，目前还难以清晰地判断人工智能对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造成何种影响。未来应当考虑结合机器学习的特点以及部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 (算法) 行业的特征来进行微观层面的数据收集，让研究者更清晰地定义人工智能的范畴，可以更好地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刘珂：平台“二选一”，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作者：刘珂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最突出的商业变革之一。放眼全球，从亚马逊、谷歌到脸书，许多跻身世界前列的巨头企业都具有平台属性。虽然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通过促成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来创造价值。《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0 年)》显示，2019 年我国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实现业务收入 3193 亿元，同比增长 24.9%。

然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反垄断监管提出了挑战。4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通过“二选一”以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等行为处以 182.28 亿元天价罚款，创下中国反垄断执法最大罚单。实际上，平台“二选一”近年来屡见不鲜。例如，在 2010 年的“3Q 大战”中腾讯宣布在装有 360 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又比如，在餐饮外卖行业，美团和饿了么要求商户不得通过自己的员工或者第三方来配送外卖。

有人认为，平台“二选一”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和竞争手段，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二选一”行为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平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关于平台“二选一”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学术界也提供了不同视角的答案。

本文梳理了相关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制定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平台经济

为了深入研究平台“二选一”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平台的经营模式。平台也被称为双边市场，主要作为中介对买方和卖方进行匹配，例如社交媒体网站、搜索引擎、电商平台、打车软件等。平台的潜在使用者往往关心在平台上有多少交易对手可以与之匹配。例如，平台的买方数量越多，则平台对卖方的吸引力越大。因此，平台经营模式的核心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网络效应。

平台需要决定对于使用平台的买卖双方分别收取怎样的价格，而这取决于不同群体产生的网络效应的价值。例如，读者和广告商分别是报纸出版商这一平台的买方和卖方，读者数量对于广告商极为重要，但报纸的广告数量对于读者购买报纸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报纸出版商往往对读者收取较低的价格而对广告商收取较高的价格。

买卖双方对于平台的选择也不完全取决于平台收取的价格。例如，作为买方使用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可以与之匹配的卖方数量，只有当预期足够多的卖方会加入平台时买方才会选择也加入平台。因此，和传统企业不同，平台需要协调买卖双方的预期。买卖双方预期的不确定性也提高了平台行业的准入门槛。

平台“二选一”，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买方往往对于特定的平台有所偏好。例如，报纸出版商作为平台对读者和广告商进行匹配，而读者往往只会购买风格和内容符合自己兴趣的报纸。又比如，购物广场作为平台对消费者和商户进行匹配，而消费

者由于交通成本往往只会去家附近的购物广场。相比之下，在给定价格和买方数量的情况下，不同平台对于卖方而言几乎是同质的。因此，每一个买方往往只会加入某一个平台，而每一个卖方为了能匹配到更多的买方往往会加入多个平台（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由于每一个卖方会加入多个平台，平台在吸引卖方的使用者方面往往不存在直接竞争，这使得卖方相对于平台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相比之下，由于每一个买方只会加入某一个平台，买方成为了各个平台争相抢夺的稀缺“资源”。如果卖方想要和某一个买方匹配，它不得不加入这个买方所在的平台。因此，平台一般会对买方收取更低的价格（或者免费），对卖方收取更高的价格，而平台从卖方获取的高额利润很大程度上以低价格的形式传给了买方。这种现象被称为“竞争瓶颈”（Armstrong, 2006）。

当卖方都只加入某一个平台时，买方也会集中于这个平台，因此平台有激励通过“二选一”限制该平台的卖方使用者加入别的平台，从而提高该平台从买方获取的利润。当所有平台都在实施“二选一”时，市场中的每一个卖方都只能被迫加入某一个平台（而不是多个平台）。一方面，“二选一”提高了卖方对于平台的价值和议价能力，因为每吸引一个卖方加入平台就意味着其他平台少了一个卖方加入，从而也降低了其他平台的网络效应和对买方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二选一”降低了买方对于平台的价值和议价能力，因为每个卖方只能加入某一个平台意味着每个平台的卖方数量减少，从而降低了每一个买方产生的网络效应（买方只能对同一平台的卖方产生网络效应）。因此，当所有平台都在实施“二选一”时，平台有可能降低对卖方收取的价格并提高对买方收取的价格。换言之，受到“二选一”限制的商户反而可能因此受益，而表面上和“二选一”没有直接联系的消费者则可能因此受损（Belleflamme and Peitz, 2019）。

平台“二选一”是否禁止不应一概而论

上文的结论表明，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反垄断当局应该禁止平台“二选一”。然而，平台“二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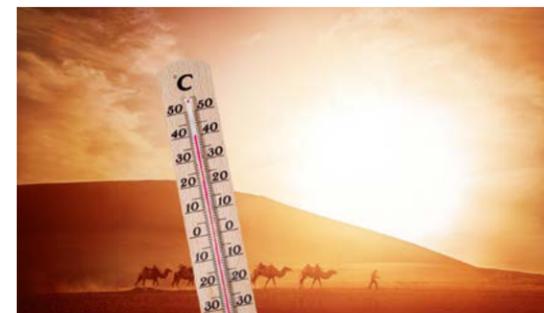
一”是否降低社会福利不应一概而论。例如，Carroni et al. (2019) 的研究表明，平台对于卖方某些具有巨大网络效应的“超级明星”商户实施“二选一”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其他平台的买方由于“超级明星”商户的存在而转投该平台，使得其他平台对于卖方的吸引力降低。因此，卖方的其他商户为了节约费用自愿接受“二选一”，即只加入该“超级明星”商户所在的平台，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这又会吸引更多的买方加入该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买方和卖方加入该平台，网络效应可以发挥到极致，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主张禁止平台“二选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平台可以通过“二选一”来妨碍其他平台进入市场，从而限制市场竞争。然而，反过来想，当效率更高的新平台想要进入市场时，可以通过适度的“二选一”来协调买卖双方的预期，从而成功进入市场并加剧平台竞争。例如，Lee (2013) 在国际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的论文研究了“二选一”对 2000-2005 年美国电子游戏行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美国大部分的电子游戏都只能和某个特定的硬件平台兼容，而后者作为平台将电子游戏的软件开发者和终端消费者进行匹配。该研究结果表明，禁止“二选一”将使得新进入市场的平台受损，而使得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平台获益。基于反垄断政策的视角，这意味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平台在是否可以实施“二选一”方面可能需要区别对待。

总而言之，平台经济的特殊性主要来自于买卖双方之间的网络效应。因此，关于市场的定义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衡量在平台经济的框架下需要不同于传统市场的解释。同时，由于平台对买卖双方的特殊定价策略，反垄断当局或许可以更偏向于非价格证据以评估平台的市场势力。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都是高温天气的“锅”——从健康威胁和情绪波动看全球变暖的社会经济影响



作者：范敏宜（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生）
陈思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南方的夏日悄然而至，今年3月以来广东省多地气温飙升，全省3月平均气温为20.5°C，较常年同期（17.6°C）偏高2.9°C，为历史同期最高。珠海市更是热到打破记录，早在3月12日正式入夏，比史上最早的入夏时间1998年3月27日足足往前刷新了15天。[1]

这只是全球变暖在中国的一个缩影。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16-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比1850-1900年（工业化前时代以来温度变化的基准期）高出约1.1°C，比2011-2015年的全球平均气温高出0.24°C。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将上升大约1.4-5.8°C，全球气候将出现过去10,000年中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



来源：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最为密切相关的表现为洪水、干旱、气旋和高温热浪（Heat Wave）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增加。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端气候事件、气候问题应对失败及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被认为是发生可能性最高和产生影响最为广泛的高危风险。

为积极应对气候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帮助公众充分认识未来气温上升带来社会经济影响，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理论与经验证据对实施适应性战略和分配公共卫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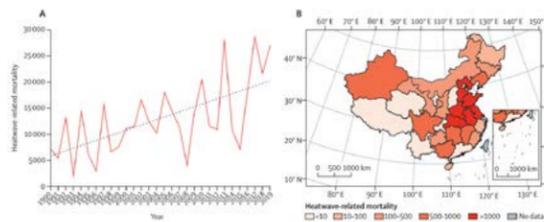
高温天气与健康负担

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需要体温恒定在36~37°C之间（腋窝）。当人体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时，人体代谢机能下降：中枢神经血液供应量随着皮肤血管的扩张而减少，血管中液体有效循环体积随着水分丢失而减少，人体核心体温会进一步升高。当人体温度超过39°C时可导致热相关疾病的发生，如热衰竭、热痉挛和热中暑等。随着机体水分流失，人体水电解质可能会紊乱，血液粘稠度和胆固醇水平增高，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心肺系统负加重，进而诱发心血管疾病事件（如心肌梗塞与脑卒中等），增加急性死亡率。

《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2020中国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与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翻了四倍。如下图面板A所示，在2019年，与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2.68万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36亿美元，相当于140万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

此外，高温的健康风险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如下图面板B所示，2019年山东省与热浪相关的死亡

人数最多，其次是河南省和安徽省，均位于我国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地区。



(A) 1990-2019年间，中国热相关死亡例数呈波动上升的趋势；(B) 2019年中国各省份热相关死亡统计情况，颜色越深代表该省份热相关死亡例数越多。

Source: Cai W, Zhang C, Suen H P, et al. (2021). The 2020 China report of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J].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6(1): e64-e81.

Yang 等 (2021) 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文章则聚焦未来气温升高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他们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从致灾因子、暴露程度和脆弱性等三个方面系统评估了未来高温天气对我国 161 个区县的人群造成的死亡风险。作者预估，到 21 世纪 90 年代 (2090-2099 年)，在 RCP4.5 与 RCP8.5 情景下由于高温天气额外增加的死亡人数将分别达到 128,346 和 228,728 人。[2] 此外，未来高温的健康风险也将呈现地区差异，其中我国南方、东部与中部为高风险地区，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升温幅度、年龄结构、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经济状况、空调使用情况等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天气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冲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老年人、儿童及户外工作者等罹患相关疾病和受到意外伤害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属脆弱人口。[3]

与 2000 年初相比，中国每个老年人在 2019 年平均要多忍受 13 天的高温热浪天气，而在高温天中，身体机能下降、健康状况不佳或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中风、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热相关疾病的影响，死亡风险要比非高温天高 10.4% (《柳叶刀人群健康与

气候变化倒计时 2020 中国报告》)。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可能会更为严重。

气候变化造成的高温天气暴露增加还会损害婴儿健康。一方面，高温天气可直接导致分娩加快、妊娠缩短和婴儿出生体重减轻。Barreca 和 Schaller (2020) 发表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 的文章考察了 1969-1988 年间美国各县超过 5600 万例分娩。其研究表明，在最高温度超过 90°F (32.2°C) 的日子里，出生率会增加 5%，妊娠天数平均减少 6.1 天，有些分娩甚至会提早两周发生。Deschênes 等 (2009) 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文章发现怀孕期间所经历的高温天气 (尤其是妊娠中期和妊娠晚期) 将对婴儿出生体重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作者预测到本世纪末，白人婴儿的平均出生体重将下降 0.22% (7.5 克)，黑人婴儿的平均出生将下降 0.36% (11.5 克)。另一方面，高温天气会影响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潜力，威胁粮食安全，推动食品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影响婴儿和低龄儿童的营养、免疫和生长等健康问题。[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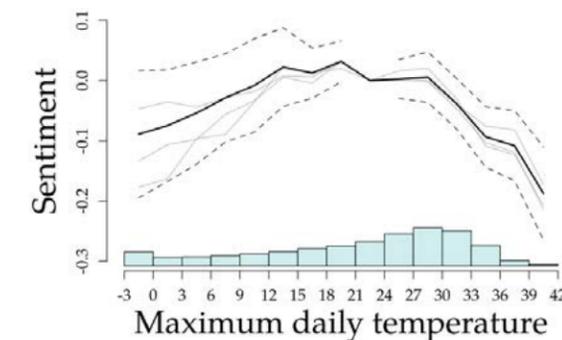
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之一。不少研究结果证实胎儿期的高温暴露对个体的认知能力及长期人力资本积累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Fishman 等 (2019) 发表在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上的文章以一组出生于 1950-1980 年间 (年龄在 30 岁到 60 岁) 的厄瓜多尔正式部门雇员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在孕期所经历的气温对其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有显著负面影响：孕期的月平均气温每升高 1°C，个体接受中学教育的可能性将降低 0.2%，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将降低 0.7%，其中女性所受影响更大 (0.59% VS 0.86%)。在国内，Hu 和 Li (2019) 则使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用模型考察了胎儿期的高温天气经历对 1950-1994 年间出生于中国农村的个体的认知水平和身高的影响。他们发现，孕期所经历的高温天气 (日最高气温超过 85°F，即 29.4°C) 每多增加一天，人们平均受教育年限缩短 0.02 年，成为文盲的概率增加 0.18%，标准化学词测试得分降低 0.48 分，成年身高减少 0.02 厘米。

最后，高温对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当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时，人体核心温度的提升会刺激神经中枢，导致自我保护性疲劳，肌力和肌耐力下降，从而降低生产效率。Zhang 等 (2018) 发表在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上的文章使用 1998-2007 年国内 50 万家制造厂商详尽的生产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层面研究了气温对全要素生产率 (TFP)、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都表现出对高温天气的敏感性：相对于 50-60°F (10-15.6°C)，当日最高气温超过 90°F (32.2°C) 时，TFP 将降低 0.56%。Cai 等 (2018) 则使用福建省一家纸杯制造企业的工人日产出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非参数估计方法，从个体层面研究了气温对室内工作者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气温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 U 型，过低或过高的环境温度都将对生产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造成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相比之下，户外工作者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受到高温热浪的健康威胁更为严重。Yin 等 (2017) 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高温天气 (33°C) 持续 10 天后，户外工作者组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将提高 149%。作为劳动力大国，中国户外工作者在 2019 年因高温损失了约 0.5% 的潜在工作时间，造成全国 1% 的 GDP 损失 (1260 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每年投入到科技领域的财政总预算 (《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 2020 中国报告》)。

高温天气对情绪的影响

高温天气不仅会影响人体生理健康还会对情绪等心理健康产生影响。Baylis (2020) 发表在经济学顶刊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的文章首次识别人们对气温的潜在偏好。他以公众在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的情绪表达作为信息源，构建核心统计区 (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 CBSA) 的日面板数据，在控制 CBSA 固定效应和一系列时间固定效应，包括月份、年份、工作日、假期及州特定时间趋势 (state-specific time trends)，他发现人们对环境气温的情绪响应呈倒 U 形，如下图所示：低温和高温下人们的情绪普遍较为消极，相比起在舒适温度 (日最高

气温为 20-25°C) 下，人们在高温天 (日最高气温为 35-40°C) 的情绪指数将下降 0.1 到 0.2 个以上标准差 (相当于周日与周一之间的平均情绪差异)。



气温对情绪指数的影响: 实线表示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的回归系数 (以标准差度量)，显示了相较于日最高气温在 21-24°C 区间的情绪差异；虚线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误差项按 CBSA 和日期聚类。Source: Baylis P. (2020).

Temperature and temperament: Evidence from Twitter[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84: 104161.

此外，Baylis 利用收入的外生冲击 (季度薪资变动或违规停车 / 超速罚单) 对此种情绪响应进行了经济度量 (valuing)。他发现人们情绪指数波动 1 个标准差的经济价值为 196.77 美元或 78.60 美元；将日最高气温从 30-35°C 替换为 20-25°C 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11.94 或 4.77 美元 (取决于是对薪资还是交通罚单数额作回归)。

在国内，Wang, Obradovich 和 Zheng (2020) 发表在 One Earth 上的文章则从 4300 万条微博数据中发掘天气是如何影响人们心情。结果同样表明，相较于舒适温度 (20-25°C)，当日平均气温超过 35°C 时，人们的情绪落差相当于周日与周一之间情绪差异的 85% 以上，与 Baylis 的估计结果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的累积会引发更多社会性问题，比如抑郁、自杀、诱发犯罪活动、加剧人类冲突等。Burke 等 (2018) 发表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的文章分析了自杀率与高温天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月平均气温每升高 1°C，美国各县和墨西哥各市的自杀率将分别上升 0.7% 和 2.1%。

Hsiang 等 (2013) 发表在 Science 的文章在梳理了相关文献后发现, 极端天气易引发个人、团体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以及穷国的政局动荡, 个人的攻击暴力行为在高温天气下会增多, 而极端降水则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拉大收入差距。作者就其相关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讨论, 包括 (1) 气候变化会改变资源供给情况, 加剧社会不平等而引发人类冲突; (2) 气候变化会降低社会经济产能, 进而减弱政府机构监控和打击犯罪的力度; (3) 气候变化引致的人口迁移和快速城市化会造成对当地有限资源的争夺; (4) 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人的生理机制, 降低人的理性判断能力及变得更具攻击性, 进而引发更多的冲突。Ranson (2014) 发表在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的研究同样表明, 高温天气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活动, 并预估在 2010 至 2099 年间, 美国由于气候变化催生的犯罪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将达到 290 亿 (折现率为 6%) 至 780 亿美元 (折现率为 3%)。

综上所述,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容小觑。然而, 气候变化是一项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 迫切需要各国密切协作。2015 年 12 月 12 日, 《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 呼吁就气候变化采取全球行动, 成为继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京都议定书》之后, 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 为全球气候工作规划新道路。其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 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 1.5°C 以内。

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 也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2016 年 9 月 3 日, 中国正式加入《巴黎协定》, 成为第 23 个完成批准协定的缔约方; 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表示,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并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写进“十四五”规划。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2019 年度报告》, 2018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4.0%, 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45.8%, 相当于减排 52.6 亿吨二氧化碳,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4.3%, 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为确保实现“2060 碳中和”承诺,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给我国人口带来的健康负担, 仍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王武毅：如何管好你的闲钱

作者：王武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所探讨的闲钱指的是短期内不需要用到的自有资金。我将探讨的就是如何将闲钱投入到适合自己的资产上。首先,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做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率一般高于经济增长率。通常, 工资收入是与经济增长率挂钩的。这就意味着, 排除战争和动乱等极端因素, 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的人与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投资回报的人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如果手头有些闲钱, 我们有必要了解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购买力。我们先看一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各类资产的回报率。

各类资产的回报率

我们需要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来看各类资产的回报率, 这样可以过滤掉短期市场波动所产生的噪音。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最近 40 年来慢慢发展起来的, 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悠久, 所以我们选择美国市场的数据来展示各类资产的回报率。这里引用李录院士书中的一张图。图 1 显示的是美元、黄金、短期债券、长期债券、和股票的回报数据。时间从 1801 年开始, 图中的各类资产的初始值都是 1 美元, 经过 210 年时间, 最右边显示的是 2011 年不同类别资产扣除通胀的实际回报倍数。作为对照, 图中还显示了这一期间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增长倍数。其中回报最糟糕的是现金, 1 美元经过 210 年只剩下 5.1 美分的购买力。黄金比现金好不少, 起码做到了保值, 但是年化实际回报只有区区 0.5%。债券的回报处在中间的位置, 长期债券的回报跟实际 GDP 的增长相关性较强。回报最高的资产是股票, 扣除通胀因素后, 这 210 年的回报仍然

超过 100 万倍。事实上, 股票的年化回报只有并不起眼的 6.7%, 但是经过长期的复利增长, 结果是惊人的。



图1：1801-2011年美国各类资产的回报

注意：纵轴是等比变化的

来源：李录，2020，《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出版集团；Jeremy Siegel, 2005, Future for Investor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Measuring Worth.

图二中展示的是 1920 年至 2021 年最近这 100 年美国房产 (Case-Shiller U.S. National Home Price Index) 与股票 (S&P 500) 的回报。这一期间, 房产的回报大约是 43 倍, 股票的回报有 450 倍, 是房产回报的 10 倍。



图2：1920-2021年股票与房产的回报

来源：Longtermtrends.ne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从资产回报率来看，股票是最高的。要取得超过经济增长率的收益，就要直接地买股票或间接地通过基金买股票。

买股票是在买什么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就是在买公司在生命周期内的现金流的折现。这一说法简单而深刻。一个永远没有正向现金流的公司它的股票价值为0。股票投资中需要做的大部分工作都应该是围绕着定义中所指的“生命周期内的现金流的折现”这个思路来展开的。对于所有的投资者，这都需要持续的学习积累。巴菲特说投资只需要学好两门课程，其中一门就是如何对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这指的就是如何评估企业“生命周期内的现金流的折现”。

股票投资的波动“风险”

前面提到的两门课程中的另外一门课程就是如何看待股票市场。尽管从长期来看，股票的回报率是最高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从股票投资中赚钱的。事实上，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大体上可能是人们常说的“七亏二平一赚”。也就是说，股市中绝大部分人都不能获取比银行存款更高的收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图2中的红色曲线提供了线索。这并不是一条单调向上的曲线。看最近20年的情况，在2000年和2008年分别有1次大幅的下调。至于小的下调更是不计其数。很多投资者可能在那些时候因为恐惧或者贪婪从而退出这条总体向上的曲线了。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市场呢？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的比喻可能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市场先生”是一个间歇性的狂躁-抑郁症患者，但是大部分时候，他是正常的。“市场先生”在狂躁症发作的时候，会抬高股票的报价，在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则会压低股票的报价。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指出应该利用“市场先生”的这一特征，而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

对于一个不熟悉任何上市公司的人，低管理费用的指数基金可能是最好的投资渠道了。纳入指数基金的公司通常是一个国家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投资在这样的指数基金上就相当于把钱让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商业机构来进行管理，因此能够得到的预期回报长期来讲大概率会比GDP的增速要高。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能够长期维持较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讲，投资在指数基金上通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投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一方面费用较高影响收益率。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深入的了解和很强的信任。通常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在股市下行的时候。

如果想进行个股的投资，则需要建立起来自己的能力圈。每个人的能力圈都不同，但是关键在于边界。对于一家公司，如果有很大的把握正确地评估出来它的内在价值，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为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这家公司在自己能力圈内，否则在能力圈之外。对于公司价值的估计，只能是一个大概，误差是难免的。所以只有当股票的价格显著低于你所评估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的时候，买入才能够降低风险、扩大收益。这就是安全边际。

不能做什么

段永平曾经请教过巴菲特在投资中有什么事情不能做，他的回答是：“不做空，不借钱，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不懂的东西。”

不做空。在成熟的市场中，一般是存在做空的。这种机制的好处是能够在一些时候帮助公司的股票价格回归价值。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做空的风险是巨大的。就在今年，GameStop的股票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翻了20倍，导致多家做空机构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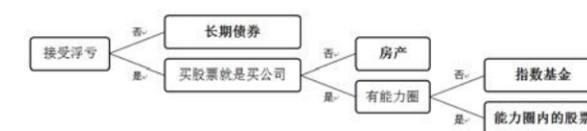
不借钱。也就是不用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成立于1994年，主要成员都是金融界的资深

人士，其中有两个是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TCM管理的钱中有一部分就是自有的资金，相当一部分主管把自己的整个身家都投进去了，所以至少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在认真稳妥地管理资金。但是，在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中，高杠杆策略导致LTCM巨额亏损而破产。后来，主创团队重新创业，使用比之前低一些的杠杆，在经历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于2009年再次破产。最近的例子是Bill Hwang，杠杆使得他2天损失200亿美元，从大富翁变大富翁。

不懂不做。这是在强调投资者应该坚守在自己的能力圈边界内，而不应该违反这个原则。有句话讲，你不能（长期地）赚到你认知能力以外的钱，就是不懂不做

的一个注脚。不懂要做很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凭运气赚的钱，靠实力亏了回去”。如果运气不好，就只能“鳄鱼进去，壁虎出来”。

最后，以一张图作为总结。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本文首发在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

王曦：什么影响管理者任期长短？



作者：王曦（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任何一个机构领导人的变动都对该机构短期乃至长期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频繁的人事变动会导致机构的考核方式不稳定，下属的工作目标不清晰等问题；而超长期的任职也会滋生“一言堂”的现象，不利于一

家企业或者机构的创新。因而，领导者的任期长短对整个公司或机构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Cohen (1986) 认为由于需要大量时间用于了解工作内容和熟悉环境，较短任期的管理者很可能工作缺乏效率，对整个机构的贡献较小。但相反地，Miller (1991) 认为随着管理者在同一岗位任职时间越长，他的管理方式越容易固化，领导技能也就越容易乏善可陈。Klein 和 Sakurai (2015)，Uppal 和 Glazer (2015)，Persson 和 Zhuravskaya, (2016) 研究表明管理者行为和管理技巧由于任职时间长短不同，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研究管理者任职时间长短及其影响因素对评估及提升管理效率意义重大。

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管理者

至今为止，对管理者任期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都比较缺乏。在自下而上选举机制下，Adam 和 Kenny (1986) 建立一个最大化投票人生命周期效用水平的模型。投票人在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哪位管理者的投票决定，从而确定了管理者的最优任期时间。他们对美国的一些市长和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充分考虑一系列个人特质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他们发现选举的机制、管理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都对任职时间长短有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Ferris 和 Voia (2009)；Horinchi 等，(2013) 也对影响管理者任期长短的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

LOGIT ESTIMATES OF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TENURE OF GOVERNORS: 1950, 1960, AND 1978

VARIABLE	LOGIT EQUATION			
	(1)	(2)	(3)	(4)
Intercept	-2.694 (.58)	1.997 (.52)	12.323 (1.90)	12.811 (2.45)
Mean education	-.510 (-2.25)	-.562 (-3.02)	-2.919 (-4.19)	-2.574 (-4.69)
Fraction urban	-5.239 (-2.24)	-4.435 (-2.72)	-.527 (-.21)	-3.440 (-1.90)
Term length	1.905 (5.48)	1.868 (5.65)	2.111 (4.85)	2.014 (4.82)
Governor's age	.064 (.80)	-.002 (-.03)	.152 (1.67)	.115 (1.40)
Population share	144.500 (2.86)	...	29.364 (.53)	...
Population share squared	-2163.076 (-2.90)	...	-944.777 (-1.22)	...
1960 dummy	1.605 (2.03)	1.610 (2.20)
1978 dummy	6.758 (3.82)	6.305 (4.20)
Number of states:				
Total*	146	146	146	146
Misclassified	32	40	23	29
χ^2	46.23	29.82	68.63	53.05

(节选自Adam和Kenny,1986)

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管理者

对于选举产生的管理者，效用最大化模型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但是现实中，很多中层管理者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任命。通过对1989-2012年英国中央政府执行机构负责人实证分析，Petrovsky 等人 (2017) 发现管理者个人能力，以及执政党变换也会对任期长短有明显影响。同时，他们也发现不同的任期结束方式，如晋升、退休、跳槽等，会导致不同长短的任期，也导致以上因素影响大小不同。

Table 4: Competing risks analysis of agency chief executive length of tenu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1) Central govt	(2) Public non-central govt	(3) Private sector	(4) Korea
<i>Hypothesis 1: performance</i>				
High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all agencies (dummy)	0.41** (-2.25)	0.79 (-0.11)	1.48 (1.11)	2.45*** (3.07)
Low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all agencies (dummy)	1.21 (0.55)	0.84 (-0.19)	1.20 (0.44)	2.66*** (3.15)
<i>Hypothesis 2: political change</i>				
Change in party control last year (dummy)	1.49 (0.81)	0.00*** (-45.63)	0.79 (-0.38)	0.32* (-1.80)
Change in party control this year (dummy)	0.77 (0.62)	0.67 (0.28)	2.15** (1.99)	0.44 (1.52)
Change in overseeing minister last year (dummy)	1.04 (0.16)	0.68 (-0.60)	1.04 (0.12)	1.12 (0.45)
Change in overseeing minister this year (dummy)	1.36 (1.04)	0.54 (-0.93)	0.93 (-0.19)	1.22 (0.77)
<i>Hypothesis 3: insider status</i>				
CEO came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1.77 (1.53)	1.13 (0.17)	0.33*** (-4.10)	5.16*** (4.03)
Controls for CEO characteristics:

(节选自Petrovsky et al. 2017)

Chang 等 (2004)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形成了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论证，上级领导者是如何决策下级管理者的任期的。相比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管理者任期的理论分析，自上而下任命的管理者任期的理论分析更为趋向于简约化 (reduced form)，而缺乏结构性的机制分析。但是，相关的实证分析是极为丰富的，从而研究者也发现众多重要影响因素。例如，Berlinski (2007) Arias 和 Smith (2018) 提出个人特征如年龄、教育水平等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管理者的绩效也代表着其个人能力是其任职长短的重要决定因素 (Berlinski 等., 2007; Mani, 2014)。此外，对于部分分析对象为政府机构管理者的研究，他们也侧重了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类似的论证也出现在 Dull 等 (2012) 的研究中。

如何确定管理者任期

显而易见，无论由何种机制确定任期长短都有其优缺点。现实当中，企业或机构应该充分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决定方式。前者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更具效率。在决策任期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管理者候选人的个人特质、能力，同时也要兼顾营商/经营环境，以及企业/机构自身的运营特点。

媒体聚焦

卢晶亮谈“七人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相对落后



编者按：

2021年5月11日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主要数据结果。

据通报，中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人普”）增加了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0.53%，相较“六人普”下降0.04%。这表明，中国人口十年来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人口性别结构相较“六人普”得到了改善。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七人普”从2020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进行入户登记，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抽取141个县3.2万户，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婚姻生育等。漏登率为0.05%。

据央视新闻，“七人普”是历次普查中、项目数量最多最细的一次。比“六人普”增加了身份证号码登记、3-6岁学龄前儿童受教育情况、60岁以上人员居住情况等指标，同时采用了以电子化采集数据方式开展人口普查登记等新技术。

如何解读“七人普”相关数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人口经济学家、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以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

本文选取卢晶亮的访谈部分。

1. 你认为本次公布的数据中，最重要的数据是哪一项？如何解读？

我比较关心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流动人口规模与分布。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达63.89%，较2010年上升14.21%。流动人口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3%；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比88%；而在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流向东部地区的占比73.5%。

这表明，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较快，人口向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明显。以广东为例，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8.93%，十年间人口增长20.81%，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对人口的吸引力。

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继续提高依然是大势所趋，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相对落后。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规划应该以常住人口规模为依据。

2. 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该如何解读？

二孩出生占比高是以往受限制的生育意愿的逐步释放，但是“二孩”效应已经逐步减弱。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婚姻推迟导致的生育推迟、养育成本等因素都会抑制生育意愿。

3. 公布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8.8亿，但与2010年相比，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如何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你认为人口红利还存在吗？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抚养比较低这样一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从数据

上看，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3.35%，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看，我国应该尽快促进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也就是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老龄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但老龄人口的人口素质也在提升，要充分开发老年人口的劳动力资源。

4. 照惯例，统计局人口普查会先公布几项主要数据。之后出普查年鉴，才会有详细数据。这一次未公布的数据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未来期待公布各省之间详细的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各省分城乡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生育率等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发在南方周末

广东“男多女少”为何最明显？珠三角人口进一步聚集……卢晶亮谈广东七普数据



编者按：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广东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市从2010年的2个增加到3个，继广州（1867.66万人）、深圳（1756.01万人）之后，东莞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千万大关，达1046.66万人，迈入千万人口大市。数据也显示，广东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773.48万人。以女性人口为100，广东全省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9.00上升

为2020年的11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01个百分点，在31个省份中“男多女少”情况最明显。

东莞凭什么成为新晋“流量城市”，在人口加速向珠三角城市聚集的时候，粤港澳大湾区内又该如何进一步引导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什么原因导致广东总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广东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如何影响性别构成？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

以下内容根据羊城晚报内容整理。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加逾100万人的市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等六市，均为珠三角城市，分别增加713.65万人、597.58万人、230.46万人、224.64万人、144.59万人和129.72万人，上述六市常住人口增量合计1772.42万人，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的81.71%。

未来，竞争不会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区域与区域、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卢晶亮认为，“广东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定位是不同的，比如粤北地区，打造生态发展区，侧重于旅游业和绿色产业，它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就没有这么多，那么人口就会相应往经济更为发达的珠三角区转移，所以广东这些年也一直在发展轨道交通，要先把路打通，才能促进人口流动。”

根据15日发布的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广东的21个城市中，常住人口性别比均超过100，在100至105之间的城市有6个，在105至110之间的城市有8个，在110以上的城市有7个，其中超过120的城市为东莞（130.06）和深圳（122.43）。记者发现，广东常住人口的“男多女少”局面已维持多年。2000年以前的五次人口普查，广东总人口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总人口性别比较低地区之一；而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广东总人口性别比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2000年-2010年，珠三角9市的性别比都在上升，东莞、深圳和中山的上升幅度居于前三，总人口性别比从低于100上升到超过113。

“与浙江和江苏相比，广东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性别比也较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告诉记者，人口流动主要受到工作机会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因此产业结构肯定会影响就业结构进而影响性别比。

卢晶亮进一步提到，学历水平和高技能对于两性劳动力的赋能是一样的，但如果主导产业对体力劳动要求高的话，男性劳动力的优势会比较明显。“我们可能不必过于担忧广东性别比高的问题，这种现象更多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

本文首发在《羊城晚报》

暨济一堂

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主旨发言摘编

2021年5月8日-9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顺利举办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来自芝加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绵竹市教育局、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中国人口学会迁移流动专业委员会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了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Part 1对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子女面临问题的几点思考



发言人：冯文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口流动在近年来展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冯文猛教授通过分析这些趋势，和我们讨论了人口流动引发的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冯文猛教授指出2020年在疫情影响之下，人口流动呈现出的新的趋势，包括整体流动规模的缩小、跨省流动规模的缩小以及省内流动数量的提高。从流动人口的特征来看，家庭流动的比例较前些年有所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则主要集中于第二、

第三产业，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略高于往年。

从近年来整体宏观趋势来看，处在快速城镇化时期的我国社会将来依然会有大量的人口进行乡城流动，流动人口现象、以及伴随着流动人口子女的问题依然会长期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乡村的全面振兴对人才的回流也具有较强拉力，包括产业从东部到西部的转移，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些对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的转变、就业结构的转变等都有较大影响。因此，城镇化造成的人口乡城流动与乡村振兴对人才的拉力，使得未来人口流动的趋势判断增添了一些复杂性。城乡之间如何在此新的格局下判断人口流向以及新格局下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子女问题的解决，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冯文猛分析了新形势下流动子女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体系的变化以及教育方式的改革在近年来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力量的推动下产生很大的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帮助流入地政府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留守子女需要更加关注家庭教育的缺失，关注村庄空心化导致的各类环境失衡对教育资源布局的影响，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对留守儿童关爱陪伴中的问题。

Part 2投资婴幼儿早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最具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政策



发言人：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

儿童在3岁之前的发展阶段，是人的大脑、社会情感、语言、精细运动发展最关键的一个窗口期，Heckman的投资曲线表明，该时期对儿童的投资回报是最高的时期。史耀疆教授认为，儿童早期的投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的一个有效策略，但目前社会对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史耀疆教授指出了目前零到三岁阶段早期教育的五大缺口：社会缺乏早期投资重要性的认识，缺乏零到三岁的早期教育人才，缺乏儿童早期教育影响的科学论证，缺乏简易推广的儿童早期教育策略，同时，也缺乏儿童早期教育的成熟产业。

史耀疆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团队所做的婴幼儿早期发展现状研究及养育行为干预系列实验。他发现，农村地区零到三岁孩子认知滞后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小孩，而在社会情感、语言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滞后情况。史耀疆教授团队通过指导家长们与孩子们按实验计划做游戏、读绘本，改善家长的养育行为，提高婴幼儿的认知、社会情感、语言水平。随后他们在贫困农村地区建立养育中心，让孩子能够在养育中心读书游戏，通过设置干预组与对照组，他们发现养育中心的模式对孩子的认知发展、语言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对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史耀疆教授也在移民搬迁区发现了同样的儿童认知滞后问题，通过在移民搬迁区建立“超级养育中心”，试图改善孩子的早期发展状况。最后，史耀疆教授介绍了他们正在做的儿童早期营养、健康、早期学习、回应性照料、安全五个方面的现状和改

善研究，通过对产前产后的全面健康指导，测试此类健康干预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效果。

Part 3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基于全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言人：吴开俊（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5年起，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开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地区分比例承担，但至今责任划分都没有很清晰。吴开俊教授通过对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的分析，指出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现存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的主体责任在流入地政府，中央财政承担的比例仅为3.22%，其中东部地区的中央财政占比最低。而东部地区随迁子女体量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也是最高的，其中广东、浙江和江苏尤为突出。

其次，2018年全国有300万农民工子女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东部占比为78.67%，经费缺口占全国经费总缺口的84%。从省份来看，广东（不含深圳）的经费缺口大概为188亿，但根据测算，广东政府的教育财政供给能力仅为81亿。浙江、北京、上海和江苏的财政供给能力大于经费缺口，但具备支付能力并不等于具备支付的意愿。

最后，吴开俊教授提出，根据地方财政供给能力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外部效益发生范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财政支出责任应适度上移到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比例应该达到6:1左右。

Part 4 回流儿童规模及回流经历对学生留级的影响



发言人：宋映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回流儿童是处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间的一个群体，宋映泉副研究员基于他们之前的多项调查研究，估计了回流儿童的规模，同时分析了回流经历对学生留级的影响。

首先根据 2010-2020 年的五项调查，宋映泉用两种方法分别估算了回流儿童的规模大小。一，根据五项调查所有样本学生中回流儿童的发生率，计算出平均发生率为 8.2%，粗略估计回流儿童规模为 779 万；二，计算出留守儿童样本中的回流儿童占比为 10.77%，估计回流儿童规模为 678 万。

宋映泉对儿童回流经历和留级情况进行了 logit 回归，结果表明回流儿童留级的概率高出非回流儿童 1.5 到 3 倍。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的留级概率高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其他研究也表明留级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是正面的。

最后，宋映泉表明目前的研究仍有许多局限，例如对回流儿童规模的估计方法有待改善，回流对留级的影响机制也需要更多的探索。

方面，要处理好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以教育与城市规划的联系为例，作为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其城市规划要通盘考虑流动人口及其随迁或留守子女对这座城市在未来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安排、劳动力补充等方面的影响，要把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切实纳入到城市规划中进行落实。

Part 2 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的指标构建及影响评估



发言人：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儿童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随迁子女的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 34.23%，远远低于全国平均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 88.3%。

陈媛媛和她的合作者将异地中考政策门槛量化，研究异地中考门槛难度对流动人口返乡、子女留守和子女高中入学率的影响，研究范围共选取了 83 个城市。首先，将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拆分成对社保、居住证、稳定居所、报考学校限制等具体要求，对不同项根据年限赋分，构建异地中考门槛难度的评估体系。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5 年，每个城市异地中考门槛难度系数和排名变化不大，一线城市异地中考一般难度较大。其次，异地中考政策越严格的地方，流动人口回流越多，特别当孩子越接近中考年龄时，家长回流更明显，子女留守情况变动也呈现相似特征。最后，异地中考政策冲击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入学率，且异地中考政策对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的高中入学率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

Part 3 流动儿童入学友好度排名：计算与展望



发言人：冯思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流动儿童蓝皮书（2019~2020）》项目负责人）

冯思澈谈到，首先要构建积分入学和材料准入的友好程度指标，主要根据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纳税情况、奖项与荣誉等政策要求按不同年限要求予以赋分。研究显示，在积分入学的城市中，珠三角城市（广州、深圳、中山、东莞）更重视基本累积指标，而长三角城市（上海、苏州、杭州）更重视个人素质与能力指标。在材料准入的城市中，西安和兰州的流动儿童入学难度更为友好。根据研究结果，冯思澈倡议，希望各个城市在今后无论是积分入学，还是材料准入的指标应当更加突出基本累积的要求，尽量减少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因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属于公共服务，体现一个国家公共政策和社会教育公平。这也与国家政策的前进方向一致，《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发言摘编

Part 1 从少子、老龄化的背景和劳动力供给两方面重新思考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发言人：王谦（中国人口学会迁移流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流动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现象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缓解少子、老龄化冲击。原来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在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获得的住房、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尤其是流动人口最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的子女教育的公平。而基于我国目前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冲击，这一人口现状应该被纳入我们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新角度或者说新背景。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教育系统内部来看，对流动人口子女所涉及的学籍转移、异地高考政策等问题，无论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中，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另一

Part 4中考成为限制流动儿童 在城市发展的关键分水岭



发言人：向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讲师，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理事长）

从义务教育阶段来看，如果跟北京、上海、天津，甚至是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相比的话，在广州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其实相对宽松。在义务教育阶段，在广州，包括珠三角大多数的城市，是比较少遇到小学完全就读不了的情况了，家里只要能给得起几千块钱的学费，基本上还是会有书读，只是可能没有享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

向芯团队发现，在中考方面，如果是广州户籍的学生，考上普高的机率实际上接近75%。如果是非户籍生的话，团队跟踪的数据显示只有15%不到，等于说非户籍生上普高的机率实际上只有户籍生的20%-33%不到。在高考方面，异地高考现在的门槛整体在逐步降低。因为在广东省一般就是3年学籍，加上居住证，其实流动子女能在这里读得了普高的话，参加高考一般问题不会特别的大。所以整体来说，中考现在实际上是限制流动儿童在城市就读最为关键的分水岭，也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向芯谈到，青草作为一个公益机构，开展的主要项目即为关注流动青少年的升学和职业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被卡在中考这个门槛之下的群体。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开展了一些服务工作，包括职业规划进校园，邀请各行各业的职场志愿者走进小学、初中校园，分享他们的职业故事、职业关键门槛，还有个人经历，探讨初中阶段可以为未来的发展做什么样的准备。以及做升学指导，

针对打工者子弟的升学问题，进行一个知识、政策层面的解答与解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降低信息不对等以及做出适合的决策。

Part 5上海随迁子女学校的近况



发言人：周纪平（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前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

从上海市现状来看，随迁子女学校数量从原来的185个减少至今年迄今为止的52个，且6月30号以后将再减少17个。由于上海随迁子女学校全部占用的是民办学校名额，因此随迁子女学校的关闭与上海的民办学校收缩有很大关系。随迁子女学校关闭，学生进入教育质量更高、经费更充足的公办学校，受到家长支持，但难点问题就是失业教师的安置和补偿。

此外，周纪平老师分享了两个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相关的政策导向。其一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的讲话。其讲话介绍了2015年至2020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量的快速增长趋势，以及2020年实现85.8%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政府成绩，并提出接下来政府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一是降低入学门槛，重点推进特大城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完善入学政策，做到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入尽入。二是扩大城镇学位供给，随着常住人口的增长同步建设城镇的学校，完善政府购买学位政策，将随迁子女占比较高的民办学校优先纳入政府购买学位范围。这两点也是引起媒体兴趣和高度关注的领域。

其二是上海市新城建设的人才需求引起人口政策转变。上海市关于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5个

新城的建设规划，提出每座城市7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规模目标。为此，上海采取了缩短居转户年限及各种积分奖励政策；基于农民工引进难度大的现状，有NGO人士则建议通过教育、培训手段留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以实现新城发展所需人口目标。

Part 6关注城市群、城市化进程中的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发言人：唐晓杰（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最近中国推进了几大战略，包括扩大内需、理顺产业链供应链、城市化战略、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打造生态文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等。其中城市化战略是未来中长期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城镇化、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的人口积聚不可避免。从未来看城市各级教育的毛入学率会越来越高。这样一个多元诉求格局中，现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被忽视。尤其是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他们在经济上面、政治上面、文化上面、社会心理上面都处于不利的处境，这个问题如不予以重视，以后会引起更多社会问题。

唐晓杰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首先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有一个职权分工合理、管理有效的服务体制。从国外经验看，日本中央政府和日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各有明确分工责任。因此，我国在教育投入的政府转移支付机制方面，可以更多地借鉴日本、韩国等相似国家的经验。其次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问责机制，需要明确好弱势群体的

教育问题谁来负责。最后是需要建立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机制。

Part 7提高流动人口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

发言人：刘基国（广州大道南小学校长）



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基本概念——“随迁子女”与“流动人口子女”。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可以将随迁子女做一个界定，即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才是“随迁子女”。那么在流入地没有办理居住证的，为了区分我们暂且称之为“流动儿童”。目前的文件，绝大多数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就是一部分流动儿童的教育保障被排除在外。

此外，很多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的教育资源质量相对较低。一些大中城市因为流入地的人口比较多，教育资源紧张，学位供给不足。目前所实行的积分入学政策门槛很高，而且积分入学学位仅能够申请读一些城乡结合部地段招生人数不够的公办学校，或者是政府向一些普通民办学校购买的学位。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相对较低。

刘基国呼吁，第一，除了降低入学门槛、增加城市学位保障之外，还要逐步地放开居住证的限制，让更多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第二，要推动向公办学校区域内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有更多的优质均衡发展区；第三，大力扶持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Part 8 关注随迁儿童在城乡流动的双向融合障碍



发言人：魏爽（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以往研究社会融合都是研究流入地的比较多，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些流动儿童来说，由于他的流动是动态的，似乎很难从单向度的流入地去看他们的融合。因此，魏爽及其团队希望从这个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一个孩子的流动轨迹以及他在不同地域的社会融合情况。

魏爽在北京选了一所公立中学、一所公立小学、两个打工子弟学校，还有一家专门做流动儿童服务的社工机构，做了两年深入的研究，访谈了39个孩子。并跟踪他们返乡或再次流动后的情况。魏爽的发现有四方面：1) 从教育融合方面看，城市和返乡之后都存在着融合的困境，不仅仅是条件、资格这样的显性准入门槛，还包括了隐性的入学门槛，例如在择校和择班问题上也面对着很多的不公平与不友好。2) 心理融合上的身份认同危机。回流的儿童他的同伴关系也存在很大的冲突和矛盾。3) 社会关系融合。无论是进城还是返乡，整个家庭的社会资本需要重新积累与断裂。4) 文化融合。在城里，城市生活越久的孩子，城市对他的影响越强，例如语言障碍、生活适应等方面。

Part 9 从政策到实践——流动儿童教育的历史变迁



发言人：王元腾（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

王元腾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放宽视野，脱离出政策从整个政策的复合体来看流动儿童教育相关政策变迁。虽然中央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不断改善，但地方政府却缺乏回应，地方政府更多地将流动儿童、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视为社会治理或城市发展问题而非教育问题，甚至只从自身短期晋升的角度来看待，因此学界和中央政策的呼吁与地方政府的考虑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以上海为例，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上海对国家“十四五规划”所提的积分互认政策并不十分感冒，流动儿童在不同地区间快速流动的不确定性，使其成为各地方政府不愿管也不能管的群体。

王元腾提出，政策落实和变迁的过程能够体现出社会学所讲的合法性机制的逻辑，即政策出台如何让社会认可。这一逻辑主要体现在中央层面，无论是国际舆论对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影响，还是联合国开发署对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推动，都符合这一逻辑。学界所倡导的公平价值观、平等的教育权利也与中央政策相匹配。但落实到中层和基层政府，在科层体系和晋升驱动的制约下，这套逻辑就不再适用。流动儿童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流动儿童问题，而是被放到整个行政体系中考量的边缘化问题，只有当流动儿童教育与中层、基层政府关心的核心逻辑沾边时，这一问题才会短暂地得到重视。上海的民办学校缩减背后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对于学界来说，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认可的问题、公平性问题等进行呼吁，另一方面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和行为，对症下药打到其痛点，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随迁子女教育的公平。

Part 10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随迁子女教育的初步思考



发言人：王学男（《新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

王学男首先梳理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变迁。在1998年教育部和公安部提出了解决流动儿童入学的思路“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并授权了流入地学校收取借读费；但同年又提出“严控大城市人口”的政治任务；在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的时候则增加了流动儿童在父母工作、居住地入学“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流入地政府的责任边界，因此为以后各地在自行制定办法的时候设立各种门槛留了口子；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提出了“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可以随着儿童流转，但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各地教育财政的差异影响。

目前，随迁子女教育依然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了地方教育政策与政治与经济发 展的目标的优先级矛盾、教育经费执行的可行性、门槛设立的后移（从入学门槛到升学门槛、从小升初到初升高）、“积分落户”“积分入学”所带来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冲突、家庭社会资本不足、面试入学、共民同招等招生政策变化的影响等等。王学男建议，应当继续推动入学降门槛，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切实加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关爱和社会融合。

Part 11 城市支教，不仅仅是支教



发言人：梁海荣（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是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省份。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每100个流动儿童中，就有近23个在广东省，而珠三角聚集了广东省80%的流动儿童。在这个背景下，2018年7月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城市支教项目，通过关注流动儿童成长与教育、有社会责任感、希望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志愿者赋能，支持其在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开展儿童教育活动和课程，为流动儿童可持续地提供教育活动和课程，弥补流动儿童家庭陪伴不足，帮助他们融入社区，提升流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使之成为一个有行动力、有责任心、有幸福感的人。

城市支教项目从社区为切入口，2020年，合计开展培训10场，培养14位课程志愿者，开展活动12场课程活动，服务120个城中村社区亲子家庭。目前2021的活动也在持续开展和安排。第一期招募志愿者32位，开展培训6场，线上4场，截至目前开展活动7场课程活动，服务90个城中村亲子家庭。

“乡村振兴大讲堂”内容精华

张跃华：农业保险理论基础、政策逻辑与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近年，在中央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稳定农业生产、维护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4月13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跃华教授受邀做客我院“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以农业保险为核心内容，为我院师生带来题为“农业保险理论基础、政策逻辑与乡村振兴案例分析”的讲座。

张跃华通过文献回顾系统梳理了农业保险的理论基础，并以农业保险的实际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中如何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农业生产进行支持。

首先，张跃华在讲座伊始介绍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农业保险研究既综合了保险经济学和农村金融等经济学方法，又依托于广泛的田野调查，以弥补现有微观数据库的变量不足。农业保险研究通常以农业保险为自变量，考察其对农民生产行为（如收入、生产规模、食品安全质量等）的影响，从而证实农业保险作为财政支持手段的有效性。

接着，张跃华简要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实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在粮食进口影响中国粮食竞争力的背景下，农业保险作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农作物收入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农业生产受灾时保护农民收益安全，降低农作物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此后农业保险的政策作用得到进一步重视，2004年至2020年，中央1号文件连续17年明确指出要尽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大部分保费由政府承担，本质上作为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保险被赋予较强的政策目的。在这一部分介绍中，张跃华还通过

三亚台风影响水稻育种产量的例子，对比差异化种植等传统风险规避机制与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其次，张跃华带领大家回顾了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及相关研究演变。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出现零星的农业保险试点；1950-1958年，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开始通过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项目；1980-2002年是国内农业保险大发展阶段，保费增减与政策密切挂钩；2004年至今，农业保险得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1号文件连续多年指导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制度建设。但从研究演变看，早期国内农业保险相关文献相对贫乏，现阶段国内农业保险研究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处于较低层面，多为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政策性探索，缺少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实证研究。

接下来，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张跃华重点分析了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他首先简单回顾了传统保险需求理论、国内外农险需求理论等农业保险需求相关文献，然后以实地调查案例为依据，介绍了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结论。中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解释：一是农户收入低、预算约束紧，导致保险购买能力差，同时农业风险也并非影响农户生活的最主要因素；二是农户对农业保险了解不足，或由于保险公司个体失信行为降低了农户信任度；三是农户通过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风险的成本过高，更愿意采取差异化种植、人情理往等传统保险机制；四是农户的风险态度趋于中性，收入越低的人越不害怕风险。从需求分析可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加强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改善和创新农业保险险种设计等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此外，张跃华对农业保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总结，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特殊性（活标的物）、农户与保险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农业风险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以及政府干预的挤出效应等其他因素。

最后，他以农业保险创新案例分析作为讲座结尾，向大家介绍了“农业保险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

这一案例。在该案例中，保险公司对病死猪的赔付高于市场上死猪收购价，会提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以降低死猪成本、实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积极性。张跃华总结该案例指出，农业保险是具有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及精准扶贫等多项利好的有效支农政策手段。

汪阳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产品市场的福利影响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村产业的转型乃至乡村振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月13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活动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汪阳洁，为我们做了题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产品市场的福利影响”的讲座。

目前，国家对电子商务进入农产品市场非常重视，以往由于中间商掌握了大部分农产品交易信息，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依靠中间商来进行交易。那么电子商务进入农村，可能会带来产品价格的变化，造成销售价格提高，或者购买价格的下降。因此，电子商务进入农村之后，中间商是否需要退出农产品市场，或者说，中间商需要在什么情况下退出市场，以及，中间商退出农产品市场后，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汪阳洁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团队所做的研究。

汪阳洁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合作，在2018年和2020年对山东、浙江两省的农户开展了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为主题的跟踪调查。初步来看，电商进入农村后，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开始扩张，而农户的销售模式选择明显分化，对于销售规模较大的农户，农

村电商的发展对其带来了利润增长，但是对于规模小的农户，电商进入仍然有较高门槛，中间商仍然是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这样一种分化的趋势引发了作者更加深刻的思考：为什么销售规模较大的农户倾向于“去中间商化”，而销售规模较小的农户倾向以中间商交易为主？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否要“去中间商化”？从传统中间商模式到完全的“去中间商化”，社会各方福利如何变动？

作者构建了基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传统中间商”二元销售渠道并存模式下消费者、农民和中间商行为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探讨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模式变革和其中蕴含的“去中间商化”倾向对交易各方福利的影响。接下来，作者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模型构建。

数理模型设定——农民行为模式

- ▶ 假设 n 个农民是同质的，农民的总产量为 S_j ，其边际成本为：
$$MC_j = S_j \quad (4)$$
- ▶ 农民 j 在线上销售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为：
$$MR_j^L = P_w - c_j - S_j^2 \quad (5)$$
 - P_w ：线上市场均衡价；
 - S_j^2 ：农民的线上销售量；
 - c_j ：农民线上运营边际成本增量。
- ▶ 农民 j 在线下销售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为：
$$MR_j^D = P_d^j - S_j^2 \quad (6)$$
- ▶ 农民 j 在线下销售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为：
$$MR_j^D = P_d^j \quad (7)$$
- ▶ 农民的最优分配决策建立在以下条件下：
$$MC_j = MR_j^L = MR_j^D \quad (8)$$
- ▶ 农民的总福利为：
$$\pi_j = P_d^j \cdot S_j^L + P_w \cdot S_j^D - \frac{1}{2n} c_j \cdot S_j^D - \frac{1}{2n} (S_j^L + S_j^D)^2 \quad (9)$$

随后,汪阳洁对模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首先是关于各均衡价格的影响,关于线上市场发展能否提高农民线下销售农产品的议价能力,取决于农民线上运营成本增长的快慢。而农产品线上市场发展促进中间商出售价的下降,农民线上销售边际成本增速越快,中间商出售价下降幅度越大。线上市场发展促进线上市场均衡价格上涨,农民线上销售边际成本增速越快,线上均衡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其次,关于对总交易量的影响,农产品线上市场需求发展能否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总交易量,取决于农民线上销售边际成本变化的高低。最后,关于对各类福利的影响,作者认为,农产品线上市场促进了农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福利提升的增幅会受到异质性的影响。而对消费者来讲,销售渠道的增加促进了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但线上消费人群需要承担线上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当线上运营成本上涨较快时,该成本的增加超过线下消费者福利的增长。对中间商来说,农产品线上市场整体挤压了中间商的福利水平。而对总体福利的影响则呈现了一些异质性的变化,如果成本处在较低水平,虽然中间商的福利会降低,但社会总体福利会呈现增长趋势,而线上交易的成本越来越高时,社会总体福利会呈现倒U型的下降趋势。

因此,在电子商务进入农村,通过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带来一个直接对话交易的平台可以改善总福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用线上交易取代线下交易,因为线上交易成本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变化,可能并没有中间商提供的服务比如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带来的社会福利高,这样的情况下,线上交易带来的福利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因此,成本问题将成为我们研究此类问题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作者也在实际调研中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电商村和非电商村农户销售农产品所获得的中间商收购价、总交易量、总利润以及单位线上运营成本的差异,可以反映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强弱对农民的部分影响。作者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政策中心2018年和2020年两轮农户跟踪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的确带来了

农民线下议价能力的提高与农产品销售利润的增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导致了更高的线上运营成本,对社会福利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

数理模型设定——农民行为模式

- 假设 n 个农民是同质的,农民的总产量为 S_j , 其边际成本为: $MC_j = S_j$ (4)
- 农民 j 在线上销售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为: $MR_j^* = P_w - c_j \cdot S_j^*$ (5)
 - P_w : 线上市场均衡价;
 - S_j^* : 农民的线上销售量;
 - c_j : 农民线上运营边际成本增速。
- 农民 j 线下供给量为: $S_j^* = S_j - S_j^*$ (6)
- 农民 j 在线下销售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是: $MR_j^* = P_d^*$ (7)
- 农民的最优分配决策建立在以下条件下: $MC_j = MR_j^* = MR_j^*$ (8)
- 农民的总福利为: $\pi_j = P_d^* \cdot S_j^* + P_w \cdot S_j^* - \frac{1}{2n} c_j \cdot S_j^{*2} - \frac{1}{2n} (S_j^* + S_j^*)^2$ (9)

线上运营成本随线上销售量增加

最后,汪阳洁讨论了此项研究对我们的政策启示,需要着力提高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与福利水平,降低农民线上运营成本,同时也要培育优质中间商,提升农产品销售环节的竞争性,这对促进大额或难保存农产品快速交易,降低农户存储、管理与滞销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也要关注农村电子商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应当更加关注那些在电子商务中不具备线上运营成本优势的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支持,减小电商发展对农村内部带来的不平等。

周应恒：推进集体产权改革，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结束之后,习总书记将乡村振兴提升为全党全社会的重要战略。集体产权改革作为乡村振兴布局中的重要一环,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6月11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乡村振兴大讲堂第四期活动邀请到了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周应恒,为我们做了题为“推进集体产权改革,助力乡村振兴”的讲座。

一、背景及改革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历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从1950年代中后期,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与集体化运动,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并于1960年代初调整为独特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农村集体经济体系。这一制度尽管实现了小农的组织化,有效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也为农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但由于人民公社的“工农商学兵”多元一体的政经不分,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机制,严重扭曲了成员个人与集体的激励关系,形成“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1978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农户经营自主权的恢复,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我国农村仍然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营与农户承包经营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也确实出现了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依靠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区域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有个别坚持集体经营的村社,依托集体经济的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仅实现了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富裕,也大大提升了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但是对于大多数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主要还是靠小规模农户农业经营发展非常缓慢,“双层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非常薄弱。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资源面临“产权不清、权能缺失、运转失灵、治理失效”等一系列问题。这严重阻碍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权益难保障,乡村治理能力受阻。

集体所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特有的经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在城镇化、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小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和冲击,面临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采取了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龙头企业和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措施,但并没能有效解决我国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经营细碎化局限日益严重,“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约束。因为,发挥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亟需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系统改革,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策指向与改革进展

为了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及地方积极探索试验,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总结二十多年来各地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出台的中发37号文件《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集体产权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用3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就是说,2021年是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阶段性任务的收官之年。根据这一文件的安排,集体产权改革包括完成四个关键任务:全面开展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由点及面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领导。

根据这项文件,集体产权改革的指向是在农村建立股份合作制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新体制,作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二者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合作制为本,以股份

制为用的新型经营组织。相较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股份合作社更多的是农村生产要素的合作。股份合作制在组织方式上借用股份制的做法,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坚持入股自愿,不得退股,股权可以继承、转让;在办社宗旨上坚持合作制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走共同富裕之路,股东们必须平均或基本平均持股,不允许持大股,更不允许个人控股。

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的区别

类型	宗旨	持股比例	组织方式	分配方式
股份制	以资为本 盈利为目的	没有限制	入股自愿 不得退股	按股分红
合作制	以人为本 共同富裕	平均拥有 集体资产	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	按交易量 (额)分红
股份合作制	以人为本 共同富裕	平均或 基本平均持股	入股自愿 不得退股	按股分红

依据 2016 第 37 号文件的要求,为了全面推进集体产权改革这项农村基本制度的变革,2017 年以来党和政府在每年的政策部署中,不断强调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要性,着力推进全面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明确要求通过改革,要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处理好“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截至 2020 年底,全面启动集体产权改革四年以来,全国先后组织开展了 5 批试点,范围覆盖所有涉农县市区,目前 18 个省份完成了试点任务,其余 13 个省份也将于 2021 年完成。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面完成,摸清了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表明集体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农村集体资产为 6.5 万亿,占全国总资产 1300 万亿的 0.5%,占全国国有资产 234 万亿的 2.78%,可以说还是比较弱小的。其中,集体资源性资产面积 65.5 亿亩,占全部国土 144 亿亩的 45%,其中农用地 59.1 亿亩,建设用地 3.8 亿亩,未利用地 2.6 亿亩,土地资源丰富。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从资产构成来看,全国有 3.1 万亿元经营性资产,其中 1.1 万亿元的资产收益已量化到成员,非经营性资产 3.4 万亿元。从全国来看,尚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资源共有 15.5 亿亩。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村集体资产大体东中西部呈现“6:2:

2”的分布布局,东部地区资产 4.2 万亿元,占总资产的 64.7%,中西部各占 17.6% 左右。此外集体资产还存在层级分布差异大以及村庄之间资产分布不平衡的现象。村级占 75.7%,组级占 13.1%,乡镇级占 11.2%。超过 75% 的资产集中在 14% 的城中、城郊及资源丰沛的村。

在完成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进展顺利。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认,成员总数约为 9 亿人。集体产权关系得到明晰,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序推进,53 万个村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超过 50 万个村领到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得以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逐步完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2019 年全国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2020.5 亿元,成员人均分红达 94 元。

三、新型集体组织的内涵特征及功能定位

新型集体经济是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以明晰的集体所有制产权关系为基础,依托成员边界清晰、运行制度健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股份合作等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经营方式,通过聚焦集体资源出租、物业经营、资产使用权入股等社区型经营领域,实现集体成员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以下特质:集体形成的财产由成员共同所有,但不可分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共同富裕,获得收益遵循按资产份额分配为主的基本原则;保持鲜明的社区封闭性,成员共同所有的资产,可以合法继承或在组织内部转让。新型集体经济作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成果,能够为集体成员提高最基本的生计保障,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经济支撑,其分红也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重要来源,还可以为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供坚强保障。

四、新型集体经济的现行运行模式与发展路径

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自身的特性以及风险控制的要求,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目前主要有以下五种路径与经验模式:首先,资源经济,可以将集体资源进行出租获得租金收入;第二,物业经济,村集体通过盘活村内闲置的固定资产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建物业项目对外出租获取经济收入;第三,股权经济,农民集体将土地等资源的经营权或固定资产的使用权以及资金入股等方式入股农业企业以获取企业收入分红增加收入;第四,服务经济,领办创办多重形式的服务实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劳务介绍、土地流转中介、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增加集体收入;第五,共建经济,通过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村村合作、村企共建、抱团发展、强强联合、以强带弱、组建联合社等非法手段,探索发展飞地抱团经济,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五、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集体产权制度与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独特的制度,无论社会还是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必要性的质疑依旧存在。这表现现阶段集体经济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论性的,也有认识性的还有实践性的问题。首先在理论上,为什么必须发展集体经济,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条件是什么?其次,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的理论基础和体制机制是什么?作为一个资产不可分割的成员具有社区性的封闭组织,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封闭性的组织,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长期是否会动摇农村集体所有制?并且,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公益性组织,土地资源等不能进行破产处理,因此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时,如何与其他经济主体公平竞争。再次,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如何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也可能存在冲突。再次,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会损害农民的主体地位,无法得到有效地落实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最后,集体经济组织与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关系规范如何保证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运营。当然,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包括集体经济发展缺乏专门的法

律支撑,区域和组织间的巨大不平衡性和主体的异质性问题,成员有偿退出和继承的可操作性问题,支持和管理制度与环境不协调,现有的发展路径与模式面临巨大约束等等。这些都是集体产权改革以及集体经济组织运营与发展已经面临并需要在改革深化中解决的问题。

六、阶段性的判断和思考

报告认为,中国特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的有效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是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推动农村发展,改善乡村治理的必要手段,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管长远、管根本、观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在理论和制度探索中,尽快抓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确认集体产权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确保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责相统一的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激发起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基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性,需要根据风险承担能力,探索包括通过平台化将资产收益的信托或其他手段等,推动集体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活动的新模式与途径。

同时把握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认识到集体成员个人共同拥有集体资产的份额,这是一种共同所有权,但成员不能基于这种共有权要求私分共有的资产,只能基于自己的所有份额和成员权力,行使参与权、监督权、表决权以及收益分配权。这也是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的股份制公司进行区分的根本所在。

因为地域与组织的异质性,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属性及其相应的体制机制设计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地区各组织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明确公共财政的支持条件,加大支持集体经济特别是薄弱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力度,推动城乡要素与市场融合,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基本方向,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

数据调查

SEMINAR 回顾

仲量联行朱建辉：中国商业地产趋势研判及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研讨



4月1日，社会调查中心邀请了来自仲量联行华西区研究部总监朱建辉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期主讲人，到暨大曾宪梓科学馆作线下专题分享。讲座中，朱建辉主要向参会师生剖析了目前中国商业地产市场的发展实况，并通过交易数据等展示如何进行市场研究与趋势研判。

朱建辉，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中国区华西区研究部总监。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尤其是华西地区办公楼、零售物业、物流仓储、住宅公寓市场等房地产市场业态研究。

朱建辉开场时简要介绍了仲量联行的市场业务，他指出，目前房地产企业发展已经从资本驱动转向科技驱

动，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行业趋势。整合多渠道多方面的数据，才能形成有效分析，研判市场趋势。数据和科技正在激发商业地产行业的增长潜力。

朱建辉介绍，房地产市场业态可细分为办公楼、零售商业、公寓、酒店、住宅、产业园区等。这些商业地产销售运营等行为所产生的交易数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状态，折射出经济运行轨迹。朱建辉基于这类数据分析发现，2020年全国如北上广深等十多个城市的甲级办公楼市场空置率上升，租金小幅度下滑，这反映了部分企业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后，选择缩减经营面积或放弃实体经营。而从城市甲级办公楼的租户行业数据则

能看出该城市核心经济竞争力所依托的产业结构。如相较于深圳，广州甲级办公楼内企业更多来源于制造业和零售贸易，金融业、数字新媒体产业（TMT）等则相对较少。



此外，朱建辉对比了全国多个主要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的存量、空置率、新增供应量等数据，分析指出，2020年上海优质零售物业供应量较为充足，而成都零售业增长最大，总体零售业在疫情后正稳定复苏。消费品类出现结构性调整，食品粮油、日用品、药品等基础消费总额累计同比上升，通讯器材与化妆品类则逐渐升级为“新基本品”消费，而奢侈品类因为消费者对预期收入的不确定会有所降低。

讲座的后半部分，朱建辉与参会师生一起探讨了大数据应用、宏观经济对于商业地产市场研判的效用和因果联系，分享了办公楼定量分析案例与发现，并通过现场对讲座所在办公楼进行层高指标分析，详细解释了楼宇资产表现的量化指标及指标显著性。



讲座内容充实，贴近社会实际，让参会师生意犹未尽。朱建辉通过多个真实案例并结合大量数据图表，展示了如何通过交易数据等多层面数据研读市场、洞察市场，为参会师生开展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颇具实际指导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徐丽鹤： 中小微企业调查与研究：以广东为例



4月6日，“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一期，调查中心邀请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徐丽鹤副教授担任本次线下讲座的主讲人，与参会师生分享她组织和参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项目时的调查设计及实践和访问员管理经验，并介绍数据中所呈现的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发展特征，探讨中小微企业的调查方法。

徐丽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曾担任2018和2020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广东省执行负责人，其主笔及参与撰写的调研报告多次获国家及省级领导批示。研究方向为援助、融资与经济发展。

徐丽鹤开场时简要介绍了ESIEC样本分布、合作团队等基本情况，她所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团队主要负责广东省企业样本的调查执行。自2018年起，ESIEC已采用面访和电访开展了两轮调查。

根据2018年项目调查情况和实际数据，她指出，企业难找是开展广东省企业调查的第一大难点。由于虚假登记、登记失误、企业搬迁、经营状态变更等原因，在2018年基线调查被抽中的14500家广东省企业中，逾3成企业无法根据工商行政管理登记信息寻找到其实际经营场所，约1成企业实际经营者和创始人无法进行有效联络，仅有24%的企业能“按图索骥”。

讲座中段，徐丽鹤详细地阐述了其开展企业调查时对问卷设计和访问员管理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在问卷设计方面，徐丽鹤认为全行业的问卷设计内容全而不深，且跳转逻辑偏重制造业，目前正探索调整的方式。关于访问员管理，徐丽鹤强调信用是招募的第一门槛，而调查中管理则要以人为本，既要讲授访问员沟通技巧，又要关注其情绪健康，团队内部互为支持。参会师生就访问员招募和管理问题与主讲人积极开展讨论和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讲座的最后，徐丽鹤介绍了2018年广东省企业调查数据中呈现的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发展特征。广东中小微企业大部分经营者相对年轻和高学历，这类企业有着经营状态不稳定、创新活跃度高等特点。2020年应对疫情时，相比于融资、出口退税等政策扶持，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诉求更多在于保持订单供应和降低经营成本。徐丽鹤表示，这些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中出人意料的发现，让她对广东省企业现状有了更为明确和科学的认知，希望这些数据可以催生更多学术和政策产出，真切地关心和帮助企业发展。

北京大学盛誉： 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理论与测度：方法与数据

4月22日，社会调查中心邀请了北京大学盛誉副教授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二期的主讲人。在本次线下专题分享中，盛誉向介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测度和国际比较的理论、方法基础，并探讨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及其测度。



主讲人盛誉，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讲座伊始，盛誉介绍了农业生产力研究的全球背景和国内情况。目前，全球面临着人口与经济增长推动的农产品需求增加和有限的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疫情等新形势下，我国过去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领域中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是缓解上述矛盾和难题的有效措施。

他指出，未来全球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且亚洲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地区，较大收入差距带来的粮食需求多样化也受到生产率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目标。但 TFP 提升的前提是了解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0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测度

盛誉首先梳理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概念。农业生产率本质是衡量生产单位将农业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狭义的投入指土地、资本、劳动等纯经济因素，

广义上的农业投入包括环境、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从经济学角度，以三大经济学假设为前提，TFP 增长是总产出增长与总投入增长的差额，即不包含在要素投入中的增长，或者说 TFP 测度的是无形的技术进步。此外，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新技术采纳，以及国内外经济条件、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但也涉及规模经济、经济周期、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变化、资源配置等其他因素。



盛誉对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力增长进行区分，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 TFP 本身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他以中美数据为例指出，1950-2018 美国年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约为 1.43%-1.5%，中国 1978 年之后年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远高于美国，为 2%-3%。但美国农业总产出增长的约 93% 来自技术进步，而中国产出增长更多来自投入增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仅在 50% 左右。在这种大量产出增加来自增加投入的背景下，研究环境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更为关键。

紧接着他简要介绍了国际通行的 TFP 测度的几类方法，其中 Growth accounting 是全世界运用最多的 TFP 测度方法，但需要全部投入与产出品货币价值，因此数据和技术要求较高。国内运用较多的则是 DEA、SFA 等方法，不同方法中，投入产出的加总方程、加总过程中的权重等因素对测度结果有较大影响。各类测度方法的优缺点如下图。

Method	Pros	Cons
Growth accounting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MFP calculation - Coherent over time - No need to specify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High data requirements (monetary values of all outputs and inputs) - Does not account for noise in data - Assumes efficienc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Allows hypothesis testing - Accounts for measurement erro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Results might be sensitive to estimator used and data sample - Assumes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Does not assume efficiency - Flexible with respect to data requirements (can use both monetary values or physical quantities for inputs and outputs) - No need to specify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Results might change if analysis extended to other countries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Does not assume efficiency - Flexible with respect to data requirements - Allows hypothesis testing - Accounts for measurement erro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eed to specify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 Need to specify the form of the inefficiency term - Results might change if analysis extended to other countries

02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国际比较

盛誉通过图表展示了全世界 1961-2015 年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他发现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外，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研究从资源禀赋、制度差异、生产方式选择等角度进行了解释，而解释差异的前提是测度和分解 TFP 的增长。

比较来看，测度 TFP 的现有方法可分为两类：基于产量、价格的最高级指标和仅基于产量的指标，两类方法的加总方程类似，区别在于权重的使用。在 Shadow price 与 market price 相等的特定条件下，两类方法具有一致性，但现实中前一种方法的农业 TFP 估计值优于

后一种方法。此外，他指出，跨国一致的数据构造与测量方法的选择都存在挑战，价格数据收集工作对于各国间的农业生产率比较至关重要。

紧接着，他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为例，简单介绍了国际上用于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类型、来源及数据概况，包括农业生产账户数据、投入产出数据、国民账户统计数据与农场人口普查 / 调查数据等。

03 中国农业 TFP 和其决定因素

在中国情况部分，盛誉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的农业发展背景及政策制定者对农业生产率的高度关注，并介绍了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TFP 增长及其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其次，以现有文献的大量实证结果为依据，他介绍了技术进步、制度转变、公共政策等影响中国 TFP 变化趋势的因素，以及我国的 TFP 增长模式。从时间趋势看我国年均 TFP 增长率在较大区间内波动（如 1981-1995 年间在 -1.48% 与 6.11% 间变化），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但他也指出，基于不同方法和不同数据（如 FAO 与 ERS），我国现有的 TFP 增长率估算值有明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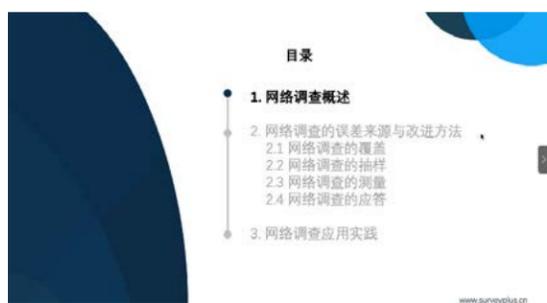
瀚一数据科技胡婧炜：网络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5月25日，调查中心邀请了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胡婧炜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三期的主讲人，为线上会议室的师生们介绍商业网络调查应用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及改进方法，并结合过往调查案例，概述开展网络调查的具体实践要点。

主讲人胡婧炜，瀚一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胡婧炜有超过 10 年调查研究与实践经验，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组任职。主要研究领域是问卷设计和网络调查方法，曾在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Survey Methodology、《社会》等期刊发表多篇调查方法相关文章。

讲座伊始，胡婧炜概述网络调查是一种依托网络和上网设备、由受访者自主填答完成问卷的调查模式，有着信息收集速度快、节省资源和成本、不受时空限制、在敏感数据收集上客观性较高、可实现针对性交互设计等优势。目前，网络调查主要应用在自主投放于社交渠道的调查、在线样本库内调查和混合访问模式的调查等场景。

网络调查的误差主要归类为覆盖误差、抽样误差、测量误差和无应答误差。胡婧炜逐一分析了网络调查中这四类误差的产生原因，并分享相应的处理经验和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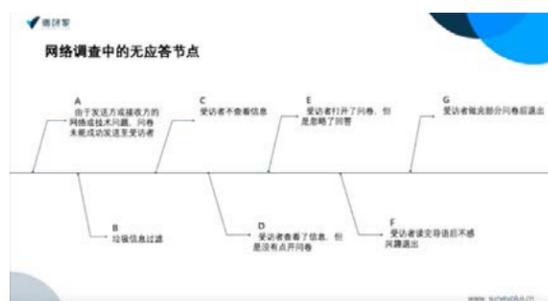
胡婧炜指出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鸿沟是网络调查覆盖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网民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地域等现实因素的差异会影响样本范围代表性。这一弊端将会随着时间和网络普及而逐渐减小，而在这个过程中，开展网络调查可以通过缩小目标范围、采用混合访问模式和调整统计权重等方式来处理覆盖误差。

因为网络的匿名性特点，参与调查的网民难以确定身份和特征，因此对于网络调查而言，获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框是较难实现的。随后胡婧炜介绍和对比分析了网络调查中比较常用的抽样方法，并重点讲解了非概率样本库的运营形式和招募形式。为减少抽样误差，开展网络调查需要根据研究目标改进抽样设计、适当地与概率样本结合和调整权重，并严格评估和清晰描述抽样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



谈到网络调查中的测量时，胡婧炜认为网络调查的问卷依托计算机技术可以实现更丰富灵活的题型、更多样化的视觉呈现、更有针对性的交互设计等设计需求，可以让受访者有更好的调查体验；而交互设计中逻辑跳转、实时校验、随机实验、并行数据收集等设置则可以有效提高问卷数据质量。而不可避免的是，完全自我驱动的答题模式会对答题质量产生一定不良影响。

在分析网络调查的无应答误差时，胡婧炜指出网络调查中可能存在诸多无应答节点，并列以下几种常用应对方式，包括：寻找有信誉的委托方背书、阐释调查主题、优化问卷设计和流程等。而商业调查中，调查执行者还会通过定期发送答题提醒、寻找最佳问卷推送时间、控制问卷长度、优化酬金发放方式等方法来提高应答率和维护样本关系。



讲座的最后，胡婧炜通过过往实际案例讲解了网络调查中如何触达、调查、激励和留存样本，对参会师生开展网络调查和设计执行方案有着积极启示和参考意义。

广东千村调查

2021 广东千村调查已开展四轮预调查

2021年4月至5月，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先后前往清远佛冈、韶关南雄、潮州潮安、肇庆高要四地开展了预调查。

每轮预调查中，项目组均按比例配置研究员、执行督导、测试员、技术支持人员等调查各模块专职人员，组建调研小队，以严谨专业的角度评析问卷设计、执行方案和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的业务匹配度和效率，挖掘调查提质增效的增长点。

预调查小队到访样本村后，与当地基层工作人员开展深入、全面的访谈，并基于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了解和记录了样本村的建设情况、发展困难和短期工作计划。



预调查小队开展入户访问工作

随后，预调查小队前往样本农村家庭，或将受访村民邀请到村委会开展面对面调查。调查过程中，预调查小队通过观察调查表现、模块计时、询问问题理解等方式综合测试问卷及所收集数据的信度。

此外，预调查小队还开展实地绘图测试，模拟学生绘图员角色，对途经的村居和其他建筑进行信息标记和地图绘制，录入自主研发的绘图App中，确保绘制新图和原图核查不重不漏，为准确、科学的调查抽样提供基础依据。



预调查小队记录村居建筑信息

每一轮预调查结束后，小队汇总测试结果，讨论调整方案，从调查的各模块着手逐步完善调查流程、问卷细节，完善健全调查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为7月全面铺开调查和收集高质量微观数据而做好准备。

调查之余，在走访农村的过程中，小队观察和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种种变化，整洁的村居环境、特色乡村文化墙绘、崭新的娱乐健身设施等无不显示着乡村正在唱新调、焕新貌。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真实地走进乡村、看见乡村、记录乡村，才能找准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明确乡村发展的新路径。此后，广东千村调查将继续以广东乡村为立足点，发挥高质量数据收集和科学政策制定的经验优势，为广东乃至全国乡村振兴而贡献力量。



预调查小队与基层工作人员合影

中心动态

零突破！社会调查中心“电子问卷生成方法”获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近日，由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自主研发的“一种电子问卷的生成方法”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该专利是调查中心取得的首个专利，对于计算机辅助社会调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据负责人介绍，这项发明主要依托一门电子问卷编程语言 IQL。在这门编程语言的支持下，调查从业者可以高效便捷地实现纸质问卷到电子问卷的转化。IQL 可以满足近 30 种题型编写和更为复杂的逻辑校验等需求，且操作学习门槛低，易调试预览，有效解决过往社会调查问卷系统中存在的题型单一、灵活性低、逻辑功能弱、编辑成本高等问题，实现技术赋能业务提升。

未来，调查中心团队将会推动专利发明落地使用，坚持创新驱动，发挥丰富调查经验优势，探索高价值技术支撑高质量调查路径，为我国社会调查长足发展汇聚坚实力量。

调查中心督导受邀作为中学研学导师，
科普社会调查知识

3月31日，在“览暨南创新魂，筑少年强国梦”暨南大学附属中学高校研学活动中，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督导慕容英奇与骆毓菁受邀作为研学导师，为暨大附中研学营的15位学生科普社会调查基础知识，带领这批青年学生走进“调查现场”，了解科研和民生实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成兴、办公室主任彭梅蕾、指导员余璐尧及附中研学营1营辅导员罗燕萍参加了本次研学讲座。

讲座上，成书记在致辞中介绍、阐述了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寄语附中学生把握机会，在此次研学活动中丰富自身知识储备，拓宽认知视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成长奋斗。

知识科普环节中，骆毓菁对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背景和发展历程作简要介绍，并通过项目形象“小村村”和手绘地图等形式多样的调查记录展示了进行农村绘图抽样的设计和实际过程。慕容英奇则基于2020广东千村调查的执行经历，分享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大学生在广东农村入户调查的经验。

调查组织安排、调查场景回放、乡村见闻趣谈……同学们在两位老师生动的案例分析中感受到社会调查的魅力，在老师对农村人文风情的描述中认识到乡村之广大，在互动学习中明白了统计与调查数据的实际效用，讲座气氛活跃。



骆毓菁与学生互动



慕容英奇分享调查经验

讲座最后，彭梅蕾和罗燕萍作研学小结。两位老师表示本次讲座知识点特别且有趣，同学们有了不一样的学习体验，之后要多多思考，消化回味本次讲座的内容。



彭梅蕾总结讲座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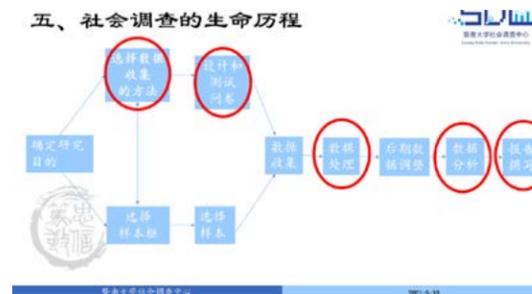
就在珠江经济俱乐部，社会调查中心教你如何用 问卷调查采集高质量数据

5月8日下午，社会调查中心质控部主管肖和担任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珠江经济学俱乐部活动第14期主讲人，以“如何用问卷调查采集高质量数据”为主题作讲座分享。

本次活动以线上会议形式进行，旨在向学生展示如何科学设计与开展社会调查项目，并从调查设计、问卷设计、数据采集、质量控制、数据分析以及报告撰写等方面剖析社会调查常见的误区，实现科学收集数据、高效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来自各个学校的、对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感兴趣的同学们参与其中。



肖和从最基础的“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讲起，为同学们介绍了社会研究的几种具体方式并引入到调查研究当中，厘清概念，筑牢基底。随后以“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为实例，介绍了在实际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以及对应实施的质控手段。



一个完整的调查包括很多个阶段，若要实现高质量数据的采集，就需要在每个阶段进行干预。肖和老师按照调查设计流程，从调查方法的选择讲到问卷设计的操作过程，向同学们阐释了在不同阶段为保证数据质量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无论研究过程如何，最终的结果都将以研究报告的结果呈现。肖和老师向同学们强调了优质研究报告的重要性，并以多篇经典学术论文为例，详细说明了研究报告的常见结构，分析如何从研究问题的性质和背景、文献综述、研究简介、研究方法、结果陈述与讨论等方面准确、清楚和有效地呈现自己的调查研究，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广东千村调查



讲座最后，肖和还向同学们介绍了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导的“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从2018年起，至2020年，这一项目已经走过三个年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有卓越技巧的访员和核查员群体，研究报告已集结成册。2021年，这一项目将继续前行，以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乡村土地。肖和以此为契机，倡议更多对社会调查满怀热情的同学加入。

对外交流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一行前往从化开展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调研

为了解当前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4月9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前往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民政办进行调研。随同的调研人员包括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薛森、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唐高洁、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以及研究助理余家庆。调研团队与鳌头镇负责民政事务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会，并实地走访当地部分低保户。

在座谈交流的过程中，调研团队重点询问了当地农村低保工作开展的政策依据、保障群体基本情况以及基层低保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的重点难点。调研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地运作的过程中存在部分痛点难点，例如经济核查难以全面、家庭成员数不易认定等等。

每月1087元。与2020年相比，2021年广东以3.5%增幅提高四类地区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和补差水平最低标准，并保持在全国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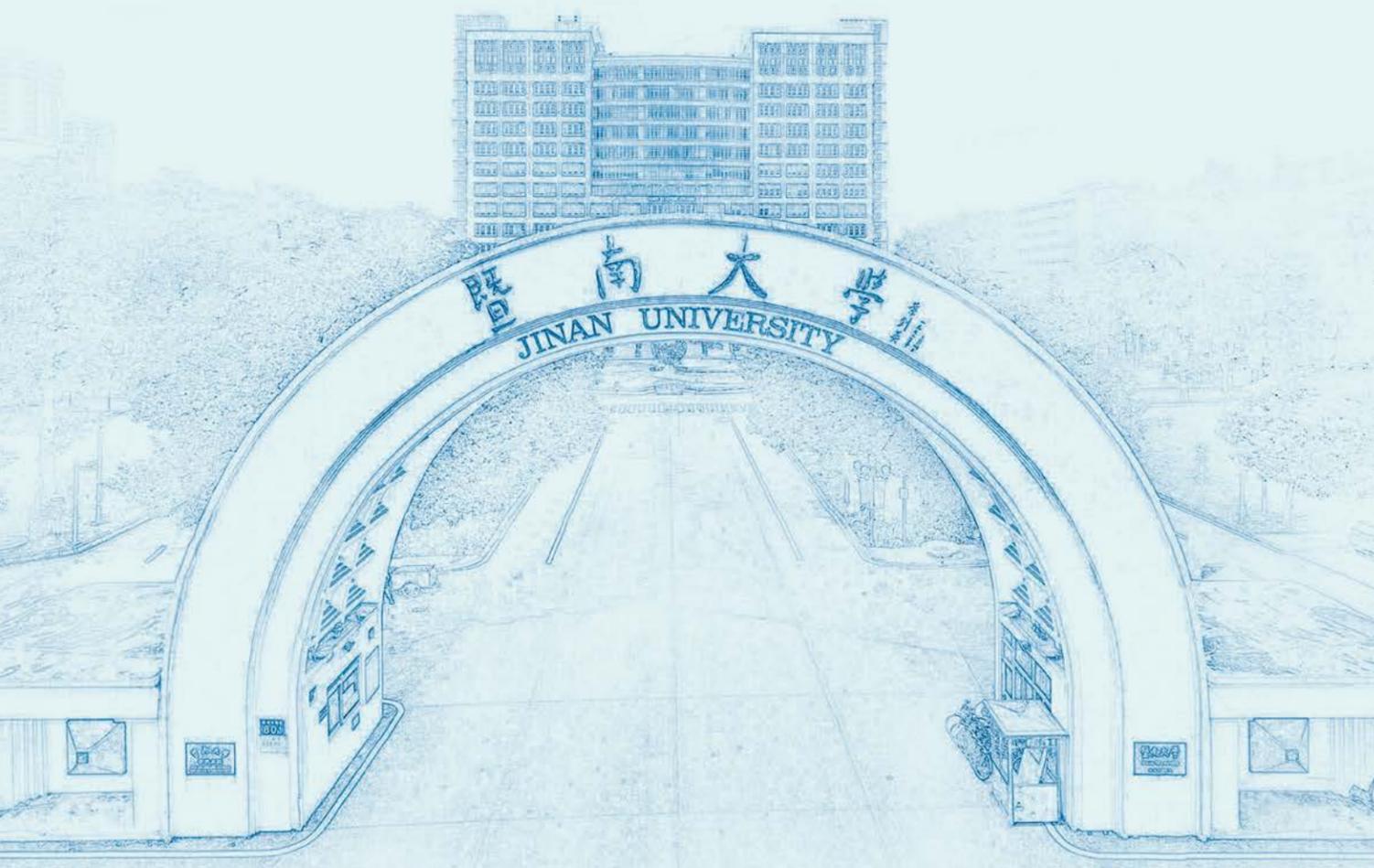
调研团队与低保户进行交流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有效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作为致力于提供乡村振兴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的乡村振兴智库平台，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将进一步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围绕“三农”工作的一线需求，组建高水平研究与调查队伍，努力建成有国际影响、全国领先、广东一流的专业智库，担负乡村振兴的时代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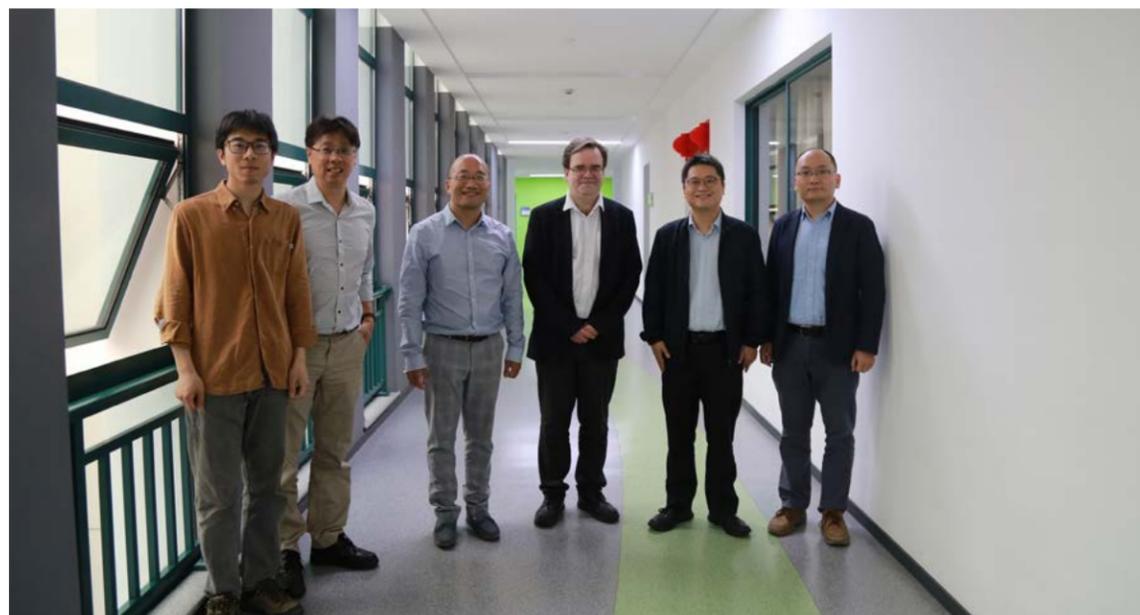


调研团队与镇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

在镇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调研团队还对当地部分低保户进行了实地走访，重点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保障现状与需求。据悉，广东省民政厅于近日印发了《2021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提高了2021年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其中广州地区城乡低保标准每人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 赴宁波诺丁汉大学访问



4月23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副院长卢晶亮一行赴宁波诺丁汉大学访问交流，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Gary Rawnsley，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主任 Simon Appleton，全球经济政策中心副主任周明海，研究生科研主任 Chew Lian Chua，助理教授钱学文对冯帅章院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双方就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引进、海外学习、升学就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交流过后，冯帅章院长开展了以“市场化改革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为题的主题讲座，他结合新冠疫情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中

国劳动力市场变革，讲座包括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变化、政策建议三部分内容。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赴中国人民大学访问



5月1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副院长史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承政、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薛森、办公室主任张晓、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系主任赵永亮、经济学系副主任杨本建等一行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访问交流。

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副院长谢富胜、数量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韩松及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王孝松热烈欢迎冯帅章院长一行，双方就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仇焕广，副院长郑适、毛雪峰、钟真与冯帅章院长一行就“乡村振兴”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交流过后，冯帅章院长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开展以“乡村振兴的广东实践”为题的主题讲座，详细介绍了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广东千村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介绍了“农民收入与产业振兴”和“人居环境与生态振兴”两个专题调查发现。



人物专访

IESR 专访

汇磅礴力量，展振兴旗帜 ——专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为更好地服务广东乡村振兴工作，助力广东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在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日前正式成立。成立前期研究院做了哪些准备？研究院的品牌项目“广东千村调查”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开展？乡村振兴研究院如何在众多同类研究机构中脱颖而出？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期从更深层次、更多角度了解乡村振兴研究院。

乡村振兴，暨南人使命必达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是中国扶贫工作的收官之年。从预备期进入攻坚期，新一轮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亮相，这意味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排在前列的大省，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其亟待解决的问题。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冯帅章介绍道乡村振兴研究院的成立缘起已久。早在2018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就发起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项目由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三年来，通过实地考察和严谨的数据积累，业已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

冯帅章认为，暨南大学作为教育部、中央统战部、广东省三方共建高校，根植于广东。服务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暨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暨南大学积极通过“广东千村调查”等形式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方面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工作。党委书记林如鹏、校长宋献中、副校长王兵还带队专程到广东省省委向主管“三农”工



南粤大地上的抹炊烟

作的叶贞琴常委作汇报,详细阐述了项目的前期工作以及日后的工作计划。叶贞琴常委充分肯定暨南大学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和热情,高度赞赏暨南大学在“三农”研究领域前期取得的成果,热情鼓励暨南大学要为广东的乡村振兴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应运而生。

立足广东,数据量乡村发展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排在前列的大省,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非常明显。冯帅章坦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乡村发展有着必然联系:“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中提到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就广东地区来说,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明显不均衡;再者,‘不充分’也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上。乡村的发展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广东城乡间,区域间的差距较大,这就使得广东的乡村振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具有典型意义。”

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启动,至今已开展了3年。该调查成为了乡村振兴研究院成立的重要基础。项目自筹备期就得到了广东省政府特别是广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三年时间里,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在研究团队、调查设计、项目执行等各个方面不断成长。通过艰苦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积累了大量在广东地区进行调查的经验,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师生合照

据冯帅章介绍,“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调查员通过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进行招募。从2018年到2020年,项目越做越好,在学生群体中“口耳相传”,影响力不断扩大,许多暨大甚至广东之外的高校学生也慕名而来。在良好口碑的引领下,项目汇聚了一批对社会实践充满激情的大学生。

除了完成正常的调查工作,项目访问队员还自发采取行动,回馈乡村。他们有的向农户家庭宣讲政府在社保医保方面的优惠政策,有的在访问途中救助村民并及时送医,有的主动帮助患有慢性病的受访户购买特殊的药物,有的还针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筹措资金进行支持。在访问过程中,大学生们了解了乡村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



广东千村调查访问员帮助农户晒花生

“所谓行胜于言,千村调查给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实践的机会,这就是大家非常踊跃地参与项目的原因。在冯帅章看来,访问员是千村调查最大的亮点。他们在调查中习得技能,开拓视野,深入乡村,了解国情,这正是所说的”项目意义“之一。访问员的旅程和汗水,都记录在了《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实录》里面,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千村人砥砺前行,不断奋进。”

同时,3年的调查项目也已经产出了诸多成果。其中包括2018-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研究报告,近20篇政策简报,10余篇媒体报道,很多调查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更多的学术研究也正在之中。

“千村调查已经成为了一项兼具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特色社会调查项目。”冯帅章称。



广东千村调查部分成果一览

汇聚资源,创一流特色智库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自身特色显著,最首要的便是大型的数据调查。研究院依托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该机构是目前国内高校少有的几家大型调查机构之一。“社会调查中心的架构非常完整,有能力完成各种调查研究需求,并且拥有自主研发软件,包括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电访系统(CATI)、混合调查系统和IQL问卷平台。”冯帅章说。调查中心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调查队伍,经过三年积累,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广东乡村调查经验。



中心自主研发流向计算机软件所获著作权登记证书

研究院的支撑还来自于暨南大学相关方向的科研力量。智库与科研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始有暨南,便有商科”,经济类学科是暨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根据国内外最新的经济学科排名,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排名为十二至十四名左右,居广东高校首位。冯帅章自信地表示,“我们有大量学者从事乡村振兴相关研究,包括金融扶贫、农村经济、生态环境、人口流动、收入分配以及农村教育问题等等,基本可以覆盖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研究院是在广东省省委的支持下成立。“平台起点高,支撑力量强,能够直接对接政府需求,且研究院直属学校挂靠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管理和用人上拥有极强的自主权,这也是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优势之一。”冯帅章对乡村振兴研究院的潜力表示非常期待。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唐高洁(后
排右三)与千村访问员一同到乡村做调查

在访谈中,冯帅章表示,未来研究院要走的路也很明确。其一是要继续坚持做好“广东千村调查”。“千村调查是基础,也是初心,2021年我们将开展第四轮调查。同时我们要从数据当中挖掘更多信息,我们不只是积累数据,更要用好数据。”冯帅章说。其二是要对接广东省委省政府,为政策需求提供精准服务。“研究人员与政府直接对接,深入了解当前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点、痛点和需求后,将以深度研究报告、简报等形式,及时、高效地实现政策服务”。其三则是要搭建起一个高端智力平台。“我们邀请了十余位国内致力于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研究的一流专家组成了咨询委员会。”冯帅章称,预计自今年起,研究院将定期举办高端论坛,集思广益,为广东的乡村振兴服务。

“我们要最大化彰显自身特色、脚踏实地,争做全国一流的乡村振兴研究机构提供最好的政策咨询服务。”冯帅章信心满满。

谈到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冯帅章认为,乡村振兴并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要保留乡村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乡村的发展潜力,在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入手,在实现收入增长的同时改善村居环境,让乡村成为当地人的宜居家园和身份标识,这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

冯帅章表示,乡村振兴最终还必须要体现在人的振兴上。“人是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的观念也必须落实到乡村振兴上。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乡村振兴解决不同年龄层次人口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老年人,要解决好他们的养老问题,要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让留在乡村的老人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对于中青年劳动力人口,要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就业和事业发展的机会。“只有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了,才能对乡村有归属感,乡村才能真正振兴。”

冯帅章：到暨大经济学创新班，与诺奖大师面对面

近日,软科正式发布了“2021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国大陆共有49所高校经济学学科入榜。暨南大学经济学学科世界排名第151-200位,中国内地并列第8位(第8-11位),广东省排名第1位。

近年来,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逐年攀升,自2019年中国大陆高校并列第16位提升至2021年并列第8位,呈现出强劲上升势头。

作为暨南大学为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近年已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国际高水平论文的质量与数量实现“双提升”成为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腾飞的重要推动力,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自此进入国际化发展快车道。

研究院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以下称创新班)凭借国际化培养模式、全英教学、本科导师制、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等教学特色备受学子及家长肯定。2020年,该专业首届20名毕业生中有19名斩获海内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其中两名已直接前往世界名校攻

读博士学位,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近日,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对创新班专业亮点,报考要求,毕业生发展前景等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培养有志改变世界的人才

// 创新班和其他经济学专业相比,有什么亮点?

冯帅章:我们可以用“放眼国际、立足本土”来概括创新班的培养特色。一方面,创新班参照的是国际一流经济系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设立的,无论是课程设置、师资配备还是科研环境都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色,我们采取全英教学模式,推行小班教学,师生比达约1:1,本科阶段全部实行专业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开始自己的科研探索。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立足中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为此,研究院下设的社会调查中心为创新班的学生们提供了专业平台,让

学生有机会直接参与大型社会调查,接触微观数据收集,加深对中国现实的理解。

我们这种精耕细作的培养模式在首届毕业生上已经证实了可行性和良好的成效,去年毕业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100%,19人选择继续前往芝加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深造,这是令人瞩目的成绩。



// 创新班是小班教学,名额十分有限。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就读创新班?

冯帅章: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是有志去改变世界的人才,那些有着远大的理想和长远的目标、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会更适合创新班的培养模式。

学术研究需要学生本身有着强烈的学习驱动力,去主动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都在说“内卷”,其实内卷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外界那些比较功利的评价指标当成了自己的追求目标,而忽视了自己的兴趣,这样很容易在遭遇压力的时候放弃。只有自己有强烈的内驱力,才能有更强的抗压力。

当然,学生的英语和数学基础也很重要,基础好一些的学生相对能够更好地适应全英教学模式和经济学的系统训练。

// 如果学生对经济学有兴趣,应该怎么去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冯帅章:我们常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关注的是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像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等这些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因此我认为,作为高中生,在学习成绩之外,可以尽早去了解社会、关注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比如乡村振兴、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在有些学生一味应付考试、只看重分数,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学习。

但其实,只有关注了现实世界之后,才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去寻找答案的动力,这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经济学,如果学生对某一领域很有感觉,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 这个领域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冯帅章:创新班想要培养的是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熟悉现实国情,能够掌握经济学系统知识、并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

我们的培养模式会让学生更偏重科研,比如首届本科毕业生韩亚婕和鄢瑜就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当然,我们更希望学生能够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成为对人生有追求的人。他们未来的方向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选择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继续深造,也可以到政府机关、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单位从事专业工作,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是一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请国际知名学者面对面指导论文

// 您曾经提到,想要做出一流的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创新班的学生在这方面享有哪些优势?

冯帅章:创新班为学生营造的学术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要数我们的一线教师,他们是学生进入学术殿堂的领路人。研究院超过90%的全职教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海外名校,他们带给学生的不仅是前沿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更有鲜活的应用,他们讲授的课程内容经常从校园教室里延伸出来,走到生活实际里。

比如教计算机编程的严子中老师,他在课余时间把学生组织起来,一起使用计量经济学的软件编写了目前网上缺失的两个编程软件包,目前两个软件包分别收录在Python Package Index (PyPI) 与 Statistical Software Components 中,用户可以在Python或Stata软件界面中直接下载使用。

其次,研究院与多所海外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会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暑期课程等,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

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线上学术活动也从未中断。研究院成立至今的5年时间里,已经有200多所顶尖高校的800余名学者前来交流,全球前50名的高校的教授都曾来访过。通过聆听来自全球各地顶尖学者的学术报告,学生的视野能够变得非常广阔。

最后,创新班的学生还有一项福利是与诺奖大师面对面交流,甚至为诺奖大师做研究助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James J. Heckman教授是研究院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多次来访暨大,除了举办公开讲座外,还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点评学生的论文,我们有一位学生吕佳玮曾经到芝加哥大学参与到Heckman教授的研究中。

Heckman教授与我们还有一项在四川开展的长期追踪的项目,关注的是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至今已经连续追踪了4年,我们的很多学生也都参与了该项目中。

// 这些世界级的大师,会对学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冯帅章:大师的影响肯定是全面而深远的,不只是对于学生,我本人也非常珍惜与Heckman教授交流的机会,这不仅是一种对前辈的敬仰,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研究院每年都会与芝加哥大学举办“社会不平等”暑期课程合作项目,芝加哥大学和美国其他高校的教授会前来暨大授课。学生们会在教授们面前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请教授点评和指导。在课堂之外,学生们有很多跟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想这种机会本身就会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动力,不再将科研当成一件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事情。

我们还曾经邀请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Joshua Angrist教授前来授课,Angrist教授非常著名,被中国经济学界的粉丝们尊称为“安神”,他的著作《功夫计量经济学》基本人手必备。

他来暨大授课之后还特地在推特上感慨暨南大学的学生们特别热情,彼此之间的问答很多。我想参与课程的学生所收获到的肯定不止课程的内容那么简单。

// 除了学术研究,经济学在乡村振兴等政策研究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冯帅章: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研究院非常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强调“接地气”,我们今年也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这都得益于研究院在过去几年里深耕乡村振兴领域的努力,社会调查中心收集一手数据,政策研究中心基于数据开展实证研究,这为广东省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扎实的政策咨询意见。

其中2018年启动的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是全广东大规模的调研活动,覆盖整个广东农村地区,现已连续开展三年。

这个项目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我们的很多学生都曾参与到实地调研工作中,有些学生甚至参加了不止一次,这个经历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他们能够从中真正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更能够深刻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使命所在。

国华杰出学者冯帅章: 探求经世济民学问的劳动经济学家

为推动暨南大学人才培养,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向暨南大学捐赠300万元设立暨南大学“国华杰出学者基金”,用于奖励暨南大学在学术科研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学者及管理专家。

经“国华杰出学者”项目管理委员会评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被评为2020年暨南大学国华杰出学者。暨南大学校友会特推出专访文章,展示冯帅章院长先进事迹和学术风采,以下为专访原文。

01 经世济民的劳动经济学家 积极为就业民生问题献计献策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双重影响下,应届毕业生就业面临巨大挑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而因疫情影响,39.29%的企业缩减了校招岗位,毕业生面临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这无疑加重了应届毕业生的焦虑。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此时,深耕劳动经济学领域二十余年的冯帅章教授进入公众视野,他受邀接受《广州日报》、《财经》杂志、搜狐智库等多家媒体专访,以专家身份为政府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为后疫情时代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打下了一剂强心针。

“为充分应对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需要同时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可达到与其他刺激计划类似的效果,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长期来看,则将会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能从另一角度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他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收益时间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应对新冠疫情



这只“黑天鹅”的好方法,又能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的“灰犀牛”。针对弱势群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还能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冯帅章表示,为国家和广东省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库服务,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学者的责任。

近期在就业民生问题上屡屡发声引发关注的冯帅章,是我校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劳动经济学领域长达二十余年。他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及康乃尔大学获经济学双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从奥巴马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lan Krueger教授与特朗普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Richard Burkhauser等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大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教授保持长期合作往来关系。

“有所发现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冯帅章说到劳动经济学研究有点兴奋,“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时刻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现象,需要我们识别擅长的领域,专注其中,并做出应有的贡献。”就像做数学题一般,解决了问题的满足感与乐趣激励着他不断前进。

冯帅章教授的科研成果不仅非常高产,并且在质量及影响力方面也非常突出,他已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共发表或接受发表英文论文30余篇,其中1篇论文被经济学领域世界最顶级的、影响最大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接受发表,2篇论文发表于与Science、Nature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

在坚持做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研究的同时,冯帅章教授也非常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回国后,他已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中文论文多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其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束后被评估为优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02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贡献” 关注特殊群体 对接国家政策服务

2000年以后,随着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剧,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亟需的劳动力素质和质量。然而在当时的国内经济学界,关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还比较少。

“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校人员的配合。流动儿童研究在当时还算是块处女地,少有经济学家深耕,所以极度缺乏数据。”

很多学者认为,无论是外来儿童教育的研究还是为改善其境况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付出远大于回报的。即便如此,冯帅章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长时间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教育跟踪研究。

2016年,他的研究团队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James J. Heckman合作,在四川绵竹市开展长期性、常态化的科研项目——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该项目2017年已经完成基线数据的收集,每年追踪一次,学生样本量近6000人。

2017年5月,这部历时8年,跟踪调研近3000名在沪就读的流动儿童,并开展实证计量分析和多学科理论研究的成果《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付梓发行,引起社会针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广泛的关注。

“通过研究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基于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既是学者的责任,也给我们很大的价值感。”

此外,在研究的基础上,他在《财经》杂志中撰写了《重视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控人是误入歧途》等文章,呼吁政府及社会关注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冯帅章用切实的行动,为社会问题提供研究数据及政策建议,不断推动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改善。

除敏锐地考察特殊群体的问题外,在支持国家和广东省政策服务方面,冯帅章也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已经连续3年带领团队发起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并取得了多项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的成果。2021年,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成立,担任研究院院长的冯帅章,将进一步投身于乡村振兴方面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工作。

“我们要最大化彰显自身特色、脚踏实地,争做全国一流的乡村振兴研究机构,提供最好的政策咨询服务。”

“广东千村调查”历时3年,产出了诸多成果,其中包括2018-2020年广东千村调查研究报告,近20篇政策简报,10余篇媒体报道,很多调查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

03接轨于国际,创新于本土 IESR已成国内一流应用经济学智库

为了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我校成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2015年12月2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场重要的揭牌暨敦聘仪式。冯帅章庄重地从胡军校长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从2015年建院至今,短短五年间,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成为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腾飞的重要推动力。根据“2021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2020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2020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暨南大学经济学学科均位列广东省第一。

截止目前,研究院全职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已被正式接受发表论文达122篇,出版专著2部,全职教师人均发表篇次3.05。其中SSCI 104篇,SCI 16篇,CSSCI 11篇,国际论文发表占比高达90%。

此外,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申报上也已有所斩获,研究院获得立项纵向科研项目5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7项,省部级项目14项,厅局级项目4项,校级项目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6项,教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研率达65%。获批纵向项目经费1035万,教师人均纵向科研经费25.85万。

这一系列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冯帅章在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冯帅章积极探索人事机制体制改革创新,并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特聘教授等方式柔性引入海外高端智力资源。5年之间,研究院已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境外著名高校引进了36名优秀海归博士,境外优秀人才比例高达90%。

冯帅章带领下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了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2019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现场大家云集,群星荟萃,其中不乏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riel Pakes、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Whitney Newey等学界重量级专家。

仅仅五年时间,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已初露锋芒,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遐迩闻名、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术中心、数据调查中心及知名智库,为暨南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贡献一份力量。

04首度开创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 培养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高素质人才

除了在学科建设有所建树,冯帅章在学生培养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担任院长以来,他首度开创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潜质的高素质人才,将经济类学科这块“金字招牌”打造得更加国际化。

“我们可以用“放眼国际、立足本土”来概括创新班的培养特色。”冯帅章细说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的亮点:

1. 北美一流经济系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院借鉴国际一流经济学教育模式,实行全英文教学、本科导师制、小班精英化培养,师生比达约1:1,鼓励学生尽早开始自己的科研探索。

2. 为学生创造调研实践的机会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立足中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为此,研究院下设的社会调查中心为创新班的学生们提供了专业平台,让学生有机会直接参与大型社会调查,接触微观数据收集,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创新班参考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经济学培养方案构建课程,难度和挑战性可想而知。但是课程难度的拔高和学术成果的高标准要求,不仅没有使学生们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许多受访学生都曾异口同声地说道:“尽管加入创新班意味着更大的学习难度和压力,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的绩点,但是却大有收获。”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需要学生现阶段打下非常好的学术基础,而学术基础并不限于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

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这种精耕细作的培养模式,在首届毕业生上已经证实了可行性和良好的成效。首届本科毕业生实现100%就业,其中95%选择继续升学深造,70%拿到境外知名高校录取通知书,其中不乏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成绩非常亮眼。

作为国华杰出学者的获得者,冯帅章表示他非常感恩学校和基金会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他表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关注的是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问题,最终要回归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这个初心上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关注社会价值,推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学生天地

学子风采

设定目标，拆解它，实现它 ——访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经济学全奖博士 offer 获得者吴凯



人物名片

吴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2018级硕士生。2021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学全奖 offer。研究生期间，曾获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并参与多个科研项目。

命运的罗盘将我引向经济学

吴凯在本科时期、研究生时期所修读的都是经济学，但他与经济学的缘分却要从高中说起。偶然的一次机会，吴凯出于好奇去做了一次文理分科测试，偏好结果显示，他适合学习经济学。那时候，他对于经济学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主要研究什么还一无所知，于是便去看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经济学还挺有意思的，高考之后填志愿就没有犹豫地选择了这一学科。”漫长的经济学研习征程便由此开始。

本科与研究生时期的经济学学习差别很大，“我那時候是在经济学基地班，所学习的内容比较偏向于理论方面，像政治经济学这些”，而研究生时期则更多的是

用数据去证明问题，也就是实证研究，这样的内容和方式也让吴凯感知到了经济学的更多可能和趣味性。

不过进行实证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吴凯坦言，因为过去一直接触的是理论知识，直到大四，他对研究所需的数据分析软件应用、编程等都一无所知。从大四起，他开始有意识地去参加一些针对性学习，读研之后也进行了一些助研工作，一边做，一边学，知识和经验慢慢累积起来，才走到现在。“学院非常贴心地在研一时期开设了计量软件课，这为我打开了系统学习的大门，也调动起了我的积极性。”

经济学的学科范畴囊括众多，目前，吴凯更倾向于去做应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环境政策、经济地理、发展和贸易方面的复杂问题。频繁的雾霾天气、快速的城市扩张、电子商务的兴起等现象在改变吴凯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触发了他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激情，这种兴趣也在研究中不断攀升。

IESR是选择，亦是预设脚本

人生的转折和选择往往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发生。

吴凯与 IESR 的故事就是如此戏剧性。最初，吴凯得知自己的一位学姐参加了暨南大学的夏令营，自己便也在网上进行搜索“暨南大学经济学”，很巧合的是，刚好点进去就是 IESR 夏令营的报名系统，于是吴凯就顺手填了自己的信息。来到夏令营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我印象特别深刻，刚来的晚上，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见面，每一位老师都认真细致地做了自我介绍。”吴凯说，当时自己特别惊讶，就感觉这里的师生相处方式和老师的性格都很不一般，“整个夏令营的气氛特别好，这里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平等而融洽，这是我的第一感受。”

说起 IESR，吴凯的语气中是满满的肯定。“没有 IESR，我没有办法取得现在的成就。”学院针对研究的需要所设置的课程、各种前沿讲座和项目、与学界有所建树的学者交流合作的机会，这些都是 IESR 提供的支

撑力。“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我的导师谷一桢老师的指导，可以说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吴凯说，谷一桢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整体观和全局观的人，一直以来，对他的学业都十分关注，经常在一些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意见，使得他少走了很多弯路，这在吴凯的选择和前行之路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吴凯告诉笔者，他还想特别感谢学院的行政老师，“他们在幕后为我们处理好了一切问题，这样就无需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之外的琐事上分心。”专注于学生成长，专注于研究环境的构建，这是整个学院勠力同心，一直坚持在做的事。

硕士期间，吴凯参与了许多科研项目，如农村散煤治理、地铁和道路拥堵、电子商务和经济增长等，他负责的环节包括诸如数据收集和清理，实证分析和结果的可视化。在这些经历中，他对大数据的使用印象深刻，“新的高质量的数据有助于提供更准确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帮助在研究中发现新的视角”。不断的探索、反复的深入，一心扑在研究上的坚持和笃定，让吴凯对于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掌握越来越扎实，对整个经济学领域的认知也愈发开阔。

三年的研究生涯带给吴凯的，并非只有研究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增长，他直言，最重要的，还是“眼界”。“视野拓宽了，这是我最大的改变。”本科时期的吴凯对于“研究”这个概念的认知还停留在发一个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就是一种成功上，但是来到 IESR 之后，他发现，不仅经济学是多元的，研究和交流的方式也是多元的，重要的是，要保持国际化的视野，努力去了解世界前沿的研究都在做些什么。现在的他，充分认识到了，所谓的学习也好，做研究也好，都应当是有明确目标的，这个目标并不是说要发表一篇文章，而是要去提出并解决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然后以此为旗帜，朝着这个目标进发，将它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继而不断摸索去攻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研究与授业并重，是我的理想状态

攻读博士是吴凯在前行道路上设定的目标之一。“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申请上不占优势，所以准备的过程还是挺漫长的。”

吴凯对于自己的经历非常坦诚。他在研究生时期做了很多的助研项目，包括给院里的老师或者自己的导师做助研，在他们身边进行学习同时也锻炼自己的能力，后期也参与到国外老师们的研究项目中，除了获得推荐信之外，也借此锻炼自己的英语语言能力。“因为我的英语一开始并不算好，但是申请国外的博士语言条件是必需的，所以我在这也花费了不少工夫。”吴凯不好意思地笑笑。正是这种清楚的自我认知，让吴凯能够理性分析自己的短板，然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及平台资源去把它补足，才有了现在的好结果。现在，吴凯已经获得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学全奖博士 offer。

对于自己的未来，吴凯有着无限期待，“我想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既做研究，也教书育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个想法与吴凯的研究生生活密切相关。因为自己对专业知识以及数据分析的掌握还不错，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来与吴凯交流，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吴凯渐渐发现，能够将自己大脑中的知识传输给他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这既是对自己能力的巩固也是一种知识的有机传递。在与自己的导师进行沟通时，吴凯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作为老师能与学生进行良性互动，从而传道授业，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向前走，视野一定会更加开阔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offer 获得者张淑婷

人物名片

张淑婷，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2018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城市经济学。2021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曼海姆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录取资格。研究生期间，曾获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



从一知半解到抓住兴趣

本科时期，张淑婷对于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的认知，抱着简单的“大热专业”“好找工作”的想法进了大学。因为在基地班学习的内容更偏理论化，加之最初的“高中生心态”，她对经济学并不感冒。偶然的一次机会，张淑婷接触到了一些课程之外的经济学研究著作和资料，这些新鲜的内容吸引她去阅读探究，这个过程为张淑婷打开了新的大门，也扭转了她的固有观念。“原来经济学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枯燥，也并没有浮于表面，而是很扎实的、有依据的。”回想起自己当初的懵懂，淑婷笑着说。

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女孩儿，淑婷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切的关注。“每到冬天，雾霾就会非常严重，这已经是常态了。”刚到广州时，淑婷本以为能看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南方美景，但实际上南方的空气也并没有满足她的想象。由此，她联想到，这可能与工业区污染有关。出于对环境的关注，张淑婷了解到，“过去我一直觉得个人和企业带来的各种污染虽然严重，但一般是行政处罚。但随着深入了解，发现环境污染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层面，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这个出乎意料地发现驱使她开始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



张淑婷与同学在白云山

从一个想法到一个项目

一个想法从在大脑中迸发到落地需要经历一个困难重重的复杂过程。

“那时候几乎是每周都要跟老师们聊很久很久，是薄诗雨老师和朱宏佳老师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思考路线和研究方向。”

薄诗雨老师是张淑婷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当时面试她的老师。“我们当时聊了两个多小时。”提起当时的经历，淑婷记忆犹新。对于张淑婷来说，这位导师不仅仅是指导者，更是她研究之路上的引路人。淑婷所在的师门并没有定期例会，但与薄老师的联系却从未断过，平时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或者产生新的想法，都可以随时与老师沟通。另外，因为她在研究生时期有了一个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导师便向淑婷介绍了学院的朱宏佳老师，这才有了之后对“电力短缺和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

研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新项目推进过程中，面对着数据样本过大、对研究地域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等种种问题，张淑婷也曾一筹莫展，兀自烦恼。提到这一项目，她感慨万分，“老师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因为项目落脚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网络上能够找到的资料十分有限，老师们常常同淑婷分享自己的见闻以拓宽思路，同时还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指导她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张淑婷收获颇丰。“还是挺棘手的，不过攻克这些难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为了使数据处理更有效，每一步都更可靠，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学习了 Python 和 ArcGIS，最终使工作得以圆满完成。除此之外，这些经历也使得她适应了高效的工作方式和高强度的研究压力，从而为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

打开视野，是前行路上的重要议题

成长的过程中，值得感谢的除了诲人不倦的导师，还有关怀备至的行政老师们。“毫不夸张地说，在 IESR 我真切感受到了做学生的快乐。”张淑婷告诉笔者，学院的行政老师非常认真负责，不但会帮助学生筛选真正值得参加的活动和项目，也在用心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唐飞燕老师和黎莉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因为有了这样的背后支撑，张淑婷在 IESR 的日子里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去做自己的研究，合理支配自己的时间。

“IESR 对我来说像一扇窗，三年的经历告诉我，这个选择没错。”前行的路上，有了良好的平台和丰富的专业信息会事半功倍。张淑婷说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IESR 就为她带来了许多新鲜感受，亲和的老师、融洽的氛围、专业的知识以及多样的项目和交流机会，这些像是学术之旅上的一条牵引绳，将淑婷带到想要到达的地方。

当然，所有的成果都离不开背后脚踏实地的付出。张淑婷早在今年一月份就收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全奖博士的 offer。对她来说，攻读博士是心中早已埋下的种子。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早在研究生入学之初，

她就在做准备了。“也不是说想要在学界取得什么成就，只是想拓宽自己的视野。”谈起这一目标的初衷，淑婷非常坦诚。博士期间，她将参与家庭金融相关的研究项目，这一方向更偏向于金融学。在淑婷看来，这一方向很符合她的个人预期，“研究的问题比较实际，并且能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对于未来，她非常洒脱，“我目前的想法是期待能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把自己多年来所学的知识用到实处，也能在培养新的经济学人才中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正是淑婷的目标。

做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事情 —— 访莱斯大学 经济学全奖博士 offer 获得者于培

人物名片

于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2018 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网络经济学。2021 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全奖博士项目录取资格。研究生期间，曾获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抓住兴趣点，不断深入

于培本科时期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所学的是国际商务专业。读大二时，于培参加了一次学术竞赛，在专业老师吴钢教授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

中的作用”的项目研究。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经济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也激发了她对应用定量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兴趣。“我觉得网络和经济的关系是很新颖的、很值得研究的。”来到 IESR 之后，于培发现，研究院院长于计量经济学的史炜老师和张毅老师对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有所研究，便决心抓住自己的兴趣，继续深入。

虽然早前已经做过相关项目,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与于培本科时期所接触的内容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最需要解决的便是数据分析与处理的问题。于培坦诚表示,自己的研究涉及到的数据体量比较大,刚接触经济学的自己有些难以应对。“但是一步步摸索走过来,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非常好。”研究院为筑牢学生的基础,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通过学习,于培掌握了软件的基本语法,后又在研究项目中尝试应用、调整,终于越来越熟练。

“IESR的氛围让我安心科研”

早在硕士研究生推免面试时,于培就感觉 IESR 是以学生发展为重的,因此来到了这里。读研三年,她对于 IESR 良好学术氛围的切身感受也越来越深。“我觉得,老师们就像我的指路人。”于培说,她所遇到的老师都非常关心学生的想法、尊重学生的选择,并且能力都非常突出,不仅在研究上敦促细节,也在人生规划上给出了宏观的指引。除此之外,她还特别提到了 IESR 的行政老师,“老师们改变了我对行政的印象,他们都太温暖了”,于培笑了笑,老师们平时很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状态,也会尽可能帮助同学们提供信息支持,为大家提供一个纯净的科研空间。

她特别提到了导师史炜老师,“能遇到史炜老师真的很幸运”。于培的语气中满是真诚。她告诉笔者,史炜老师是一位特别温柔、有耐心的师者,也是自己的“朋友”,自己在刚着手研究的时候常常“找不着北”,但史老师每次不管她提出的问题有多简单,都会耐心解答。“史炜老师是带我入门的人。”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给了我一些资料和文献让我研读,然后与他见面讨论,慢慢地,我这才从中摸索出了一些方法。

谈到史炜老师对自己最大的帮助,于培说,“他改变了我的处事方法。”史炜老师总是告诉她,做事情要懂得分轻重缓急,要有一个 List,才能在所有事情找上门的时候不慌不乱,一步一步完成。“感觉所有问题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特别让人安心。”

做更好的自己,向前走

广州的夏,一季换一季,于培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自信多了,这是我最明显的变化。”三年的时光如流水而过,于培对于自己所感兴趣的方向有了愈加深入的了解,“刚保研那会儿对所有事情都一知半解,讲话都没底气。”说到这里,于培笑了,“现在再去做报告、谈自己的论文感觉有底气了,也更熟练了。”做研究是功夫活,需要沉下心定住气,大多时间,于培都扑在研究上。学习之余,她特别喜欢去健身房,运动是她一直坚持的习惯,“通过运动,我瘦了 40 斤,变得更加自律,也因此找到了生活和学习的一种平衡方式。”

于培告诉笔者,从本科时期,自己就产生了要攻读博士的想法,“我本身的性格不太擅长社交,相对来说,做研究对我来说会更加轻松。”她很喜欢自己待着静下心来去思考的感觉,在探究一个问题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学到新的东西、看到新的成果,这个过程让她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目前,于培已经拿到了莱斯大学的全奖博士 offer,未来她也打算延续自己的兴趣,主攻网络与计量方面的学习。

未来,于培希望能够从事教职工作,一边走在自己所热爱的研究之路上,一边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感觉与学生交流是非常有意思、有成就感的事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访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全奖博士 offer 获得者丘卓瑜

人物名片

丘卓瑜,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2018 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2021 年,获得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等 12 所美国高校的博士录取资格。研究生期间,曾获暨南大学推免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选择经济学,选择 IESR,对我而言都如命运一般。”

丘卓瑜本科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最初入学时,她是在经济管理法律的实验班进行学习,所修习的更多是法律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她发现自己对于经济学的兴趣愈发浓厚,“这对我来说是机会,学习经济学知识的时候我总觉得充满挑战,这很有意思。”在丘卓瑜看来,用数理统计的方式去解释问题和社会现象,这种精神十分符合自己的取向,“用数据说话是更有力量的。”

在最初学习法律的时候,丘卓瑜就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如重男轻女等一些社会陋习。随着性别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女权主义思潮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涌现,丘卓瑜在观察这些现象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北京大学李力行教授所写的关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一篇文章,该文阐释了这样一个现象:生育男孩会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也会增加妇女的营养摄入,帮助妇女改善健康状况。这篇文章如一把钥匙,为丘卓瑜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意识到,原来这些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是有数据支撑的。这颠覆了丘卓瑜一直以来对经济学的想象,使她想要更加深入地探索。

一个偶然的契机,丘卓瑜从学姐口中了解到了 IESR 的硕士研究生夏令营项目。“当时觉得有口碑肯定不会错的。”谈起来到夏令营的原因,丘卓瑜笑着说。她告诉笔者,自来到夏令营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和预期。“这里的老师都学识渊博,并且在与老师们进行沟通时,他们总是特别细致、认真,整个项目的安排也很妥当。”IESR 轻松向学的氛围也深深吸引了她。项目一结束,她就决定了要加入 IESR,“对我来说,这就是命运般偶然,也是必然的选择。”

目标清晰,朝着心中的远方奔去

从一来到 IESR,丘卓瑜就树立了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目标,整个研究生生涯中的学习规划也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的。她说,自己求学的过程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因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那里,就像一杆旗,迷茫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并且,老师们都很负责,愿意真真正正地去帮助自己,所以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他们愿意去为学生的科研道路做一个职业规划,这一点特别好。”

丘卓瑜的研究生导师是杨哲，主要研究方向是家庭经济学。在采访过程中，丘卓瑜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敬佩。“导师对我整个学习生涯的帮助非常大”。每周，丘卓瑜都会与杨老师会面进行“研讨”，对上一周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老师总是十分有耐心地进行讲解，不厌其烦，每次研讨会都要持续一个多小时。

师者的帮助是锦上添花，能够助力目标最终达成的，是丘卓瑜重视过程、不言放弃的所有努力。丘卓瑜在同导师一起进行“美国婚姻税奖金和罚金对婚姻决策的影响”项目研究时，需要使用大量家户数据针对一个变量进行计算，由于面临着极大的分析计算量，整个过程花费了约3个月，面对枯燥、反复与迷茫，她一直没有放弃。在丘卓瑜的世界里，她在研究上所投入的时间与实际得到的产出成果相比是并不平衡的。研究生三年来，她的日常不过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循环往复。但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怎么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她在不断深入中了解了产出一篇论文需要的完整流程，也明确了怎么去用所得到的家庭调查数据去支撑自己的论文，“我觉得与结果相比，这份经历显得更加珍贵。”

谈及对应用分析软件及编码语言的学习，丘卓瑜直言自己现在也仍然奔走在路上。IESR 为学生们开设了计量软件的课程，丘卓瑜在这门课上学到了很多软件知识，同时也不断地尝试把这些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研究当中。她说，对于编程语言的学习是在项目实践中提升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像是一个助推器，会促使自己不断地去寻求解决办法，当攻克难关之后，新的知识也就收入囊中了。

三年努力聚沙成塔，终于在这个毕业季收获硕果。目前，丘卓瑜共获得了12所美国大学的博士录取资格，她最终选择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首先是因为加州大学的微观经济学专业实力过硬，自己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另外当地华人多、气候好，也比较适合生活。”



丘卓瑜参与麻省理工学院Joshua Angrist教授计量经济学课程

打开自我：要成长，也要生活

在读期间，丘卓瑜作为学生助理参加了很多学术研讨会，采访了哈佛大学 Edward Glaeser 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 Christiann Dustmann 教授等世界一流学者，这都印证了她良好扎实的英文水平和临场反应力。在丘卓瑜眼里，这对她来说都是很宝贵的经历，是 IESR 给予的机会也是对自己的挑战，能够有这样的平台与前辈们交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不仅能够从与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专业前沿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丘卓瑜一直以来对于采访和做记者的兴趣。这样更具专业性的交流，正是她想要的。

读研三年来，丘卓瑜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是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并且去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向他人求助，不断地提升，去补足它。“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丘卓瑜笑道，自己现在更愿意去打开自我，然后去跟他人交流，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在交流碰撞中总能获取成长的能量。

谈及此，丘卓瑜非常开心自己能够身在一个融洽和谐的班级氛围当中。“我们班的同学都互帮互助，这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大家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都会面临着相同的难关，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彼此的处境，然后会尽力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在空闲时间，她特别喜欢去跑步，因为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扑在研究上，工作、学习和生活三者已然融为一体，难以分出界限，所以跑步就成为了丘卓瑜的第一休闲选择。“校园环境很好，有规律性地跑步会让我变得开心起来。”

三年，丘卓瑜在暨南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每一天的经历叠加，构成了如今的她。她很感谢过去的每一

天，也很感谢在这里遇到的人。除了导师杨哲老师，她也十分感谢研究生阶段提供过指导和帮助的 IESR 各位老师，包括卢晶亮副院长、班主任史炜老师和陈祎老师。“没有他们的指导，我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谈及未来，丘卓瑜给自己的寄语是“勇敢前进，保持身材！”为了梦想奋斗的她，仍坚定前行在所热爱的路上。

Learning by doing, 勇敢踏出每一步 ——访芝加哥大学硕士 offer 获得者杨世宁

人物名片

杨世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2017 级本科生，目前已经收到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乔治城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硕士项目 offer。在校期间，曾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积极担任各种学术会议志愿者，是 IESR 志愿活动负责人之一。



在杨世宁的电脑里，有一个存放了40多篇文献综述的文件夹，这是她在大三下学期独立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研究时建立的。“在 IESR 可以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并且获得非常丰富的学术经历。”杨世宁谈及自己的大学生涯，认为自己收获颇丰，特别是在 IESR 中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以及老师们的倾心帮助，让她在申请季拥有许多优势。目前，她已经收到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乔治城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硕士项目 offer。

应对“卷”的方法，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就如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杨世宁也有过迷茫和瓶颈期。在大一时，杨世宁的专业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但是由于对物理和电路分析不感兴趣，专业课一度让她觉得痛苦和迷茫。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杨世宁参加了 IESR 的招生宣讲会，被 IESR 优秀的师资、高师生比、全英授课、国际化培养等优势所吸引，这与她毕业后出国留学的计划不谋而合。因此，她选择转专业，到 IESR 继续进行学习。

Peer pressure 是每个学生在读书期间都遇到的一道坎，杨世宁也不例外。“刚转来经济学时，我完全不知道经济学是做什么的，又加上是全英上课，一开始就有点不适应。”因为需要跟上进度，用英文学习一门不熟悉的课程，杨世宁花费了不少时间在图书馆里默默学习。但在应对“卷”上，杨世宁有自己的疏解方法。她认为，给予自己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让自己时刻焦虑于他人是在做什么，而是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



杨世宁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是属于那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的人，我不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因为那样非常浪费时间且低效，”杨世宁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提前规划时间，并按自己的节奏走。当她觉得该放松了，或者是太累太大压力时，会选择去逛广州的老城区或者爬山，在那种慢悠悠的烟火气息和清新的大自然气息中，重新积攒能量。

Learning by doing

“没有人能在大二就作出完美的规划，”杨世宁在谈及自己的大学规划时说道。她一直将“Learning by doing”作为指导自己大学生涯的一大原则。她认为，每个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作规划，没有谁在初期就是一个完美的规划者。也正因为如此，杨世宁不喜欢设定条条框框将自己限制住，她更喜欢的，是在不断地接受新知识、拓宽新视野中探索自己的边界，一步步明朗兴趣和方向。

杨世宁非常喜欢参加 IESR 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IESR 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平台，有很多经济学顶级学者前来访问，举办讲座，他们的研究让我打开了眼界。”杨世宁认为，IESR 提供的资源可以让自己了解前沿学者们在想些什么、在研究什么，并且深受启发。

在大二下学期时，杨世宁参加了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 James J. Heckman 教授在暨南大学举办的讲座。在当时，杨世宁认为 Heckman 教授所提出的有关教育与健康的观点也很适用于研究我国城市和农村不平等的现状。因此，她逐渐对农村不平等这一问题萌生兴趣。

之后，杨世宁争取机会参加了 IESR 与芝加哥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中心共同主持的四川绵竹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该研究也恰好是由 Heckman 教授主导。在该研究当中，杨世宁参与了实验游戏的讨论与设计，并通过该游戏来测试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体验了研究的全流程后，杨世宁更加确立了自己研究教育不平等议题的方向。因此，在大四时，杨世宁在 IESR 张毅老师的引荐下，参与了有关“留守儿童社交网络”的研究，该研究同样是以四川绵竹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在该研究中，杨世宁不仅自学了 python，同时对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话题目前在中国来说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它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空间，在未来的话，我可能会从这一块入手，选一个新的切入点，”杨世宁在提及自己的未来规划时说道。

迟做总比不做好

杨世宁一直坚信，迟做总比不做好。“当你遇到一个想做的事情时，它就不算迟，”杨世宁认为，想做就要去做，不能总是想着已经落后于别人，但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她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尽量让给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有意义。”她提及，在做研究助理时，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工具人”。而是在帮助老师做任务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了解老师的课题。明确这个课题是什么？老师想研究什么？他应用了哪些数据，在处理数据时又是应用的什么方法？

经过一点一滴地积累之后，“会发现这些对你之后会产生好处，在未来、长期甚至是人生中一定会产生影响。”在做研究助理时，杨世宁认为不仅仅只是完成老师的任务，而是在任务的基础上拓宽思路，构思自己的选题，说不定就能在一瞬间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得益于自己的本科导师邱筠老师，杨世宁在大学期间有很多自主尝试的机会。邱筠老师一直鼓励她进行独立的思考，希望她在自身兴趣的驱使下轻松愉快地做研究。

2019 年，杨世宁选择了“收入与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认知”这一选题。“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杨世宁在提及自己的研究时说道，因为她起初想为这个选题设计一个随机实验，而随机实验即使对一些学者来说也很困难。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杨世宁在实验设计之初就费了很大的功夫。她不仅看了很多文献，还不断地和 IESR 的很多老师探讨可行性。同时还穿梭到大街小巷里，找餐厅谈合作。虽然这个实验最终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无法实施，但邱筠老师一直肯定她的付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科研思维和科研方法的锻炼也是一种收获。

大学是展开羽翼，不断闯入新领域并进行探索的阶段。杨世宁认为可以在大学期间多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多抓住一些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逐渐清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到底适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转专业让我有更好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访厦门大学金融硕士 offer 获得者武文杰

人物名片

武文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2017级本科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暨南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暨南大学优秀本科生荣誉称号等奖励。目前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项目保研资格。



转专业、拿到国家奖学金与保研，是武文杰在刚进入大学时就给自己设下的三个目标。即将踏出校园，武文杰圆满地实现了这三个目标。在她看来，好的平台、好的榜样以及不留退路的努力，是让大学不留遗憾的三个关键词。

好的平台：获得更好的机会

在武文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暗暗做好了大学转专业的准备。在她看来，一个好的平台，可以让自己有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因此，一入学，武文杰就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搜寻信息的过程中，武文杰了解到了 IESR。“IESR 的经济学很有实力，同时它对转专业的学生很包容，每

年所录取的转专业学生也比较多。”在这些优势的吸引之下，武文杰敲定了转向 IESR 经济学的目标。“转专业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所以我知道我来到这里之后，身边也会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人。”

下定决心后，武文杰的大一过得非常充实。她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学习 IESR 转专业可能要考核的数学分析课程。在备考的那段时间里，她将 6 本《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翻阅数遍，做完了里面所有的习题，远远超过了 IESR 转专业的要求。

“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之后，想去做别的事情就会更容易一些。”武文杰说道。在 IESR 这个平台上，武文杰得到了许多实践与科研经历。



武文杰（第一排中间）参与广东千村调查

2019 年，武文杰参加了 IESR 主办的广东千村调查，作为访问员队长，武文杰带领 6 人队伍前往汕头市，走街串巷访问了 120 户村户，对每户家庭进行收入、生活、医疗、教育等全方位的问卷调查。在调研过程中，武文杰和同学们需要每天去跟当地村民进行长达两三个小时的问卷。除此之外，还要克服找不到访问者、无法好好休息的困难。

武文杰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全身心投入地去做。武文杰把这次调研当作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并且为后续的自主研究积攒前期调查的经验。

好的榜样：汲取能量

武文杰谈及她在大学时最大的两个收获，一是良师，二是益友，这两者都是武文杰大学时期的榜样，指引着她往更高的目标努力。

IESR 实行本科导师制，武文杰的导师是史炜老师。在武文杰看来，史炜老师就像她的“老父亲”，在她受挫之时一直默默地支持她。回忆起自己申请一所知名高校博士项目被拒时的经历，武文杰认为史炜老师的支持让她备受鼓舞，“这件事情对我打击非常大，我当时极度崩溃，但史炜老师就跟我说，不管怎么样都有路可走。”在史炜老师的鼓励下，武文杰继续鼓起干劲，最终拿到了厦门大学与同济大学的硕士项目 offer。

邱筠老师是另一位令武文杰心怀感激的老师。“邱筠老师不仅带我深入探究问题，还非常乐于分享自己平衡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让我懂得了如何保持合适的工作节奏及平和的心态。”武文杰说道。

去年 5 月，在邱筠老师的指导下，武文杰以合作者的身份对新冠疫情期间经济活动的暂停对水污染的影响进行研究。该研究通过分析地表水质数据及企业排污数据，认为经济活动的暂停可能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水质得到改善。但做研究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坎。在研究结束后，武文杰在投稿上遇到了困难。“一开始我们在较短时间内投稿到了要求较高的期刊，无奈被拒，之后我们暂停了大半年的时间又继续完善之前的研究。”武文杰说道此次被拒稿的经历，亦深有感触，“我意识到研究不是一次性的工作，我的思维习惯、关注点和它绑定了，就算是暂停这项研究也不能抛之脑后。”

“我在 IESR 的另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群很优秀的同学，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武文杰说道。武文杰每次看到优秀的同学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都会被他们身上的能量所感染。

她认为，在还没有明确自己想要走的路时，可以找到一个榜样，向其学习。虽然每个人想要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少走弯路。

不留退路的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武文杰有一个串联起整个大学生涯的信念，那就是不遗余力的努力。无论是跳到更好的平台，还是寻找可以模仿的榜样，支撑着武文杰的，都是下定决心的坚持。

武文杰在入学时，确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是转专业和保研，她认为，“在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前，要足够努力，这样在找到目标时才可以毫不费力。”武文杰确实是这么做的。在大三时，武文杰就尝试着从一个“苹果”入手，自主进行市场整合度检验与价格跟随机制的研究。在这之后，她又进行了两段有关新冠疫情的研究。同时，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组织和社团活动，成为了 IESR 学生会秘书部部长。

武文杰坚信，“要先做好眼前的事情。”谈及如何在实习和科研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武文杰认为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保持自己的节奏。大一到大三期间，武文杰没有进行任何一段校外实习，但大四投递简历时依旧是百投百中。武文杰认为，不要因为没有一段实习经历就否定自己。“不一定只有实习才能证明你的能力。”

武文杰向和她一样想在国内读研的师弟师妹建议，要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实习经历反而是次要的。大一到大三需要努力学习提高绩点，大四尘埃落定后可以多实习，体验不同工作状态，这样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

踏出舒适圈，充实自己的技能包

——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offer 获得者曾旭游

人物名片

曾旭游，IESR 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2017 级本科生，曾入选暨南大学本科优生培养项目，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交换项目奖学金，暨南大学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暨南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现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杜克大学等知名高校硕士项目 offer。

在 IESR 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

海外名校毕业教师、国际化教学方式、导师制，是一开始促使曾旭游转专业的原因。但回顾自己在本科时所受到的教育，曾旭游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系统的学术训练”。



曾旭游有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交换学习经历。在外交换学习过程中，曾旭游发现，基于自己在 IESR 所学过的内容，可以较为轻松地应对国外学校的学术课程。比如 IESR 在大二开设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所学内容可以基本覆盖在伯明翰大学的中级难度的计量经济学，并且还涵盖了 DID、RD、IV 等知识，无缝衔接国外的课程。

曾旭游认为，IESR 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模式都走在国际前列，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现在回过头来，我发现其实 IESR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更系统化的经济学学术训练，这对于任何希望将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IESR 的学术训练不仅仅在于课程，还在于循循善诱、耐心指导的老师。曾旭游在本科期间利用学院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在立项起初，指导老师李书娟就从自己擅长的乡村振兴的研究领域，一步步指导他们如何写好一份开题报告。曾旭游和小组成员们从一开始对学术研究的懵懂和不规范，到逐渐拿出一份完整、符合学术要求的立项书。在之后的研究之中，曾旭游的小组从农村金融、宗族治理两个角度切入，开展了两项研究。

唐曲老师是曾旭游的导师，让他感触最深刻的，是唐曲老师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引导和点拨。在申请国外研究生的过程中，曾旭游对自己未来学习的方向感到迷茫与困惑。“我当时在纠结要不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唐曲老师作为一个过来人，给我分享了很多她自己的个人经验，”曾旭游说到。唐曲老师在和曾旭游交流时，向他分享了读博的前景、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读博之后可能的出路以及如何做好职业规划的经验。与唐曲老师的沟通让曾旭游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所以，在申请研究生攻读专业的时候，他选择了实践导向的管理学、经济学、分析学等专业。

积累自己的技能包 才能斩获心仪的 offer

曾旭游目前正在字节跳动的战略部门实习，他认为，能够拿到大厂的实习 offer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通向大厂的道路就像一座独木桥，路上强劲的对手众多，如何才能一步步地接近目标呢？

曾旭游认为可以从小厂实习开始，慢慢积累自己的技能包。就像游戏打怪和出装一样，只有经验值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顺利地打倒大 boss。曾旭游希望自己的经验可以给正在找实习的同学一点参考，也就是要有意识地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始积累实习经验。

“大二甚至大一时就可以去了解有什么样的实习机会，然后开始慢慢从非核心的职位做起，”曾旭游说到。最重要的是，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故事”，在做杂活的时候尝试理解背后的逻辑，多思考、多提问。这些零散的“故事”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技能包和经验值，它们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自己。当自己的简历被一个个“故事”扩充的时候，就可以拿着它去做大厂的敲门砖。

除了扩充技能包，曾旭游觉得还需要拥有一颗平常心。在投简历的过程中，被拒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有时候投了一百份简历之后，只有一份获得了回音，尤其是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岗位。因此，曾旭游认为在被拒之后，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简历。

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曾旭游的大学生活一直都在尝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在外人看来，曾旭游是个行动派。在大一时，曾旭游想要转专业到 IESR，就以这个目标不断努力，从珠海来到了广州。在大二，他以海外交换学习为目标，得到了去英国交换学习的机会，大三这一年体验了无数的人生第一次。在大四，为了积累实习经历，曾旭游跑到了全国各地，认识了一群非常优秀的小伙伴。

每次迈出一小步，都让他“收获更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在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看看不同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一起交流，一起 hang out，对于我来说比上课、考试、做作业要有趣得多。”曾旭游喜欢这种不断尝试，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挑战的生活状态。因为每一次尝试，都能让他不断探索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东西。

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都能画成一个饼状图，那学习和竞争在曾旭游的图里只占了小小一角。曾旭游有着丰富的课余生活，是忠实的汽车和航空文化爱好者。他平时会参加学校管乐队的演出，哪怕学习工作很忙也会在假期旅游放空。他觉得，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从长远来看比短期内的一些目标更加重要，内卷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认为大学可以多去体验一些不同事情、认识新的同学，从迈出舒适圈开始，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